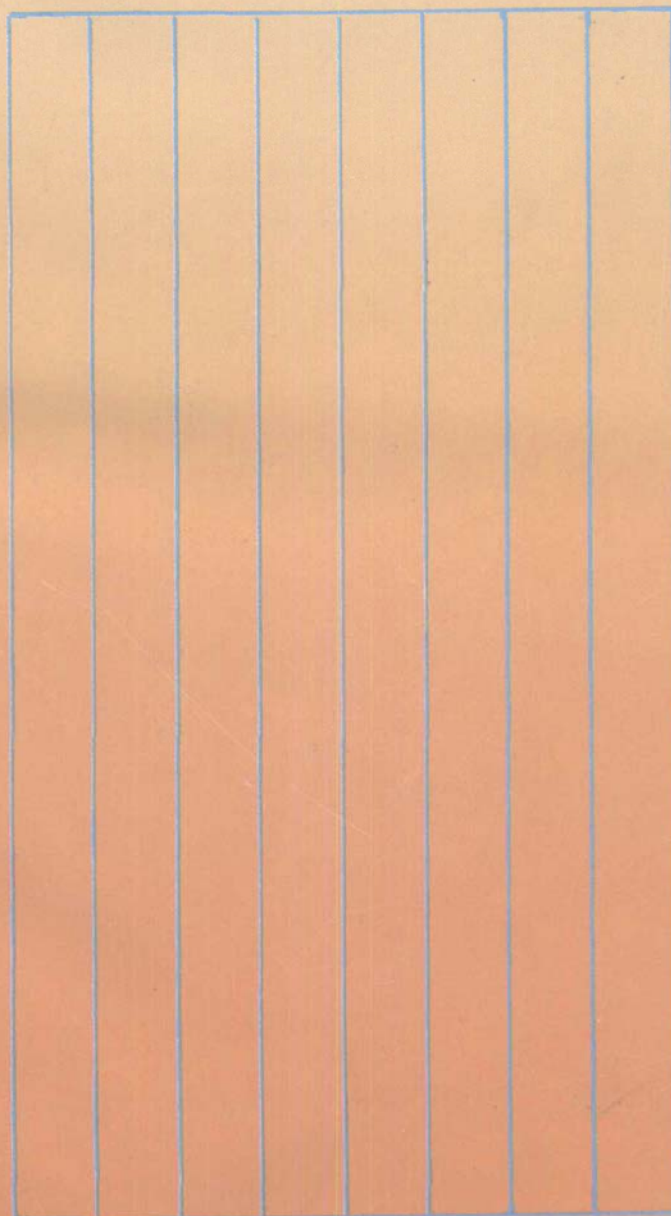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总第116期

1993 · 1

6

学术研究 (双月刊) 1993年第一期 (总第116期)

主 编: 梁渭雄

副主编: 张硕城 刘斯翰 范汉英

• 学习贯彻十四大精神 •

社会主义胜利的旗帜

- 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周圣英 (5)
宣传工作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古小平 (11)

• 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 •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赵凤歧 (15)
南海市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辩证思考……………邓文初 (22)

• 珠江三角洲研究 •

- 深圳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深圳市联合课题组 (26)
试论珠江三角洲市场的发育成长

- ……………王光振 张炳申 林瑞强 丁水保 (32)
迈向2010年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广东省信息中心课题组 (38)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房地产市场

- 珠江三角洲透视……………谭湛明 (4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实践与发展

- “珠江三角洲的实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研讨会综述
……………郑英隆 (52)

• 经 济 •

- 商品内涵新探……………张金良 (55)
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企业机制转换……………李建勇 (58)
宏观环境与企业活力……………邹建华 (63)
中国区域经济调控体系研究……………张可云 (65)
世界贸易新格局与广东外贸战略调整……………谭崇台 薛进军 (70)
谈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魏国洪 (76)

• 精神文明建设 •

- 深圳沙头角两个文明建设发展的同步机制……………张省轩 (79)

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也要硬起来 赖泽南 (82)

在改革开放中迈向文明之路

——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启迪

..... 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研究课题组 (85)

· 哲 学 ·

价值转化规律论(下)

——《价值转化工程》之一章 黄锦奎 (91)

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本主义之超越 乐志强 (97)

关于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思考 刘景泉 (101)

· 历 史 ·

从地窖到顶楼——法国心态史学探析 吕一民 (106)

明代预备仓述论 钟永宁 (110)

略论清末的中日教育关系 杨 晓 (114)

梁发及岭南基督教的传播 关汉华 胡 波 (120)

· 语 言 · 文 学 ·

汉语词义人文研究论纲 苏新春 (124)

对“社会心理是文艺与社会存在的中间环节”的一些理解

..... 何梓焜 (129)

梁凤仪小说中的财经风云 张 绰 (135)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孙 立 (139)

啸艺说略 咎 亮 (145)

· 书 评 ·

《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与应用》的理论特色

..... 易杰雄 马 伟 (149)

宏观把握，专题掘进

——读丘进新著《中国与罗马》 李庆新 (150)

ACADEMIC RESEARCH

No.1, 1993

CONTENTS

- A Banner of Socialist Victory: Studying the Theory of Develop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Feature.....Zhou Shengying (5)
- The Necessaries of Our Propaganda Work Serving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Gu Xiaoping (11)
-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Practice.....Zhao Fengqi (15)
- A Dialectical Consideration upon Nanhai City's Developing of an Agriculture with Great Output, Good Quality and High EfficiencyDeng Wenchu (22)
- Shenzhen's Reform Target Pattern to Develop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by an investigation group from Shenzhen (26)
- A Trial Discussion on the Growth of the Marke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Wang Guangzhen, Zhang Bingshen, Lin Ruiqiang and Ding Shuibao (32)
- A Propose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Way to 2010s by a research group of Guangdong Information Center (38)
- The Need to Establish a Real Estate Market Adapting to the Market Economy: a Perspectiv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Tan Zhanming (45)
- A Summary of the Main 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the Practic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a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eature".....Zheng Yinglong (52)
- A New Approach to the Intension of Commodity.....Zhang Jinliang (55)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Li Jianyong (58)
- The Links between Macro-Environment and Vitality of an Enterprise.....Zou Jianhua (63)
- A Research on the Adjusting and Controlling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Zhang Keyun (65)
- On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Guangdong Foreign Trade in the Light of a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TradeTan Chongtai and Xue Jinjun (70)
-

A Talk about Several Problems Appearing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Village Level.....	Wei Guohong (76)
The Synchronous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ual Civilizations in Shatou Headland, Shenzhen.....	Zhang Xingxuan (79)
Strengthening als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thos Essentially	Lai Zenan (82)
The Road Forward to Civilization in the Reform and Open: An Enlightenment from the Practice of Developing Etho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y a Research Group upon the Etho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85)
On the Law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 A chapter from a book "Engineering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Huang Jinkui (91)
Historical Materialism's Surmounting Humanism	Yue Zhiqiang (97)
Some New Ideas about Hegel's Dialectic Logic	Liu Jingquan (101)
An Approach to the French Historical Science of Social Mood: from Cellar to Attic.....	Lu Yimin (106)
A Review of the Reserve Storehouse Held in the Ming Dynasty	Zhong Yongning (110)
The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Brief Discussion.....	Yang Xiao (114)
About Mr. Liang Fa and the Spread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Guan Hanhua and Hu Bo (120)
An Outline of the Humanistic Research upon Chinese Word-Meanings	Su Xinchun (124)
My Opinions of the Theme That "Social Psychology Is the Medium Link between Literature as well as Art, and Social Existance"	He Zikun (129)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Wind and Cloud Emerging in Ms. Liang Fengyi's Novels.....	Zhang Chuo (135)
The Relevant Aspects of the Theme "No Exact Closs for a Poem"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Sun Li (139)
A Brief Review of Whistling Skills Handed Down in Ancient China	Zan Liang (145)
Theoretical Peculiarities of a New Work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Dialectics".....	Yi Jiexiong and Ma Wei (145)
A Drive in a Special Theme with a Macro View --- a comment on a new book "China and Rome".....	Li Qingxin (150)

社会主义胜利的旗帜

——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周圣英

十四大作为我们党、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突出的标志是：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其影响和作用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象我们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么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理论飞跃。它的历史贡献，跟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一样重大。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十四大报告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依靠力量以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等九个方面作了全面阐述。其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正确地理解和处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才可以说把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经济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充满活力和希望。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报道讲：“中国将欧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完成的事情，缩短到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实践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这条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她指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那么，为什么要提出一百年不动摇呢？这里有很沉痛的历史教训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大家不会忘记，1956党的八大曾经确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会议前后，党多次讲过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然而，不多久，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事件，国内反右派

斗争扩大化，于是，对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怀疑了，动摇了，又重新制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全党、全国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教训多么沉重！

历史往往有惊人之似。完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十三大以来的5年，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遇到了国民经济在加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困难，不得不转入治理整顿；我们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很大的损失；我们发生了1989年“6·4”政治风波，危害国家的安定团结。尤其是，这5年间，国际政治风云急剧变化，东欧演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谷。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想震动，于是，党内外有些人对十三大提出的基本路线产生了怀疑、动摇，又提出了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说什么政权丢了，经济搞上去有什么用？说什么“和平演变”主要来自经济领域；说什么乡镇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沿海开放地区是“和平演变”的危险区域；说什么多引进一份外资就是多引进一些资本主义，提出要批判经济上的实用主义——“猫论”和“生产力标准论”，等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巡讲话时，一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给全党敲了响亮的警钟。

我们不仅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动摇，而且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里需要搞清楚，我国经济该不该加快发展？能不能加快发展？怎样加快发展？

该不该？恐怕比较容易回答。我国近代屈辱史已经昭示人们：经济落后，就会受制于人，就要挨打受欺凌。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绝对不要让它重演。况且，本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全面高速增长时期，在不到100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许多发达国家基础比我们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我们高得多，我们再不奋起急追，差距越拉越大，就越来越被动。正如十四大报告所指出：“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这“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能不能加快发展？主要看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条件。

从国内条件看，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为今后的发展储备巨大的后劲。更重要的是，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要上一个新台阶，既是人心所向，又是完全可能的。

从国际条件看，目前正是我国加快发展的最好时机。第一，世界旧的两极格局已经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第二，欧洲愈来愈成为国际动荡的中心，像南斯拉夫大战；前苏联、东欧的民族纠纷；欧共体内争权夺利等。而反观我们所处的亚洲，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我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好时期。第三，西方发达国家虽有联手对付我国，妄想拔掉中国社会主义

这面旗帜的意图，但力不从心。他们之间的矛盾呈上升趋势，原来是朋友，现在是对手，利益冲突，摩擦增多，尤其是美国、日本、欧共体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不仅日、德不买他的帐，英、法也不听他的，密特朗曾说，美国当欧洲的儿子可以，当老子不行。可见，矛盾不寻常。当前国际形势这几个特点，对我们相当有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我国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做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怎样加快？这里有一个走新路还是走老路的问题。

走老路，大家不会忘记1958年的大跃进，1976、77年的洋跃进，这两个跃进给我们造成的苦果是够大的。那种大跃进、洋跃进也是希望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但结果适得其反。十四大报告要我们警惕，不要走那种忽视效益，片面地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地上项目的老路。这条老路，现在有没有苗头？应当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总的来讲形势很好，但也有两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一个是投资的规模、信贷的规模过大，很容易就造成通货膨胀。比如拿钢材来讲，1991年初在广东一吨钢材是1600元左右，现在已高达3000到4000元，翻了一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我们的速度很快，但是仓库积压的东西很多，企业的亏损额增加了。为什么积压那么利害呢？一是企业的市场意识很差，产销不对路；二是基础设施跟不上去，交通运输不适应。所以走老路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么新路又是什么呢？十四大报告概括了，一靠不断改革，扩大开放；二靠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三靠科技的进步，教育的发展；四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企业的中心环节。这样，就能走出一条质量高、效益好、速度快的新路子。对我们广东来说，怎样把经济尽快搞上去，省委已经作了很多部署，我们要贯彻执行。总结以往的经验，我们的老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有三句话值得我们好好记住。第一句话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第二句话是“变通”。这两个字威力非常大。“变通”说到底，就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变通”不是“变相”，不是变着法子与中央对着干。第三句话，是排污不排外。在坚持门户更加开放的同时，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第三句话对广东的发展作用很大，应当继续坚持。

靠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阐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时，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必由之路。

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改革的深远意义，并把它同革命等同起来，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认识上的历史性飞跃。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极为优越的条件，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阻碍和束缚

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尽管实践上已经多次暴露出我们许多具体的制度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一直没给予变革，使得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窄，有的甚至走进了死胡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在 30、40 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经济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然而，在这以后，历史发展了，客观条件变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他们对此却一直不予承认，更没有想到要变革，结果，僵死的、停滞的社会主义终于葬送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和别国血的代价中觉悟到，只有不断地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希望和光明。

那么，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经济该往何处去？这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提出。邓小平同志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胆略和巨大理论勇气，改变了我们老祖宗的传统说法，改变了社会主义教科书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铁的公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回顾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认识的确立来之不易，前后经历了 14 个年头，对此，邓小平同志先后有过六次重要讲话。

第一次是 1979 年 11 月 26 日跟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辑的谈话。在这之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但对经济改革改什么还不太明确，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专门召开了一个讨论会，谈到过去我们和苏联的体制只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部分，还应该市场另一部分。最高领导人这样讨论后，理论界三月份在无锡开了个三百多人的讨论会，会上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应当互相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大多数人反对这个意见，认为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小平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产生了第一次讲话。当时他说，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小平同志还说，市场经济，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第二次是在 1984 年 10 月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的。因为有了前面这个思路，1984 年 10 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方针。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会议上说，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决定“是个好的文件”，是“纲领性的文件”，这个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一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实践不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的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第三次是 1985 年 10 月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美国企业家问，社会主义跟市场

经济有什么关系？小平同志说，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利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个好办法，但多年的经验表明，光有这个办法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次是1989年“6·4”政治风波之后。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统一的体制，不分主，不分次，这又更进了一步。但是十三大以后，发生1989年“6·4”政治风波，使搞市场经济的人处境非常困难，有些人乘机批判市场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小平同志在1989年6月9日，那场政治风波刚刚平息，就对高层领导人说，不要因为发生这场动乱，就怀疑我们路线方针的正确。小平同志讲，这几年，我们这样搞没有错，不能够变。他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够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小平同志第五次论述这个问题是1991年12月间。那时正是东欧演变，苏联解体，有人又来批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小平跟薄一波又作了一次谈话，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认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么一回事。

第六次讲到市场经济是1992年初南巡谈话。1991年春节前夕，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上海《解放日报》根据他每次讲话的精神，写了四篇评论，提出要反对思想僵化，解放思想，正确对待市场和计划的问题；提出不能把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计划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提出不要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不要怕肥水外流，不要怕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提出要建立几个社会主义的香港。这四篇评论一出来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些报刊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这四篇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巡谈话时，更鲜明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在全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形成了共识。十四大终于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认识来之不易，建立这样一种经济体制更是一个十分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转换政府职能，转换企业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需要我们培育一个统一的、开放的、敢于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体系；需要我们建立一个服务于市场的计划宏观调控体系，减少和避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我们健全一套完整的经济法规，保障市场的正常、有秩、高效的运转；需要我们坚持“两手抓”，遏制市场经济容易诱发的金钱、商品拜物教的负效应。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

想，换脑筋，要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换掉那种传统的、本本的、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甚至是扭曲的认识，从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换掉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从高度集权的“鸟笼经济”框框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伟大目标。

必须坚持富有时代内容的四项基本原则

加快经济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有一个团结、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因为社会动荡不安，民心不稳，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这一前提条件，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可靠保证，否则就会走偏方向，引起人心和社会的混乱。

然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离开改革开放实践所赋予它的新的时代内容。否则，也很容易变成凝固的、僵化的教条。就拿坚持马克思主义来说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去世 100 多年，他们不是神仙，不能要求他们在那时回答当今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也不能要求他们过去讲过的话都能适用于今天。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坚持其中正确的东西，抛弃其中不适应的东西，增加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所得到的新东西。也就是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指导下，不断地用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来丰富、发展它，才谈得上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再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来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是通过对 100 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提出的。很显然，100 多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变化，过去的构想有些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是不足为奇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此一时，彼一时，条件变了，原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会变成是不正确的东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更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倘若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上，还是坚持过去传统的过时的观念，坚持那种高度集权、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模式，那就不能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就谈不上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况且，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没有固定可搬的模式，它的建立、发展，必然是一个探索、试验、实践的进程，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不完善到完善、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其中，必然有失误，有挫折。假如我们囿于过去陈旧的观念，把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仍然当作正确的来坚持，不敢越雷池一步，又怎么谈得上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呢？

同样，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有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补充、改善直至完善的过程。正如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说明，拘泥于过去，一成不变，是不符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的。

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改革开放要健康地发展离不开

宣传工作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

古小平

宣传工作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这是广大宣传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宣传工作作为党的工作一个重要部门，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紧紧把握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变职能，服务经济。

一、党的基本路线决定了宣传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

宣传工作是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服务于这一中心的。这就决定了宣传工作要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宣传工作的本职和内在的要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宣传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属上层建筑范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列宁指出，任何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9页）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范畴的宣传工作的存

四项基本原则做保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需要改革开放实践不断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两者都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之所以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是因为我们坚信，在中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更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这个目的来谈两个坚持，那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此，怎样坚持改革开放，怎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归根到底要用生产力标准来检验：“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凡是“三有利”的，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凡是“三不利”的，我们都要毫不犹豫地抛弃。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通途。用这一理论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人们的行动，高举这面胜利的旗帜，那么，社会主义必定在中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童 轩

在和发展，也就必然要求宣传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服务，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服务。

从十多年来的实践看，干部群众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许多思想认识问题，那些“热点”、“难点”问题，大都是同各种经济活动、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政治思想问题是包含在经济建设之中的。因此，宣传工作必须改变那种脱离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孤立地搞空洞的政治说教的做法，注重研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人们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真正协调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开拓前进。

二、宣传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发挥自身的优势，把握服务的重点

宣传部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已培养锻炼了一支业务素质较高的队伍，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并且掌握现代化的宣传舆论工具。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做好“服务”的文章？我认为当前应抓住五个重点。

第一，帮助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扫除思想障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精髓。邓小平同志的南巡重要谈话，贯穿的一条思想主线，就是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因为，解放思想是改革的先导，随着改革深入，对僵化的落后的传统观念必将触及得更深更广，需要人们解放思想，克服阻力。同时，改革的深入也必将遇到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去认识，去解决。当前解放思想主要是帮助人们从“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的标准。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防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死灰复燃，干扰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经济领域，主要是防止以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干扰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防止以教条主义的僵化思想束缚人们实事求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抓好形势教育，鼓舞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形势教育是宣传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搞好形势教育，能使人们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当前，开展形势教育，应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进行。重点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结合14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加深对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的领会，并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第三，搞好政策导向宣传，把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同宣传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政策导向宣传，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政策导向宣传上，首先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深刻地领会党的基本路线，在此基础上，让群众了解改革开放的具体内容和相关的具体政策，注意理顺群众情绪，使各项改革开放措施顺利实施，并吸引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参与。

搞好政策导向宣传，要注意把握如下四性：一是关联性。即总政策与具体政策的联

系，一政策与它政策的联系。在宣传具体政策时，不但不能忘记总政策（党的基本路线），还要以总政策为指导来宣传具体政策。二是准确性。就是准确地宣传党的政策精神，不能把政策的完善，宣传成政策的改变，以免引导思想混乱。三是适度性。在宣传政策的效应、效果时，要很好地把握“度”，不要“过”，也不要“不及”。四是过程性。要让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再正确的政策也需要完善或有一个完善的过程，而且贯彻政策也有一个过程，政策发挥作用也有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只有把握了政策宣传上的四性，才能正确地搞好政策导向的宣传。

第四，抓好典型正面宣传，充分运用先进典型推动经济工作。宣传典型，是宣传工作作为经济建设服务最直接、最有说服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体现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哲学原理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典型宣传要注意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要善于发挥和总结先进典型；二是要强化典型宣传的力度；三是要注意典型的层次性、多元性、系列性；四是在抓典型的过程中，要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要站得高，看得远，使典型基础牢固，方向正确。

第五，搞好舆论引导，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正确的舆论引导，能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并促进其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相反，错误的舆论引导，则会造成思想混乱，甚至造成社会动荡，贻误改革开放的大局。要搞好舆论引导，必须把好三关：一是理论关。理论的研究、宣传一定要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来进行；二是新闻关。新闻一定要严格掌握正面宣传的原则。注意增强针对性、时效性。有的放矢，有说服力地回答深化改革中人们普遍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问题，做好思想疏导工作；三是文学艺术关。各种文学艺术门类一定要努力反映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题材，讴歌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鼓舞人们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拼搏奉献。

三、加强和改进宣传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一，大胆创新，努力改进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总的思路是要“实”、要“活”、要“新”。“实”就是一切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真抓实干，讲求实效，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活”就是把宣传工作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更具吸引力。“新”就是要研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宣传工作紧紧结合丰富的实践活动开展得有新意，更具创造性。

第二，坚持宣传工作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原则。从总体上说，就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工作的内在规律，寻找最佳结合点。把经济建设的重点，经济工作的难点，作为宣传工作的重点；把政府经济部门和企业关心的热点，作为宣传工作的切入点，不断探索宣传工作与经济工作在实践中相互结合和渗透的融汇点。具体来说，还要注意在五个方面搞好结合和服务：一是在统一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去服务；二是在帮助形成正确决策上去服务；三是在贯彻党的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上去服务；四是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上去服务；五是在总结推广经济工作的经验上去服务。并充分运用和发挥宣传载

体的作用，强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手段。

第三，动员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形成整体优势，组织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大合唱”。首先，要积极发挥宣传战线的整体功能，围绕不同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制定宣传计划，提出宣传任务，全力组织落实。其次，要充分发挥宣传部的协调作用。既要加强与意识形态各部门的业务沟通，起到综合协调的作用；还要注意与经济综合部门和经济杠杆部门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把宣传工作的任务及时地、适当地分解落实到各有关部门，形成多部门、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服务的网络，增强宣传工作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提高宣传效果。

第四，切实提高宣传干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业务素质和能力，造就一支既会宣传，又懂经济的宣传干部队伍，是宣传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客观要求。为此，宣传工作者要带头解放思想，自觉清“左”除旧，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好十四大报告和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努力学习钻研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了解经济形势，熟悉经济工作，进一步提高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本领。宣传干部要主动经常地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学习经济，并虚心向懂行的同志学习，掌握为经济服务主动权。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对宣传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教育工作，使宣传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能够后继有人。

第五，建立宣传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检查评估制度，保证服务的落实。由于宣传工作自己的特点，它为经济建设服务带有间接性、潜在性、渐进性。那么，如何检查评估宣传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和成效？我认为，应从五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宣传工作是否促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贯彻落实，对经济建设起到了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作用；二是宣传工作是否促进了人们正确认识经济规律，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和改革开放意识，并自觉运用经济规律去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三是宣传工作是否发挥了正确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和形成良好职业道德的作用；四是宣传工作是否调动了人们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焕发起主人翁的意识和劳动热情；五是宣传工作是否推动了职工综合素质和从事经济建设能力的提高。经常以此五个方面的内容来检查，就有利于确保宣传工作紧密结合经济工作去做，使宣传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能够得到落实，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梅州市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石 成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的发展

赵凤歧

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就必须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它在历史进程中取代资本主义乃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但是历史的发展又是一个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

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英、法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一新制度的诞生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发展起来的巨大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冲突的结果。但在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并未实现。所以他们也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俄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历史正是从“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人的历史，从“民族历史”过渡到“世界历史”，这种历史性质的转变的真实内容和深刻原因就在于人类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和交往的迅速而普遍的发展，打破了局限于狭隘的地域范围的民族历史，使得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历史发展过程所带来的重要变化。它提示人们，在“世界历史”的背景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冲突是在世界范围内运行的，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也应该从整个世界的角度去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所必然导致的资本输出和对落后国家、民族的侵掠、剥削和压迫。这样，便形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矛盾与资本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矛盾的相互交错的情景，形成了“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再也不可能作孤立的、狭隘地域性的理解。这是因为，某些落后国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往往由于外部资本主义势力的介入而迅速进入激化状态，并有可能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矛盾斗争的焦点。这种情况表明，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相互影响相互交错的，呈现为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

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以及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进程的思想，正是我们正确理解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及其在每一特定条件下所表现的特殊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依据，也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胜的预言并未实现，而后来社会主义革命几乎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的重要思想依据。特别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般历史前提这个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要创造条件，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这个根本思想的重要依据。

二

不仅如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对社会主义进程的研究重心，还有一个从发达国家到落后国家的转移过程。当他们把研究重心放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作出了这些国家将同时进行革命的结论；而当他们把目光转到东方落后国家时，又作出了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设想。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基于对俄国情况的分析，提出了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论断。马克思说：“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②“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③恩格斯在1893年也说过：“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的苦难。”④

马克思这种关于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世界历史总进程中实现某种“跳跃”，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是孤立地提出的，不是就俄国而言俄国，而是把俄国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下来考察的。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⑤后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表明，俄国在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呼应的情况下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信号”是发出了，但迟迟没有得到西方发达国家革命的呼应，直到俄国革命胜利后长达70余年的时间里仍然没有得到这种呼应。继十月革命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东欧和亚洲的一些大都比俄国更落后的国家。这种情况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没有料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而是把握其整个论断的精神实质，那便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预言或设想未能实现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揭示的，是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和最一般的规律，并没有为每一国家的革命规定现成的道路，也没有为不同国家的革命规定不可

更易的既定次序。因为这一切都要取决于整个形势的发展和每一国家的具体情况。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实质是在于，按一般情况，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前提，所以当人们设想象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某种历史“跨越”时，须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为条件，而当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表明俄国在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呼应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了革命时，我们当然不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设想来裁剪生活，同时也不影响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中理解它所包含的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社会主义既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更替，那就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革命前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物质前提那就更好，如果革命前这个物质条件并不充分而历史的发展又提供了进行革命的具体形势，那就理应毫不犹豫地夺取革命的胜利，不过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全心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以创造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谈到落后的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时，非但没有说它可以抛开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文明成果，没有说在实现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时，连同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也一起抛掉。恰恰相反，马克思总是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强调利用这种“肯定成果”的极端重要性。恩格斯也认为，俄国在当时条件下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可能的，但实现这种历史超越的关键则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富掌握起来，为我所用，认为这是最终克服资本主义的必备条件。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⑥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由于各种矛盾的交互作用和各种因素的总和所造成的结果，可以出现这样的历史机遇，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对某种具体社会形式的超越是可能的，但社会形式的超越不能取代决定社会形式的物质内容的超越。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超越的。这是唯物史观不可移易的真理。如果历史所提供的机遇或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行超越的可能性一旦转化为现实时，那么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想站住脚，要使自身得以巩固和发展，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and 国家的长治久安，当然要从诸多方面创造条件，而最根本的则是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历史和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比破坏旧世界以及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更困难、更艰巨，所需的时间更长和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劳动的过程。

那么，既然在实践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经济上原本都是比较落后的，在各自的国内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并没有现成的巨大物质财富可以继承，可资利用的“肯定成果”并不多，那又怎么办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最好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作些历史反思，从中引出一些必要的经验教训。

大家知道，马克思虽然提出过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但这种设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并未实现。直到本世纪初叶俄

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上首先取得突破。在俄国革命胜利近80年后，东欧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所有这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这就是：由于革命的胜利而为迅速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政治前提，但历史起点又都是比较低的，缺乏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发展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作基础；在一些国家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但发展又很不充分。因此，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对待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现实课题。为了解决这一无可回避的课题，人们也曾进行过诸多探索，并且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列宁不仅提出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是取得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必备条件，而且提出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的一切有用的东西。列宁把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称为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而“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我们正在进行这一事业。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①众所周知，列宁在提出用新经济政策来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是非常果断和坚定的。他基于对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理论上的自我反思，提出了要人们学会搞商业，要向资本家学习，要很好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有用成果，等等。这反映了列宁对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十月革命后，列宁强调了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迅速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按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之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②在列宁看来，取得政权后的无产阶级，要想巩固自己的阵地并继续前进，就不仅要利用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全部科学技术成果和一切有用的东西，而且必须吸收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列宁甚至用下述公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社会主义。”^③众所周知，当时还是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的最初年代，还处于资本主义的严重包围和威胁之中，形势比二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面临的形势严峻得多，但列宁还是如此坚决果断地说明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要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成果的必要性。

再看看中国的情况。如果说资本主义在俄国并未得到充分发展，那么中国的情况比俄国还要落后些。但是，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有过很正确很清醒的认识。可以说，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作出了正确而深刻的分析，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作过这样的分析：“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为什么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

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番话是1945年讲的，那时新中国尚未建立，但这段精辟的论述的确使人思想开阔，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成了我党正确制定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方针政策科学依据。我们不仅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后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通过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体形式实现了和平改造。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不仅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巨大社会震荡，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而且在同一过程中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伟大创造。可惜的是，从50年代末期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走向了严重的失误。在对主要矛盾进行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离开了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冲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此相联系，对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逐渐被忘却了，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一重要国情也逐渐被遗忘了。特别是由于放弃了过去毛泽东所阐述过的对待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几乎采取一概排斥的错误态度，这就自我剥夺了我们本来可以利用的、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三

综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列宁虽然在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为新制度创造物质基础，以及为此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等方面，作出过一些很重要的正确论断。但由于他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毛泽东的一系列有关论断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并且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中取得过很大的成功。但后来又出现严重失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使我们在对历史进行反思时，不能不引出一些必要的结论。

第一，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之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必须集中力量迅速发展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⑩“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还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了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反复提示我们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并且要“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不能用任何东西来干扰或冲淡这个中心，等等。在南巡重要谈话中，又着重指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我国多年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现实经验的新的概括，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不能完全确保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还需要通

过改革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得到调整和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继续扫除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后来邓小平同志又论述了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光辉论断，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显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样的重要论断，并且在论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时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联系起来，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验的深刻概括，也是在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所实现的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重大突破。

第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迄今为止都是在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起步的，历史起点比较低。这种情况非但不是拒绝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理由。恰恰相反，正因为本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可资利用的成果不那么多，正说明了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所遇到的困难更多，任务更艰巨，同时也说明对有限的资本主义成果更需要加以珍视和利用。

第四，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和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不可分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对落后国家的侵掠、争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矛盾的激化等等，终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薄弱环节。这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取胜的历史机遇。换言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什么人凭空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离开人类历史的总进程，就不会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也不能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而只能在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中发展自己。历史早已表明，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化打破了狭隘的地域界限，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是不可逆的。在历史上，生产和交往的发展和日渐扩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因，也是人类从“史前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显著标志。在当今时代，国际间的交往更是今非昔比了。生产和交往的更加国际化，交往形式的多样性和普遍化把各个国家和民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如此，在人类已经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历史背景下，任何民族或国家如果断绝或减少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拒绝或忽视对人类历史进步所带来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吸取，就必然会陷入日益落后的境地。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⑩“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⑪这些都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又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党的十四大报告也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

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不仅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关于开放一系列沿海城市和内地开发区等等，这种全方位的一整套相关的布局和改革开放的网络系统，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并且在短短时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以现实实践的方式断然结束了那种闭关锁国的历史。社会主义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获得了生机。从今以后，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将为我所用，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等都将为我所用。这种不仅在理论上有一系列的光辉论述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实践上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布局，其规模如此宏伟，成效如此显著，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显然，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邓小平同志集中全党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进行的伟大创造，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与创造精神。

①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第231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第43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8页。

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恩格斯关于“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⑧《列宁选集》第3卷，第540页。

⑨《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

⑩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第77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冯 生

（上接第149页）

再次，《理论与应用》一书的明显特色还表现在理论与实际的密切联系上。

作者认为，要搞好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应用，是不容易的，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要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掌握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应用上下功夫，又通过应用的实践检验、修正、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辩证法。正因为如此，作者在系统地阐明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同时，又针对现实、紧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从大量资料出发，对我国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论证，并针对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若干政策进行了评价和再思考，提出了今后改革的设想。因此，这本书的明显的特色就不仅在于它对社会主义辩证法开拓性的研究，还在于它对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对策建议。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使该书增添了浓烈的时代性色彩，可读性也大大加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责任编辑：冯 生

南海市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辩证思考

邓文初

在江泽民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树立大农业观念”，“努力开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简称“两高一优”农业）。国务院也作出《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学习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国务院的决定，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海市农业的发展历程，更深刻地感到中央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

一、坚持改革，抓住关键，正确处理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农业，要求农、林、副、牧、渔全面地向“两高一优”发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坚持“以粮为纲”，砍掉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否定种植业和畜牧业以及各种业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转化的关系，其思想根源是形而上学，其结果则是粮食产量不高，即使粮食增产了，也是只有数量，缺乏质量，更没有优质、高效，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党中央提出90年代要把发展农业的着眼点，从以追求产品数量增长为主转向高产优质并重、提高效益上来，是农业指导思想的一个飞跃，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是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南海市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实现农业发展转变的精神，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贯彻执行“两高一优”的方针，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取得很大成绩。1982年全市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逐渐地推行“两高一优”，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91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113.32亿元，同1982年相比（下同），增长4.6倍（按可比口径推算），其中农业总产值12.89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增长66%。农业中粮食为

2亿元，保持1982年水平；其他种植业为2.69亿元，比1982年增长19%，畜牧业增长197.5%，渔业增长116.4%。农业产量方面：水稻平均亩产量从1982年的694公斤，增至1991年的800公斤，增长15.3%。1991年蔬菜和水果的总产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出口创汇方面：1991年全市外贸农副产品出口收购总值13480万元，比1982年增长173%。同年全市每个农民（农村劳力）平均向社会提供粮食964.9公斤，果菜892.4公斤，肉类（猪、牛、三鸟、羊等）262公斤，鱼类153.5公斤。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976元，比1982年682元，增长1.9倍，也即是农民生活从过去的温饱型转入小康型。

根据南海市的实践，我认为贯彻“两高一优”方针，包括多方面的工作和内容，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改革开放与“两高一优”的关系。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在不断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前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从而达到自我完善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南海市的塘鱼和牲畜长期以来实行指令性的派购体制，这是在物资很缺乏状况下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实行硬性派购任务的体制越来越妨碍生产力的发展。1983年进行改革，首先在渔业中取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转为市场调节为主，“这条鱼就跳跃起来了”。我市原来以粗放经营的四大家鱼为主，市场价格放开后，引进了不少高质、优稀、高值品种，1991年全市引进的鳊鱼（每亩年收入6.4万元）、桂花鱼（1.43万元）、加州鲈鱼（0.9万元）、叉尾鲷（1.2万元）等优质鱼，产值高，销路好，同四大家鱼每亩年产值只有1615元相比，分别增加

41.24倍、8.44倍、4.94倍、6.92倍。因此，农民的积极性高，渔业产值一年上一个台阶。畜牧业在1984年改革放开后，也是发展很快，1991年的产值比1982年增加了两倍。水产和畜牧业成为我市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同1982年相比，分别从17.5%和18.8%，上升到1991年的34%和23%。

对比鲜明的是粮食和甘蔗。直到1991年粮食和蔗糖还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虽然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各种补贴，粮食的产量仍然上不去，而且质量差，难以出卖。例如，1991年市一级直接用于种粮各种补贴1218.75万元，甘蔗补贴100万元；镇、管理区、经济社三级直接用于粮食补贴858.45万元，甘蔗补贴89.9万元，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间接补贴不计算在内。但粮、蔗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均属于农业中最低的。每亩净产值粮食约为264元，蔗糖约774元。到1991年，粮食总产值仍是2亿元（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与1982年持平，粮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82年的25.8%下降到15.5%。

实践说明，农业体制的改革与不改革是大不一样的。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因素、部分进行了改革开放，生产就上去，效益就好；相反，长期不改革，生产就停滞不前。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两高一优”，这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启动动力；而“两高一优”的逐步实现，又促进农业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两者是相互推动、相辅相成、辩证地结合起来的。

第二，农业先进科学技术与“两高一优”的关系。

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科学技术是关键。无论是提高产量，或提高质量，以及降低消耗，提高效益，都要靠科技进步，靠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尤其是良种，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品质，都起着关键性作用。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种苗的优化，要实行培育和引进并重，尤应把引进作为突出的重点。引进良种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是发展“两高一优”的捷径。我市和我省在这方面有着不少有利条件，更应重视发挥优势。育种要转变观念，不停留于追求高产，更要重视优质，把高产和优质结合起来，以达到高效的目的。

我市10年来先后大量引进水稻、水果、水产、畜牧、蔬菜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品种数以百

计，改善和提高了原有农业产品的结构和质量，增加效益。例如高产优质谷粳品种系列，1990年引进600亩，到1992年早造发展到8万多亩，占全市早稻面积20%。畜牧良种有瘦肉型猪、AA鸡、红布罗鸡、石岐杂优质黄鸡、狄高鸭、樱桃谷鸭等，珍良禽种有美国王鸽、鹁鸽和法国珍珠鸡等。水产方面在筛选四大家鱼的基础上，再引进珍稀高档品种，如泰国野鲮、埃及塘虱、鳊鱼、台湾小白鲷、桂花鱼等。引进水果良种有紫花杜、红江橙等，蔬菜良种有台湾11号兰豆、西兰花等。通过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产值。

在引进良种的同时，我市狠抓农业科技攻关，从而促进了“两高一优”农业的发展。例如，市水产养殖场攻下了桂花鱼的人工繁殖技术关；畜牧局研究所攻下了珍珠鸡人工受精繁育技术关；市农委把芒果保鲜试验成果转化为工厂化生产，达到了国际水平，取得了良好效益。

大量的事实说明，科学技术是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不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发展农业中的作用，长期固守于传统农业的耕作技术和品种，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只有切实抓住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开发、转化，才能使“两高一优”变为现实；而随着“两高一优”农业的发展，就会有更多资金投入科技开发中来，使科技发挥的作用更大。

第三，正确处理“两高一优”本身的辩证关系。

任何事物自身都是辩证统一体。对“两高一优”本身存在的辩证关系，需要有全面的科学的认识，作出实事求是的处理。高产、优质、高效是一个整体，其中“高产”是前提，是解决1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优质”是基础，尤其是要达到小康和共同富裕的基础，人民不仅要吃饭，还要求吃好，达到科学的卫生的健康水平；“高效”是综合指标和根本要求，也是社会实践的价值实现。农业的高产可以转化为优质和高效；优质能够更好地实现高效，促进高产；而农业的高效，可以带动、统率高产和优质。当前对待“两高一优”，首先要拿出优质产品，其次要有产出高的量，还要有产出的效益高、产出的成本低和适销对路等。

二、发展“两高一优”农业， 必须坚决实行几个转变

既然实现农业“两高一优”的转变，是我国农

业史上一次革命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这就不能按老的办法，走老的路子所能奏效，必须相应地实行一系列的转变。

(1) 由传统的计划产品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

首先要使从事生产和指挥生产的人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由长期凝固化的产品经济、自然经济的旧观念转变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导的思想上来。改革开放，使广大农民从过去的旧体制、旧思想中解放出来，意识到自己是商品生产者，努力发挥聪明才干，去创造更大的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逐渐摒弃传统的产品经济、自然经济的观念，经营信息越来越灵，胆子越来越壮，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高效目标越来越强。他们打破了“以粮唯一”的单一生产结构，按照我市实际情况，着重发展“两水一畜一菜”（水产、水果、畜牧和蔬菜），镇、区、联合体的农业布局作了较大调整，生产遵循价值规律，向“两高一优”目标拓展。

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种、养、加相结合。单纯提供初级农产品，即使是紧俏的名贵产品，产值也是不高的。在发展和提高种植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并把种、养、加三者辩证地结合起来，就能大幅度升值，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南海市农产品加工业，大多是制品加工、保鲜加工、贮藏加工为多，效益也很好。应在这个基础上，从初加工逐步到深加工，作用就更大。

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行农工商相结合。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科技含量差距很大。如果单纯地依靠农业，不创办第二、三产业，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达到小康水平。因此，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尤其是乡镇企业。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商品和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奔向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南海市委制定坚持以集体为主，三大产业齐发展，五个层次一齐上，大办乡镇企业的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1991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91.4亿元，其中乡镇企业总收入75.31亿元，约占82.4%，与1979年相比，翻了五番多。在农村经济中，镇、区、社（含农户、联体）三级平衡发展，分别占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的34.46%、52.43%、33.11%。在全市18个镇中，有10个镇

总收入超过5亿元。在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超50亿元的县（市）中有南海市。1991年南海市农村综合实力名列全省之冠，全国排名第四。

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必须贯彻农工贸技相结合、内外贸相结合。过去传统农业是分散的单纯的种养，现在是大力扶持把贸工农、产供销、种养加结合一起的现代农业，鼓励我市名特稀优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充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对外贸易进行资源转换。目前南海市已初步形成“农工贸技”相结合的农业生产体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我市里水镇“宝鲜公司”的经营效益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个公司是集“农工贸技”于一体的生产实体，是具有先进水平的蔬菜贮藏加工企业，它引进美国、澳大利亚80年代先进设备，拥有三条生产线，可加工出口西兰花等20多种蔬菜，在东南亚深受欢迎，还远销到美、日、德、加、澳等地。1991年人均产值8.85万元，人均创汇13737美元。

在实行“两优一高”，带动农业由传统的计划产品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了“两个导向”、“一个搞活”：

——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大力发展各类名优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

——以科技信息为生产导向，发挥基地示范辐射功能。被誉为热带果王的芒果，在我国南方，一直受品种问题和保鲜问题所制约，未能发展成规模生产。当我们得到广西农学院的紫花芒高产的信息和华南农业大学对保鲜贮藏有新成就的信息后，立即由市科委和市农委分别和他们订立协议，建立基地引进示范，联合攻关，并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工厂化生产，为芒果保鲜加工增殖开辟了新路子，使全市芒果大发展。

——搞活农贸市场促进大市场、大流通。在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观念指导下，积极开拓专业市场。几年来，我市投资近1亿元建了近20个规模较大的农贸市场，全市18个镇，镇镇都有农副产品集散地，加快了农业商品的流通。同时，花大力气在市内建立10多个规模较大的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如西樵化纤布匹市场，大沥有色金属市场、三鸟市场，九江服装市场，黄岐家具市场等，通过专业市场将产品辐射到全省、全国以至海外，从而又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促进了农村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兴旺，带动

了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业兴，百业旺”的局面。

(2) 由小农耕作向现代大农业生产转变。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农耕作越来越不适应，要求树立大农业思想，逐步地向现代化大农业生产转变。

现代商品大农业与农田水利建设、排灌设施、交通、农机、运输等有着直接的关系。1982年以来，我市重视抓水利排灌，到1991年，形成了旱涝保收的水利条件。用农业机械来装备以至进行工厂化生产是大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到1991年大中型拖拉机有329台，手扶拖拉机增至13710台，农用汽车2357台，脱粒机40710台。此外还新增加收割机、插秧机、清淤机、河涌吸泥船、鱼塘增氧机等一大批。有个别产品已能进行工厂化生产。农业机械的出现和普及，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小农业转变到大农业，必须进行高投入。1991年，全市各级农业总投入9143万元，其中农田基本建设3736万元，开发性生产932万元，推广农机化259万元，创汇农业基地43万元，先进技术推广225万元，还有化肥、农药、种籽等补贴1千多万元。农业的高投入，使大农业获得了高产。

从小农业转变到大农业，必须抓好农业的良性循环，改善生态环境，包括改造低产田，整治鱼塘，以提高产量和质量。农业和畜牧业以及各种作物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要善于发挥互补作用。近几年来，我市不断提倡和采取牧果结合（山上种果、山塘养鸭或果园养鸡），牧渔结合或农牧渔三结合的立体生产。例如南庄镇基本上实现农牧渔相结合（塘边养猪、种蔗），全镇鱼塘面积2.4万亩，全年生猪饲养量6万多头，平均每亩鱼塘8头猪，猪粪可肥塘，每亩可

增产塘鱼200公斤左右，已达到“两高一优”的目标。

大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和确立，给一家一户耕种向规模经营的大农业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市大沥镇联窖管理区率先推行粮食生产规模经营，1991年成立一个由20人组成的农业公司，将全区1200多亩稻田从分散的单人独户耕作转变为农业公司集中耕作的企业化经营，从耕地、插秧到运输全过程，都实现机械化，成为我市第一家粮食生产商品化、专业化、企业化公司，取得良好效益。

(3) 领导方法上由行政命令型向服务示范型转变。

为了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党政的领导方法必须相应地实行转变。我市把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改变机关领导作风的重要一环，将行政命令型改变为服务示范型。从市到乡各级政府和农口等部门积极引导，逐步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服务网络。目前全市组织了产品流通、技术咨询、生产资料供应以及技术协会等各种社会化服务站、点、团体达6348个，专业人员3571人。这些服务对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促进农产品向“两高一优”转化，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开展技术服务中，农业部门牵头兴办优质品种、先进技术示范点。例如推广河涌网箱养鱼，市水产局与南庄农办共同举办优质鱼河涌网箱养殖示范点，平均每平方米水面优质鱼收入746元，每亩总收入达50.9万元。又如水稻高产片，优质水果示范园、畜牧示范点等。他们通过社会服务示范方式来发挥领导作用，不是单纯地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深受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作者单位：中共南海市委

责任编辑：冯 生

深圳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

深圳市联合课题组

一、关于深圳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

正如探索“斯芬克思之谜”和“歌德巴赫猜想”一样，人们以极大的兴趣研究和探索深圳特区13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如果说头10年深圳人保持着一种“只干不说”的实践精神的话，那么，现在深圳理论界却不能不对此作出正面的理论回答。

深圳经过13年的开发建设，已经从昔日荒凉的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新兴城市，走过了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开始的20余年所走过的历程。从1979年到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从1.96亿元增长到174.46亿元，年均递增45.4%；工业总产值从0.71亿元增长到271.97亿元，年均递增63.3%，创造了引人注目的“深圳速度”。

深圳成功的秘诀何在？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它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率先在全国进行了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试验。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全新探索。

特区创办初期，根据中央的要求，深圳特区的主要任务逐步明确为三条：一是要发展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小平同志要求特区成为“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要发展成为联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枢纽；二是要建设成为外向型经济高度发展的、多功能的综合性特区，成为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的基地；三是要充当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发挥“试验场”作用。

要发挥这三大作用，关键是路怎么走？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可供借鉴和选择的目标模式？如果有，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还是创造性地发展和改造？

事实上，在这13年的探索过程中，可供深圳人参考和借鉴的经济模式大体上有三类：一种是倒回去，走传统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路子；一种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路子；一种是苏联东欧式的改革模式。

我们先来考察第一类。传统的苏联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为：一、国家机关是经济管理的主体，企业附属于机关，并无条件地执行国家的计划任务，没有经营自主权；二、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来指挥整个国民经济与各企业的经

^{*} 本文是深圳市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研究课题之一。原文三万余字，其中部分内容已发表于《深圳特区报》。本刊编发系另外两部分内容，题目为编者所加。本课题组召集人：倪元轲、彭立勋、沈元章。成员：郭灿、杨建和、刘剑平、李万寿、谢昭雄、邓自强。

营活动，排斥市场机制；三、国家以行政命令、行政干预来实现经济管理，忽视经济杠杆的作用。这种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为东欧国家和中国所仿效，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模式的结果，导致了前苏联、东欧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企业缺乏活力、市场萧条、生产力得不到解放，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不是倒回去，而恰恰是冲出这种计划模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也是中央要求特区尽快跳出现行体制的根本意义所在。

作为第二类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几百年历史经验的西方市场经济，大抵经历了从早期自发的、自由放任式的古典式市场经济向现代的掺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混合型”市场经济的发展。

西方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确认，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着市场上的各种力量，企业能以最低的成本组织生产并得到最大利润，消费者能得到较大满足，生产要素所有者能按照所作贡献的大小得到各自应得的报酬，从而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使整个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

但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理论假设。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早期市场所带来的“外部负经济效果”问题、过度投机问题等，也确曾是现实存在。但是西方市场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日臻完善，不断地克服早期市场那种盲目自发的无政府状态、完全放任自由的缺点，建立了某些修正机制。这便是西方经济学界所称道的带有“混合”特征的新的市场经济模式。

混合型市场经济模式采取了某些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有：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如美国；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如北欧；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行为，如日本；通过立法以避免恶性竞争，如德国等等。

这种经济模式一经出现，便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迅速成为美、英、法、日、德、意、荷与北欧诸国的主导经济模式。正是这种模式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在战后获得高度繁荣和高速发展。

西方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培育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无论是市场配置资源机制，还是企业经营机制，抑或是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或市场运行规则等等，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很多甚至可以为我国直接吸纳和移植。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作为一个整体模式，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这就要求我们在吸收全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市场经济的有用成果基础上探索新的路子。

作为第三类的是至今尚未完成的苏联东欧改革模式。苏联东欧改革模式可以说是对于僵化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一种反拨。苏联东欧改革最早可追溯至50—60年代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改革，但是真正影响苏联东欧历史进程的改革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当苏联的经济改革使形势更加恶化时，苏联便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政治自由化导致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迅速发展，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当苏联解体、柏

林墙被推倒、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罗马尼亚等国共产党垮台时，便出现了全面走向私有化的市场经济的局面。

苏联东欧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诚然还不到下最后结论的时候，然而这种以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变，进而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失控、物价飞涨、人民失业等巨烈社会震荡、巨大社会阵痛为代价的“改革”显然已经走入了歧途。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教训从反面印证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根据经济特区所担负的任务和经济发展目标，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标准，十几年来，深圳从实际出发，逐步摸索和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实现了“三个突破”和“三个为主”：突破了单一的公有制模式，探索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突破了传统计划模式，探索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突破了“铁工资”模式，承认差别并鼓励竞争，探索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三个突破”、“三个为主”，一方面是对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突破和超越；另一方面使深圳的经济模式有别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呈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

必须看到，深圳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稳定、社会有序化和社会阵痛最小值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圳办特区的方针就明确强调为经济特区而非政治特区。深圳特区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同时，改革遵循社会阵痛最小值原则，使特区经济改革始终在一种有序化的社会稳定状态中进行。改革必然要触及到各个阶层、各个集团的利益调整，必然要带来社会阵痛，但是深圳经济改革的几项大的举措都是在有序化前提下进行的，从而把社会阵痛压到最小值，使特区经济体制在平稳中转换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来。

深圳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深圳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是特区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深圳，作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排头兵”，它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上所进行的大胆试验，无疑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二、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探索

1. 起步阶段的市场取向改革尝试

深圳特区走向市场经济之路，是一个渐次推进的过程。最初的起步始于引进外资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的突出特点是资金流动和产品销售受国际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这样，大量外资的涌入就要求突破传统的企业管理体制，尊重投资者的主体权益，让投资者在遵守我国政策和法令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地配置资源。深圳特区是在一个原先落后的边陲小镇走出来的，为改善投资环境，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由于国家只给政策不给钱，深圳的基础工程建设资金只能靠利用外资、利用内联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为使这些资金获得良好的投资效果，就必须开放房地产市场，把建筑产

品变为商品，形成建设资金滚动增殖的良性循环；同时，必须开放工程设计和建筑施工市场、建筑材料市场。这就要求突破传统的资金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和劳动力管理体制，允许市场机制进入计划经济的一些传统领地。深圳特区在起步阶段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总体上看仍属于较浅层次的改革试验，但是却引起了资源配置机制的重大变化。

2. 综合配套改革，塑造资源配置新机制

深圳特区选择“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塑造资源配置的新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为此，深圳进行了多方面的互相联动与综合配套改革。塑造新机制，首先要在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经济调控方式上取得根本的突破。从深圳实践来看，政府职能的转变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上，通过简政放权，把微观经济管理权限交给企业，取消行业主管部门，对工、农、建、运、贸实行大系统管理。横向上，把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从政府主管部门分离出来，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行使，实行税利分流，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在纵向放权和横向分权的同时，强化政府的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职能，如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近期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确定土地及基础设施的开发计划等。第二，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切实转变国营企业的经营机制，规范企业行为。通过政府的纵向放权，深圳特区赋予国营企业较大的人财物、产供销自主决策权，并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通过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净资产承包等办法，强化了对企业的指标约束、责任约束和管理约束；对国营企业股份制进行积极的探索，为调整政府与企业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规范；按照“消灭企业亏损、消灭亏损企业”的思路，淘汰了一些劣势企业，使厂房、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经营不好的企业中转移出来，流向效益高、发展前景好的企业；借鉴国际惯例，突破行业分割、高度集权的传统会计模式，全面推行了广泛适用于各类企业的新的会计制度，建立了以真实性、稳健性等原则为基础的会计规范；在税制方面，先后统一了地方税、流转税、所得税的税率及税收优惠政策，并统一了所得税的计税标准，从而基本上实现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增加了企业活力。第三，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经济运行新秩序。深圳特区各类市场发育较快，首先是由于各类市场开放较早，开放程度较高，而开放市场，又首先在于放开经营和放开价格，因为，市场主体的竞争是多方面的，价格则是竞争的基本手段，放开价格是市场发育的必然要求；另一个原因是在开放各类市场的同时，根据市场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逐步健全市场规则，完善市场管理，建立特区以来，深圳已发布了数百项有关市场运行的管理规定，初步规范了各有关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市场的运行也就基本上走上有序的轨道。第四，理顺分配关系，形成协调的利益格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深圳特区最基本的经济政策之一，是以税收和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投资，这在表面上似乎使国家损失了部分利益，实际上，在投资的增长和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了迅速的增长，近年

深圳市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由特区建立初期的10%左右提高到20%以上。为搞活经济,深圳在改革过程中注意尊重和保障企业的利益,按照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进行分配;对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企业自主分配、分级分类管理的办法,密切职工个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好坏、个人贡献大小的关系,促使职工关心产品价值的实现和企业经营的成果,同时注意保障人们依法获得正当的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权利。

8. 合理利用国外市场经济的有用成果

从深圳特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来说,利用人类文明成果主要是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用成果和有效作法。(1)通过办“三资”企业等形式创造性地借鉴和运用了西方企业运行机制、经营管理等一系列经验,培养一大批管理人才,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2)让一大批企业大步走出国门,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到资本主义营地里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就地取材,建厂生产、销售,雇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人才和劳工,为我所用;(3)借鉴西方发展股份制企业的经验,最先在中国采用股份制形式,并用以改造国营企业;(4)引进了西方市场营销办法,利用了西方的市场渠道和销售网络,将所生产的产品大量销往国际市场;(5)吸收了香港、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管理办法,将原有的行业主管部门改造为企业实体,相应强化宏观调控和服务功能;(6)借鉴香港与西方中介组织的作法,成立了一系列行业协会、咨询委员会,充当政府与民间的桥梁,发挥中介、调节、协调作用;(7)参照国外尤其是香港等地区的法律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条例,保证市场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有序化;(8)在努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了西方发展文化市场的有益作法,引进市场机制发展商业文化、繁荣通俗文化,兴建了以卡拉OK、歌舞厅、大家乐广场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市场。深圳的实践说明,只要从实际出发,将学习、吸收和发展、创造结合起来,就能正确利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三、在全国率先形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深圳经济特区过去13年的建设取得了被世人誉为“一夜城”的骄人成就,并已走过了创业和初步成型的阶段。深圳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中,全面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率先塑造资源配置的新机制;广采博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特别是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用成果和有效作法。这些经验不仅对深圳特区今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着示范作用,并提供重要的启示。

再过7年,20世纪就将成为历史,21世纪即将来临。在这跨世纪的过渡时期,对深圳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是经济、技术竞争加剧,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区域化。世界众多学者所看好的亚太地区将处于一个在经济上群雄并起的时代,日本和原来的“四小龙”经济持续发展,东南亚新的“四小龙”正在崛起,连原来经济落后的越南也作出了全方位开放的态势,急起直追。与此同时,世界经济

格局正在重组，国际间产业结构正经历又一次新的调整，大量剩余资金和先进技术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市场。另一方面国内也面临着加快开放步伐，加大改革力度的新形势，沿海、沿江、沿边的多元化、全方位开放格局正在形成。过去深圳享有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而今已不为深圳所独有，其它城市或经济开发区（如上海浦东）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比深圳还优惠。过去一枝独秀的局面目前在五个经济特区、上海浦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是百花齐放。同时，许多省市相继推出的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举措，对提高我们的工作水平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所形成的新挑战，深圳要继续当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排头兵”，发挥改革开放“试验地”作用，将不能只靠政策上的优惠，而应充分利用深圳所处的两种市场（国际、国内）多种文化的交汇点的有利位置，积极探索经济运行的新机制，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以往主要依靠政策优势，逐步转向主要依靠体制优势、功能优势和效率优势。

深圳虽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但是离国际化城市所需要的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系，还有一定的差距。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还难于按市场供求的变动，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和要素重组；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不高，规模和范围还很有限；各种经济法规还不够健全，行为不够规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行政审批为主要手段，靠行政隶属维系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解决。

深圳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要求建立起国际与国内市场相互沟通的现代市场体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深圳初步建立起商品、金融、房地产、科技、信息、人才和产权等要素市场，但是还须完善期货交易、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还须提高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提高对国内市场的辐射力，而且各种要素市场之间的协调、配套和转换机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完善市场体系的同时，还必须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建立起一种现代化的新型企业制度。新型的企业制度，就是要用国际先进的公司管理制度，取代传统的国营企业经营体制。这包括逐步将市属国营、内联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简化投资立项审批程序，将目前的行政审批制改为工商登记注册制；放开企业经营范围与经营方式的行政限制，除了法律明文禁止及特殊行业以外，按行业性质放开经营范围，将特许制改为任意制；取消国营企业的行政级别，通过企业评价，按资产规模、销售额、利税等指标，采取分类定级经济化办法，使企业经营者逐步与行政级别脱钩等等，这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需要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简政放权，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从深圳的情况看，首要的问题是进一步放权。放权主要是下放干部人事管理权和企业、项目审批权。放权之后，政府从直接管理、审批、干预转变为做好

试论珠江三角洲市场的发育成长

王光振 张炳申 林瑞强 丁水保

一、市场发展状况评估

市场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是一个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综合系统，因而市场体系的培育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内容和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珠江三角洲坚持以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率先改革价格体制。从1979年开始，针对原来商品价格与价值的严重分离、农产品价格购销倒挂以及地方、企业没有定价权等弊病，采取了“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价格改革方针，放开了大部分农副产品和日用品的价格，并且下放管理权限，逐步完善价格管理体制。1992年初开始放开粮食销售价格，到目前除了烟叶等少量产品以外，农副产品价格和日用工业品价格均已放开。对生产资料价格，从调整煤炭、钢铁、电子、机械价格开始直到逐步放开计划外物资市场价，形成价格的“双轨制”。在进口物资价格方面，从原来基本脱钩到现在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实行高进高出。改革以后，珠江三角洲产品的价格基本上已由市场来调节。在生产资料物资供应方面，目前在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中由国家定价的产品比重已不足10%。

规划，制定政策，掌握信息，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加强监督，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逐步实行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审计和经济监督。从而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总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深圳要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显示社会主义的活力，就要发挥体制和功能等优势，让市场机制在整个特区范围内成为资源的基础配置者，建立起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的经济运行机制。

邓小平同志说过：“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要实现深圳特区的战略目标，不辱其肩负的伟大使命，就要继续发扬“敢闯”的精神，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不断探索。在全国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90年代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深圳当好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排头兵”的首要任务。

责任编辑：郑英隆

2. 率先改革流通体制。与价格改革相配套,珠江三角洲在1978年以后首先突破传统的独家经营、多环节、封闭式的市场流通体系,建立了一个多家经营、多渠道、少环节的开放型流通体制。改革以来发展起来的这些城乡个体户、农村中的农民贩运专业户、联合体是非常活跃的市场主体,它们在推动商品流通、加快商品交换方面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在改革国营商业体制方面,珠江三角洲打破按行政区划“三级批发一级零售”的局面,实行批零兼营、多业经营、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等等。扩大商业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试行股份制。对小型企业则实行“包、转、租”。珠江三角洲有的市县率先取消商业局、粮食局等行政性机构,组建经营性实体公司,这些公司除了保留必要的行政管理职能外,主要是作为一个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商业企业。目前,一个多层次、充满竞争、具有活力的流通体系已经形成,它与价格改革紧密配合、相得益彰,成为珠江三角洲商品市场发育迅速的主要原因。

3. 积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积极改革传统的金融体制,培育资金市场。首先改革了政企不分的单一银行体制,形成以中央银行领导,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发展的多元化金融体系;改革“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办法;先后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和“实存实贷、相互融通”等办法,对银行实行企业化经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资金市场的培育步伐也逐步加快。在珠江三角洲包括长期和短期的金融市场,金融同业拆借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国际债券市场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最具特色的有三:

一是短期资金市场。80年代中期,珠江三角洲各专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根据“互相融通”原则,运用信贷资金的地区差、季节差和行业差,出现了专业银行系统上下之间、同业之间的相互拆借。1987年,江门市和佛山市分别成立金融系统拆借中心。1990年,根据治理整顿的需要,在融资公司基础上成立佛山市、江门市金融市场,初步形成了以中等城市为依托,并与大中城市联网的拆借中心和不同层次的融资网络。

二是发展长期资金市场。早在80年代初期,广州、深圳、佛山等地就已经出现以发行债券或企业“股票”的形式向社会集资。目前深圳已成为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的全国试点城市之一。到1990年底深圳股份制企业近200家,累计发行股票面值达4.5亿元(其中: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五公司的股票发行面值为2.7亿元)。

三是外汇调剂市场。1985年深圳便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外汇调剂中心,之后广州、珠海等地也相继成立,这就使外汇开始进行交易而初步形成外汇市场,各单位外汇余缺的调剂则通过市场成交,从而使外汇汇率接近于国际比价。

4. 积极进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是通过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来实现的,珠江三角洲这方面的改革不仅起步早,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造就了一个在国内相对较为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珠江三角洲企业的用工呈形式多样、充满活力的状态。在城镇企业新招职工中大力推行劳动合同制,企业和职工通过签订合同确定责、权、利的关系,并规定聘用年限。

在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及部分国营企业中一支新兴的职工队伍“临时工”迅速兴起，这是伴随着珠江三角洲农业劳动力大幅度转移过程而出现的用工新现象。估计已有本地300多万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同时还吸收了外地和外省劳动力300万人，这部分劳动力基本上采取临时工的制度。这些临时工与历史上的临时工完全不同，他们并不是季节性的、短期的补充性职工，而成为相当一部分企业职工的主体。珠江三角洲大量使用临时工的经济意义不仅在于大量地吸收外地劳动力，补充本地劳动力资源之不足；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真正地实现了劳动者与企业的双向选择，职工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企业的招聘和劳动者对就业的选择完全自由；因此，这种用工形式为珠江三角洲培育真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不少地区的国营企业通过优化企业劳动组合，对原有固定工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化管理，使原有固定工也逐步向“不固定”转化。

按照商品经济原则改革工资收入制度是珠江三角洲培育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最为突出的是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工资机制十分灵活，工资收入差别既体现劳动者的劳动贡献，也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因而工资杠杆已经起着引导劳动力流动，调节劳动力配置的作用。目前，“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反映劳动力价格的工资收入和城乡开放型的劳动力流动构成了珠江三角洲劳动力市场的三大要素。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珠江三角洲基本上建成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市场机制作用比较充分，以公有制为主，多渠道、多形式、多种市场主体较为活跃的市场和市场体系。其中市场体系的完整性和成熟性居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具体反映在以下特征上：

第一，区内市场发育比较充分。为了说明这一状况我们使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它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商品总额与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之比，用以反映商品交换的发展程度。根据1989年数据计算，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为85.9%，广州市高达97.8%，深圳市97%，珠海市87.2%，惠州市81.1%，佛山市65.6%，同期中国为59%，发达国家为95%，发展中国家为67.5%。上述数据表明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化指数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第二，市场结构呈较强的外向型和发散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除了大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外，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近年来创汇型农业和出口替代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加上“三资企业”的出口使珠江三角洲的外贸出口出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大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在内的31个市县）1978年出口额仅4.2亿美元，至1990年上升到81.8亿美元，年平均增长28%，其增长率高于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的速度。目前，珠江三角洲的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35%左右，在全部的商品价值中有1/3是在海外市场实现的。这表明这里的市场已达到较高的外向程度，从而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已相当紧密，这是珠江三角洲与内地市场的一个重要区别。另一方面，由于珠江三角洲在建设本地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外省市场，从而突破了过去封闭型的区域市场格局而呈现出对内辐射

发散的开放状态。

第三，市场基础设施和专业市场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各地十分重视发展商品交换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因而许多市县提出发展“大市场、大流通”的发展目标，积极改造旧市场，建设新市场，有力地改善发展了市场体系“硬件”；与此同时，各地根据本地的优势和特点积极发展专业市场，有效地促进了市场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第四，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珠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了多种活跃的市场主体，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珠江三角洲的一般市县，集体所有制工业所占的比重超过国营工业，而“三资”和其它所有制工业又占有一个相当的比重。乡镇企业具有完全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没有计划原材料和计划市场的配合，实行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制度，这就促使乡镇企业一直面向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发展。

第五，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形成较早，覆盖面较大。珠江三角洲在全国较早地、成功地进行了价格体制和流通体制的改革，这是商品市场机制在这里较早形成的主要原因。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使各种生产要素不同程度地被推向市场交换，从而形成了生产要素价格和生 产 要 素 市 场 机 制 的雏型。

二、若干主要启示

1. 把价格改革作为培育市场机制和完善市场体系的突破口

十多年来，广东和珠江三角洲通过价格改革，逐步建立了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的新的价格体制，市场机制日益广泛深入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繁荣了市场，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加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没有价格改革的突破就不会有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完善。

在价格改革上，珠江三角洲的经验有两条值得我们借鉴：

其一，价格改革要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必然会导致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引起各部门、地区和人们的收入变化。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各方面关系，以确保价格改革积极、稳妥地进行。珠江三角洲的价格改革走了一条 价 格 改 革——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提高——再推动改革的路子。大多数市县做到了经济发展速度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国民收入增长高于人民实际生活提高的幅度，职工工资收入增长高于物价的增长。

其二，价格改革是一项任务十分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如何把长远的改革目标和现实稳妥作法结合起来是一项领导艺术，珠江三角洲在价格改革上，探索出“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具体作法。用逐步放权、放活、放开的办法，从根本上改变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并对不能放开的价格，进行逐步调整，改变不合理的比价、差价关系，使价格反映价值和供求。

价格改革不搞一刀切、齐步走的办法，对不同商品进行分类改革。如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深圳价格政策放得最开，除国家和省管的航空、铁路、船运、公路、邮政、电讯等价格和收费外，其余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带、平原、山区，采取不同程度地放权。价格调放的范围、时间、比重、价格水平，都允许有所差别，实践证明，采取不同的价格政策和改革措施，是价格改革取得顺利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2. 要使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重塑市场主体，增强企业活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和基础，企业如果不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它就不能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市场机制也就不能起作用。在传统体制下，国家行政机构直接计划和指挥企业的经济活动，代替企业从事经营。这种干预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运行的主体不是企业而是国家。即所谓市场主体的错位和缺位。只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才能发挥合理调节社会生产，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通过大力发展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及深化国营企业的改革，塑造了一大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企业，这是珠江三角洲经济迅速发展的源泉，也是市场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从这个意义讲，珠江三角洲市场活跃正是市场主体多元化的产物。

珠江三角洲在培养市场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那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呢？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在坚持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大力扶植和发展其它各种所有制成分，包括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国传统的国营企业排斥市场和商品经济，因此凡是国营企业占的比重较高的地区和部门，经济发展往往受到制约，而其它非公有制成分又是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因此，在改革开始，多注意发展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第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之成为农村市场的主体。自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伴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践而异军突起，并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其生产和经营活动都以市场为导向，企业的产、供、销，整个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市场连成一体。实行以需定产，根据价值规律要求，从市场取得生产要素，并实行优化组合，以市场需求为依据，确定自己的产品销售战略策略，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自主权比较充分，没有国家计划的限制，没有条条框框的制约，灵活性大、自主性强。因而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新机制首先在乡镇企业萌芽。目前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总产值中，乡镇企业的产值一般占60%以上，成为农村工业化和整体经济举足轻重的力量。乡镇企业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长足的发展，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料不及的一大成就。

第三，大力兴办“三资”和“三来一补”企业。珠江三角洲利用自身具有的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优势，抓住机遇大胆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各类外商投资企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外商投资企业对于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广东省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不仅在

于引进了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扩大了出口创汇，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在于它们作为完全按照国际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运作的企业，广泛采用了国际上生产和经营管理中的科学方法，从而为中方合作者及其他国内企业了解国际经济运行作通行的规则，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3、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要因素。

首先，发展外向型经济，客观上要求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健全的市场机制，以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对接。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为确保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珠江三角洲进行了比全国步伐更快、幅度更大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率先推进价格改革，形成了一个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体制，注重市场的发育，加快要素商品化和市场体系化的改革进程，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日益健全的市场环境。

第二，发展外向型经济能够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熟悉国际惯例。

第三，发展外向型经济，极大地拓展了珠江三角洲市场经济的发展空间，使社会再生产的循环由过去的封闭式内向循环转向依靠国际市场实现的开放式外向循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的优化配置。通过对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和参与，广东的对外经济联系已扩大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解决了广东1/3以上的社会产品的外销渠道。

4、要形成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新机制，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市场机制的发育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但这决不意味着它自发成长。相反，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发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

从政府宏观调控方面看，珠江三角洲市县各级政府，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中普遍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作用，不能用过去那一套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干预的办法，而必须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调控办法。通过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及加强规划、监督、协调等措施，初步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基本上解决了政府部门越俎代庖，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问题。首先是对公有制企业真正下放生产经营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第二，制定和实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把握地区经济发展导向，指挥和组织经济运行；第三，从各方面协调关系，扶植企业发展，为企业排忧解难；第四，考核、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形成政府对企业的调控和激励机制。

5、在建立市场运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完善法规，加强管理，规范市场秩序。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强市场管理和监督，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确立市场运行新体制的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需要使市场充分开放，从而使竞争

迈向2010年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

广东省信息中心课题组

一、战略：跨越重化工业阶段

关于广东的产业发展方向，选择什么战略，目前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中存在一种争论：是否按部就班走重化工业道路。我们认为，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省应该跨越重化工业阶段，实施协调发展战略。主要有如下理由：

1.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建国初期，广东的工业是一个超轻型结构，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0—90%，这固然因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但不可否认轻型工业是有优势的。六、七十年代，与全国情况一样，因受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以钢为纲”思想指导，不顾历史形成的产业优势和自然资源情况，工业投资重心却人为地转向重化工业部门。“三五”、“四五”、“五五”三个五年计划时期，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89.04%。但是，1980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94.87亿元，其中重工业新增产值77.82亿元，占39.91%，轻工业新增产值117.09亿元，占66.01%，而此时重工业的投资是轻工业的7倍，新增产值却仅相当轻工业新增产值的66.43%。投入产出反差大，经济效益低下。然而到80年代，又不得不重新发展轻纺工业。显而易见，广东工业已走了一条“轻纺——重化——轻纺”的发展弯路，应该引以为戒。

2. 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限制。

发展重化工业必须要有丰富的矿产业自然资源作保证。广东矿产资源拥有量处在全在公正、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不受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因素的干扰，但是，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需要国家采取各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和控制，引导众多的微观经济活动符合社会利益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使市场行为规范，有序。如果市场运行不规则，市场上充斥投机诈骗、掺杂假冒、缺斤少两、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等违法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的发育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市场机制就难发挥正常的作用。市场上的混乱状况，还会使生产者特别是消费者对市场的开放产生反感，进而增加开放和发展市场的难度。因此，市场的开放和市场秩序的建立，必须同步进行，才能促进市场的发育，给市场带来活力，促使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广东省财办

责任编辑：谭湛明

国的中下水平，并且优势在有色金属方面，而作为重化工业的原料，如煤、铁矿、石油等储量少，布点散。广东地处中国大陆的最南端，远离重化工业的资源基地。如果发展重化工业，从省外调进原材料，运输量大，运输线路长，这将提高生产成本，也将加剧交通运输的紧张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广东重化工业基础薄弱，大型骨干企业少，没有与之配套的工业体系，发展重化工业的难度较大。

3. 资金缺口难以弥补。

资金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广东的经济发展同样面临资本短缺的问题。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重化工业必然加剧业已存在的资本短缺。1989年，全省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石油加工业、化学工业、化学纤维工业、黑色金属冶炼业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行业的万元产值所需固定资产原值分别0.52、0.48、0.62、0.69、0.41，而食品、纺织、医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万元产值所需固定资产原值分别为0.49、0.57、0.28、0.31。轻纺工业部门万元产值所需固定资产原值普遍低于重化工业部门，也就是说发展重化工业比发展轻纺工业需要更多的资金。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处在大发展时期，能源、交通、城市建设等任务繁重，需大量建设资金，如果选择重化工业道路，能否筹措到足够的资金（特别是引进外资），将是一个大问题。并且，重化工业一次性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加之基础薄弱，配套能力弱，将影响到重化工业的规模效益，最终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4. 能源供应难以保证。

重化工业部门是耗能大的部门。从1990年全省工业各行业万元产值耗电（千瓦时）情况看，食品、纺织、医药、金属制品、机械、电气和电子制造业等部门为0.2519、0.1097、0.0524、0.1957、0.0814、0.0399，石油加工、化学、化纤、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业分别为0.1616、0.2016、0.1934、0.6993、0.2242。重化工业部门普遍高于轻工业部门，万元产值耗电相差最高达十几倍之多，就是说生产出相同价值的产品，重化工业部门比轻工业部门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如果在90年代大力发展重化工业，那末目前30%用电缺口定将继续扩大。能源的严重紧张，无疑将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

5. 产业优势和产业链出现“断层”。

80年代轻型工业的崛起，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广东全省的优势产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现在的问题不是轻型工业已经发展过头了，而是深加工程度不够，其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另起炉灶，人为地转向发展重化工业，无疑是扬“短”避“长”。同时，由于重化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在短期内不可能形成优势产业，这样优势产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断层”，从而使整个地区丧失经济发展的大好时光。从产业转移角度看，珠江三角洲轻型工业优势的形成直接得益于港澳地区的产业成功向内地转移，就象南朝鲜重化工业的兴起是受益于日本重化工业的转移一样。应该看到，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联系密切的港澳地区并无重化工业的优势，甚至

可以说重化工业非常薄弱，广东与日本及欧美等有重化工业优势的国家的产业联系并不强。因此，广东如果走重化工业道路，不利于充分借助港澳的优势，很可能走的是一条自力更生式的相对封闭式的道路。

二、趋势：迈向后工业化社会

根据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现状和国内外环境分析，我们认为未来20年珠江三角洲将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产业结构变动的总趋势是：农业将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外向化和城郊化，形成优质、高产、高效的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工业将强化轻型优势，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过渡到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形成以高新技术为新成长点的支柱产业群，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制造业中心之一；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将快于第一、二产业，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心城市（如广州、深圳）将建设成为内外辐射力强劲的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最终形成三大产业紧密关联协调，与国际经济体系交融，宏观经济效益高，具有自我升级转换能力的产业体系。2010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将为3：28：69。

具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三大产业的基本走向是：

第一产业：在三大产业中，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将会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不要发展，相反，农业将由传统型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农业发展主要方向有：

（1）农业经济商品化。当前珠江三角洲农业已经突破自给、半自给的传统经济模式，开始进入商品经济阶段。未来的发展必然是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商品率。种植业将逐步打破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格局，经济作物、出口作物等高附加值作物大大增加，而由此引发的粮食缺口问题将通过市场交换加以解决。渔业生产将由“大路货”向名、优、特、新产品转化，提高商品档次和商品价值。在畜牧业方面，将调整饲养结构，发展节粮型饲养业，以适应粮食生产减少的趋势。

（2）农业生产专业化、集团化。当前农业生产方式主要还是由农民各家各户单独完成，基本上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农业生产方式将向专业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围绕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将按专业化原则形成一整套的农业服务体系。农业将逐步推行“贸工农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的集团式经营，提高农业规模效益。

（3）农业发展外向化。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长期以来就是港澳地区的农副产品供应地。珠江三角洲具有独特的亚热带农业资源，发展种植业得天独厚；珠江三角洲有很长的海岸线，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淡水资源。珠江三角洲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优越的经济资源为发展创汇农业奠定了基础。要在充分利用陆地资源的基础上，以发展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和滩涂养殖业为突破口，使创汇农业上一个新台阶。

（4）农村经济、社会城镇化。乡镇企业崛起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力军，使珠江三角洲

农村已经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乡村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随着镇区村级工业的继续高速增长，生产要素越来越集中在镇区，将带动了镇区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镇区向城市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目前城市难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流向镇区，流向乡镇企业，从而加速了农村社会城镇化进程。与此同时，农业城郊化的特点更为显著。

第二产业：在未来20年中，第二产业在前期将保持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期将逐步让位于第三产业，从而使经济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第二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继续以轻型工业为主体，突出发展机械电子工业。通过技术进步来筛选和优化支柱产业，扩大外向型产业群体，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有选择地发展也是为轻型工业服务的重化工业部门。大力发展建筑业，使其成为支柱产业之一。

第二产业升级的核心问题是支柱产业的确立。我们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支柱产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选择支柱产业应该遵循以下的原则：（1）市场原则。市场需求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出发点和动力。如果对于某地区来说有稳定的永恒市场，那末它完全没有必要调整其产业结构。事实上，市场需求变化多端，只有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才能适应国内外多层次的市场需求变化。（2）产业国际化原则。产业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未来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将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就要求其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有自己的地位，成为国际产业链中的一环。随着本世纪末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祖国，粤港澳经济合作必将向高级化、国际化方向发展。（3）技术进步原则。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现状是以劳动密集的轻型工业为主，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是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产业升级，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跳跃式过渡。（4）比较优势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珠江三角洲的地区优势，扬长避短，择优汰劣，大力发展投入产出效率高，产业关联性强的产业。（5）层次性原则。由于市场需求具有层次性，技术水平具有层次性，在产业结构的调整的优化上要注意产业间的层次性和协调性。

根据上述原则，第二产业中的支柱行业应包括：（1）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新兴电子工业。前十年大力发展量大面广的中低档消费类整机及通用元器件的生产、装配、加工，形成经济规模，同时积极发展计算机、通讯、机电一体化产品及关键基础配套件，如集成电路、发光液晶显示屏、新一代元器件等。后十年重点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使产品技术达到世界先进国家的中等以上水平。（2）以汽车工业为龙头，以机电一体化为标志的机械工业。汽车工业以轿车、轻型汽车为龙头产品，通过汽车工业这个骨干带动整个行业发展，提高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品，逐步形成一批以轿车、摩托车、高效精密机床、成套机械设备等为主的新“广货”。（3）以生产高档纺织品和服装、优质食品饮料、医药为主的现代轻纺工业。轻纺业是珠江三角洲现有的优势产业，轻纺业的发展方向是上层次上水平，要面向国内外两个市

场，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为主，调整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发展新产品新品种，提高产品档次。重点发展轻纺材料，扩大出口生产。生物发酵食品行业要建成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产品开发体系，成为食品工业的主要行业。（4）以海洋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界定了产业发展的未来走向。珠江三角洲要加强在世界经济实力角逐，必须要抢占高新技术产业这个制高点，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流。前十年重点建设好广州、中山、深圳等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其它试验区，使其具有一定规模并形成产业化，且对相邻地区有一定的辐射功能。后十年重点将各高新技术区联成一片，形成有巨大影响的高新技术产业带。（5）建筑业。为实现广东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在未来20年内，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建设规模将日益扩大，大量投资大量建设形成了大量的建筑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的要求将不断提高，也将刺激建筑业的发展，因此，建筑业将迅速成长为又一大支柱产业。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将全面高速发展，逐步赶上第二产业，最后超过第二产业位居三大产业的首位。第三产业的内部行业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流通类和产业服务、个人服务类。流通类包括商业、物资业、对外贸易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和仓储业等。产业服务和个人服务类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咨询业、信息业、各类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居民服务业、科研事业、教育文化生活事业，以及其它有关产业服务和个人服务的行业。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历程揭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上，流通类比重下降，产业服务和个人服务类比重上升。根据珠江三角洲第三产业的发展现状，第三产业的未来发展在前期重点将在流通类的行业，而在后期产业服务和个人服务将逐步赶上和超过流通类的发展。从发展趋势看有如下的特点：

（1）商业、物资、外贸一体化，形成全社会大商业格局。当前，商业、物资、对外贸易“三足鼎立”，从物流的角度看，仍处于“小流通”、“半流通”状态，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促进内贸、外贸和物资经营一体化。对全社会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形式商业统一政策、统一管理，造就平等竞争条件，创造畅通的物流环境。

（2）对外开拓，对内辐射，建立和完善面向国内外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不仅包括货物市场，还包括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市场。当前除货物外，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还没有形成市场。培育完全的市场体系无疑是首要目标。珠江三角洲地处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接的结合部之一，所以沟通全国统一市场和开拓世界市场，在国内和国际交流中发挥枢纽和辐射作用，是珠江三角洲的市场体系建设的又一目标。

（3）多渠道多形式融资，逐步成为内外辐射力强劲的金融中心。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随着粤港澳经济合作向高级化发展，将逐步形成“大香港”开放经济圈，为珠

江三角洲的部分中心城市成为金融中心提供了机遇，广东以及全国的经济迅速增长为此提供了客观可能。资金市场要发展多种金融机构，使资金筹集渠道和形式多元化。积极发展债券、股票、委托投资等多种融资工具和融资方式，开拓长期资金市场。

(4) 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建成追踪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的基地。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区和试验区开发的不断深入，科技日益产业化，研究与开发能力将不断加强，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发展将日趋成熟，珠江三角洲将在科技实力、人才和信息资源等方面领先于全国，成为追踪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的基地。尤其是信息业，随着其商品化、产业化及与电子技术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必将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5) 社会事业社会办，发展多功能的社会综合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会综合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将从无到有，从低级向高层次发展。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交通运输、通信邮电、各种技术服务等行业将优先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居民生活的需求和消费构成由生存型扩展到发展和享受型，居民生活服务将社会化和高级化。

三、政策设计：倾斜与配套

为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成功地升级转换，关键是要制定系统配套的产业政策。所谓产业政策，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以产业结构政策为核心，由产业组织、市场、资金、技术和监控等诸政策与之相适应的综合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坚持倾斜与配套相结合的原则。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构想的产业政策及其配套措施能否顺利贯彻下去，取得预期效果，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央必须继续给予广东在经济发展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个中首要内容是把产业政策制订权下放到省，允许省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调整产业结构。如果象目前那样，全国实行统一的没有地区差异的产业政策，省级只能执行这一刀切的政策而没有权结合当地实际制订产业政策，那么就会增加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难度。

设计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政策，我们认为需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 产业结构政策。主要任务是明确产业战略，选择主导产业群，设计可以协调运转的产业整体结构，确立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同阶段，适时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主要内容包：三大产业的构成和变化趋势；主导产业群的培养和选择；行业内部结构优化；产业的区域分布等。当前首要任务是将全省赶“四小龙”构想中有关内容细化为规则，贯彻下去，并在实践中修正。

(2) 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的核心是企业组织政策。企业组织政策的根本任务是针对目前企业小型化及由此带来的高耗、低效分散等问题，通过一系列重组活动，实行规模经济、规模经营。重组企业组织的途径包括两方面：一是以规模效益为原则组建企业集团，使企业向“大型化”发展；二是以专业协作生产为原则，进一步提高专业化

生产水平来优化质量的小型企业。

(3) 产业市场政策。基本目标是建立向国内外立体开放, 保证企业可以充分地、平等地竞争, 各种生产要素可在产业间有序流动的产业市场, 从而强化各产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催化和完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是产业市场政策的当务之急, 目前劳动力、生产资料、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虽有较大发展, 但总的说来还是初级的、不完善的, 如果不加快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 产业结构优化目标将很难圆满有效地实现。

(4) 产业资本积累政策。首要内容是资本倾斜积累政策, 通过投资倾斜来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投资集中投向重点产业, 用预算内投资去贴息、低息贷款、合作经营、参股控股等方式通过投资方向调节税, 重点产业优惠利率等手段来调节资金的流向, 使资本向利于产业优化方向积累。其次, 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起有利于金融资本参与产业资本的新机制, 增加和扩充两者的融通渠道, 以改善企业效益, 优化产业结构。

(5) 产业技术进步政策。其基本思路是: 填平补齐, 运用技术进步政策, 消除产业结构整体优化中的瓶颈。对影响产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重点解决, 有重点地突破高新技术; 全面提高实施“自立开发与引进并举, 目前以引进和消化吸收为主”的技术开发策略, 普遍地、大面积地提高国民经济技术水平。对采用先进技术和生产标准生产, 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扩大税收、贷款等政策优惠。促进技术进步要有相应的人才倾斜政策与之相配套, 通过重奖让科技人员先富起来及改善工作生活环境等手段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

(6) 产业调整的监控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过程, 因此必须建立优化产业结构的监控体系, 包括产业信息反馈系统和产业调控体系。信息反馈系统最重要的是一套完备的指标, 不仅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而且要有产业变化动态的先行指标、同期指标、滞后指标兼备, 通过对产业信息的及时采集、传输, 能起到对产业现状进行监测, 产业变动态势进行预警的信息系统。然后, 根据产业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 产业调控体系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引导等手段, 对产业进行宏观调控。金融、财政、税收、价格、汇率等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手段, 必须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为目标进行配套。

课题负责人: 聂周荣

课题组成员: 聂周荣、陈芳利、颜小珂

执 笔: 颜小珂、聂周荣

责任编辑: 谭湛明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房地产市场

——珠江三角洲透视

谭湛明

一、房地产业的发展及市场阻滞因素

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还应包括生产要素市场,房地产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因而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组织房地产生产要素的流通、循环、增殖,使它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房地产这种生产要素,也只有引进市场机制,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因此,建立和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房地产业是城市重要的稳定的财政来源,我国沿海开放城市及珠江三角洲的实践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80年代初期,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房地产业异军突起,其后数年便在广大沿海开放地区开花结果。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房地产业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已日益显示出来。1991年,全国房地产业已形成了一支拥有238亿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队伍,开发公司达3700多家。全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31.7亿元,房产税收入37.2亿元,房产交易的契税收收入1.87亿元,房地产开发企业纳税20.45亿元,仅这几项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3%,珠江三角洲地区,房地产业创造的财政积累的比重还要更高。深圳市能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到今天具有国际意义的综合性城市,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搞活了房地产业,通过房地产业的开发、经营和流通,为基础设施的建设积累了资金。“七五”期间,我国向个人出售商品房回笼货币150亿元,向个人出售旧公房回收货币56亿元,房租收入160亿元;自实行土地有偿出让制度以来,到1991年8月共出让土地2500公顷,收取土地出让金24.7亿元。在利用外资发展房地产业方面,成绩也是显著的,尤其广东,近年随着大批港澳外商地产公司的涌入,使房地产业掀起了一股股热浪。1991年,全省对外商售房外汇收入1.3亿美元,1992年上半年,注入房地产业的港资已超过1991年的总和,三成以上的房地产业有了外资的成份。部分港澳投资商认为:内地居民对住宅需求不断上升,而且基本设施亟待改善,投资少、收益大,因此市场前景看好,这是吸引投资者的极重要的原因。然而,面对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珠江三角洲地区房地产市场显

得规模小,发展不平衡,发育不健全,还远远未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主要表现在:(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低;(2)房地产收益占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低,由于土地使用制度的不完善,政府土地收益大量流失,房地产业对财政的贡献还不小;(3)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相互促进关系远未形成。如香港地产公司股票值占股票市场的30%,房地产贷款占金融贷款的三分之一,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房地产贷款不仅比例低,并且主要是对开发公司及建筑企业的贷款,对购房的单位和私人贷款才刚刚起步。具体来说,当前珠江三角洲房地产市场发育的阻滞因素有:

1. 房价在“限制”与“放开”中徘徊,由于存在并存的双轨价格,开发公司或个人以限价买到住房,通过完全放开的二级市场以利润惊人的市场价转手出让。政府大量收益流失于有资金支付能力的个人或企业手中。而且,许多手中握有大批房子的开发公司,更不愿意以限价抛售住房,人为造成供求关系愈趋紧张。

2. 历史划拨用地与当前有偿出让土地两种土地管理模式的摩擦,前者用地没有支付地价,发展成本低,形成不公平竞争。

3. 以实物地租以及非公开的招标、协议为主体的出让土地方式,一方面,掩盖了地价信号,难以反映真实地价,不利于土地的资产化经营,使建立基准地价缺乏参照依据;另一方面,出让地价(特别是对外商)往往大大低于实际市场价格,在出让土地的同时,地价严重流失。

4. 基础管理工作严重滞后,建设用地选址大大超出城市规划的控制范围。控制性、实施性规划工作跟不上。

5. 一些乡镇不依照国家法律,超越权限大片批出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直接冲击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经营。有的外商不仅可以低价获得土地,而且囤积土地等待升值,或开发经营后才缴交地价。非法批租土地,不断使国家蒙受巨大地价损失,将来也会带来严重的土地纠纷,以及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6. 对有偿出让土地的运作不熟悉,管理国土和房地产的专门人才不足。

7. 房地产税收体系尚未完善和系统化。目前深圳、惠州等地已开征土地使用费、土地增值费、房地产税等,但还跟不上香港和发达国家的做法。

二、房地产商品的特殊性 & 建立房地产市场模式的设想

房地产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它们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房屋是劳动产品,用来交换则成为商品。土地是自然物,但用来建造房屋,已经是在自然的土地上投入劳动或资本,用于交换则成为商品。

房地产商品的个性表现在:(1)房地产商品是不动产。房地产商品的交换只有商流,没有物流。商流可以多次进行,而物流为零;(2)房地产商品使用价值广泛,不仅是人们基本的生活资料之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除了能实现自身的使用价值外,还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发挥房

地产业所特有的高附加值和先导性、基础性的产业优势，通过房地产的开发与经营，实现房地生财、滚动发展，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3）价值大价格高，保值和增殖能力强。房屋和构筑物造价高，并含各种税费（如城市土地占有费），实物形态也大；（4）地产是稀缺资源、短线产品。土地是自然之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那些适合于人们使用的土地相对减少，使土地的占有与使用的矛盾日益突出，级差地租增大。（5）房地产是大宗耐用消费品，需要量大，人人都需要住房。房屋消费寿命期长，更新慢。（6）房产和地产的实物形态、价值形态和权属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包容。

正因为房地产商品具有以上特性，因此，在构建其市场模式时，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结合起来考虑：

第一，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商品主要是房产和地产，所谓房产交易，既有房屋所有权的交易，也有在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条件下的房屋使用权的交易。在我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所谓地产交易是指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与所有权相分离后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这种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地产商品，是以土地的有偿使用和出让、转让等形式进行的。

第二，房地产市场必须以土地的有偿使用为中心来建立。以土地有偿使用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市场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市场”是指土地（包括新增的土地和旧城改造拆迁后的空地）经过加工后，达到“三通一平”或“七通一平”要求的建筑地段，按照有偿有期的原则出让给使用者。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一级市场”由政府垄断经营，在地方就是由代表市政府的房地产管理部门经营，其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染指。开发企业按出让合同建好房屋，出售租赁房地产为“二级市场”，“二级市场”一般都是在独立法人之间进行的。其它单位和个人之间转让或出租房地产为“三级市场”。随着改革的深化，“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应逐步放开，国家则从二次以及多次转让的增殖部分中，以一定的形式收取一定的增益。即是说，政府垄断房地产的一级市场，并间接调控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调控的手段包括制定土地供应计划、地价、税收、银行利率等。

第三，积极培育和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房地产市场是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一个有机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房地产本身又包括各种形式的子系统，从而使它自身又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市场体系。就珠江三角洲目前发展情况看，这一市场体系应包括：（1）土地市场。即以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有期出让和转让形式让渡给需要得到该块土地使用权的需要者，出让的具体形式有拍卖、招标、协议等。（2）房地产开发市场。这是以改变原有房地产使用性质，或提高该块房地产经营效益的交易活动。（3）房屋交易市场。这是以出卖房屋的产权或使用权的交易活动，有现货和期货两种方式。（4）房产租赁市场。即房屋产权人以收取租金的形式，把房屋的使用权让渡给承租人。目前居民、职工以签订租约形式租住公私房屋的，就属于这一类。当然，目前的公房租金远未达到商品房租金的标准，这要通过住房制度改革逐步达到。（5）房屋互换市场。即以房

产实物互易的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既有有偿，也有无偿；既可以是产权的互换，也可以是使用权的互换，通常以自由协商形式为主，也有通过中介人进行的。实行住房私有化后，这类行为将会大量产生。(6) 与外资合资经营房地产市场。这是一种特殊的房地产市场，随着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资后，这类交易行为将会大量出现。目前，一般以土地或连同地上的建筑物作价入股的方式为多。

第四，房地产的交易应该是自由的，但管理必须是严格的。一切房地产交易都应通过统一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严禁非法交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地产一切交易活动都必须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内进行，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综合性的广泛的概念，只要是按照国家规定办法进行的，无论在场内或在场外，都应视为是正当的交易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政府的房地产主管部门负有特别重要的职能。但是，目前这个部门的管理体制显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需要，必须转变职能，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笔者认为，是否可以按三个组成部分来重新组合，以明确各自的职责：一部分是专门从事房产经营的，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企业，包括对出售房屋的售后服务和小区管理。一部分是提供有偿服务的事业性质的，如提供交易场所、信息，接受委托代办房地产交易，房地产资产估价，危房鉴定，有关房地产业务的咨询等。一部分是行使政府职能的主管部门，贯彻国家有关房地产的政策法令，制定有关房地产市场交易的地方法规、条例、仲裁纠纷，施行房地产的产籍管理等，对各类从事房地产企业的资质审查，代表市政府经营“一级市场”，以及对全社会房地产的行业管理等。

第五，应该建立地方性的房地产金融业。房地产金融业是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综合体系，它是通过金融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筹集社会各方面闲散资金以及相关的长期的固定的基金，专业服务于融通和支持房地产业在生产、消费、流通三大经济活动中的合理资金要求。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房地产金融业是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突破口，它是金融业支持房地产业发展的一种经济方式，是房地产经营的金融管理机关。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城市财政的三分之一与房地产有关。然而由于传统的视住房为固定资产投资而非商品的观念尚未排除，各级政府仍习惯于行政干预，造成现实存在的一些阻力。如房改金融业尚无统一的政策，运作难度大；新旧体制矛盾重重，令人无所适从；宏观调控不力，银行间时有冲突发生。为减少重复投资，促进房地产协调发展，培育房地产市场，吸引内外资金，应尽快建立以多家银行共同参与的房地产金融体系。按照房地产业的特点和金融实际，制定统一的信贷、利率、准备金等政策，改变以往基本建设管理体制不适应的方面，如立项验资、三算审查等。戒除任何形式的垄断，使各家银行靠优质服务在实践中去竞争。

三、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房地产市场的对策

第一，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土地市场。具体来说可分为土地批租市场和土地转

让市场。为了保证土地市场的正常运行，使城市土地的使用发挥最佳的总体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的统一）。关键在于政府如何搞好对土地市场的调节，也就是政府通过采取经济的、法律和行政的手段来影响土地市场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控制土地使用权的流向，从而实现城市规划所制定的土地利用总目标。

1. 各地不应一次性地大面积地出让或转让土地使用权。土地有偿使用以后，其收益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级差地租是随着时间和投资环境变化而不断增值的一个动态值，一次过多地出让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给经营者（包括内商和外商，以下同），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土地收益上的流失。一般情况下，应按开发者的投资金额（首期到位的资金）确定出让或转让土地的数量。如果开发者的发展计划比较庞大，可将其发展规划送交地方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可按其规划，将其周围的土地控制起来，然后按投资者每年到位的资金，以当年的地价，将相应之土地数量有偿出让给开发者。

2. 未经开发增殖的土地一般不宜出让。城镇规划控制区和控制区以外的土地，应变生为熟后再行出让、转让。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为开发商创造了发展的条件；二是为政府增加了收益。一般应由政府按城镇大小指定几家有一定资信条件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重点从事土地开发工作，通过归口转让将土地的收益全部控制在政府手里。

3.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一般均应采取招标或拍卖的形式。为此，要建立完整的运作机制和公正的管理机构，要避免行政指令和个别领导说了算的现象。

4. 规划管理部门一定要严格按总体规划的要求控制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目前珠江三角洲相当一部分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迫使规划部门放宽容积率的要求，以提高所谓经济效益。一些市县由于规划管理部门管理不严，致使容积率指标大大超过规划的要求，结果使人口密度大大提高，新建的马路和各种管线断面很不适应。新建不久的城区又面临着改造的任务，这将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必须严加控制。

5. 要管好行政划拨之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国家给机关、学校、体育、公用事业单位划拨的土地多为无偿使用，或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费用。对于这类土地（多半是在城镇的建成区），如果确要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进行经营性开发建设，一定要到规划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并按各地规定向有关部门补交地价款。凡私自进行经营性开发者严加查处。经批准进行经营性开发建设的，其土地使用权应随着上部建筑物的转移而转移。

第二，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放开商品房价格。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广东许多生产要素都已纷纷进入市场，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行调节其价格。而房价却在“限制”与“放开”中徘徊，从而扰乱了市场秩序和市场的正常发育。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完全放开境外售房价格，拉大了境内房价差距，出现了低价购买境内住房，高价境外抛售的现象；另一方面内地企业与外商企业税赋比是55：33，一些具备开发能力的内地企业为了税赋优惠，宁愿找一个外商合作而不乐意独立开发。要让内地企业与外商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政府就必须将房价彻底放开。应由开发公司自主经营，根据市场及企业需要自行调节房价，一改目前由政府人为地制订利润标准

的做法，从而避免“三炒”现象的蔓延，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全面发育。深圳特区近年在放开房价方面的一些做法，就很有借鉴意义。一方面，深圳特区的商品房价格，包括住宅、单身公寓、工业厂房、写字楼、仓库等，从来就不限制售价。价格随行就市，由市场自由调节，完全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深圳市政府是通过征收土地增值费来调控市场价格的。很显然，用经济手段来管理比用行政手段更有效，更能遵循商品经济的规律。开征土地增殖费，既合理解决了超额利润的再分配问题，也不失为调控房地产价格的一种手段，可谓一举两得。另一方面，两个市场，多种价格。深圳将房地产市场分为内销市场和外销市场两个部分，其中：内销市场包括福利房、微利商品房、商品房，外销市场指涉外商品房。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进行管理，政府每年都作出商品房的外销计划，外销数量控制在整个市场供应总量的10%左右。外销房仅限于境外人士购买，且以外汇结算，国内人员即使拿外汇也不准购买。对两个市场四种房屋的土地供应及销售价格均采取不同价。内外销房价的巨大差异，诱发了房地产开发公司激烈争夺外销权。政府把这种竞争导向经济竞争，即采取“认地不认人”的政策，谁通过土地招标、拍卖获得外销用地，谁就拥有外销经营权。过去由政府指定某公司可以外销商品房的“特权”一律取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实行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政企分开是必然的。这种“转换”和“分开”应该与房地产市场的发育程度同步，并应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逐步调整。目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把可以实行经营部分的职能分离开来，加以归并，成立自主经营和独立核算的企业。二是把可以采用有偿服务的事业性质职能分离出来，单独设立面向社会服务的机构。这些职能包括业务咨询、承接委托、危房鉴定、资产评估等。以上的调整，不应局限于原有机构框架，也不应受地域的局限。这种组合应一开始就基本上具备独立核算、自求平衡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政策的依赖。

第四，积极引进外资，使房地产市场趋向成熟。在引进利用外资发展房地产市场的过程中，一是要搞好宏观调控，合理确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结构，对外资经营房地产进行严格管理；二是重点加强利用外资合资、合作和境外售房中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三是建立外商投资房地产项目预审制度，由建委统一负责对拟立项的项目用地、规划、产权审定后，再由外经部门批准立项及合同；四是注意将引进外资与城市基础设施紧密结合起来，如地下铁道建设、旧城区改造项目等；五是注意外商投资要及时到位。即如何使外资房地产企业按合同规定的要求，使投资额度按时按量投入使用。从珠江三角洲的现状看，还缺乏有效的跟踪监督机制，一些外资房地产企业批准成立后，外商没有按合同规定的额度和时间投入资金，而往往是通过预收购房款或向中方银行贷款解决，因此有必要建立起包括外资房地产企业审批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银行在内的跟踪和监督机制。

第五，成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适应迅速发展起来的房地产市场，要逐步成立房地产专业银行或住房储蓄银行，分别对房地产业与个人的住房投资进行管理。房地产专业

银行的融资渠道是多元的：1.原有资金的转代。即将原来用于住房生产经营消费基金集中起来形成国家、企业、个人三级住房基金，具体地说，包括（1）各级财政用于住房的拨款。（2）企业按规定提取的房屋折旧费。（3）出售新建住房与旧住房回收的资金。（4）企业从盈利中抽出的建房自筹资金。2.股份集资。利用股份制形式吸引利用财政、专业银行、企业、外资四方面资金用于住房投资。3.个人住房储蓄。依靠大力发展低息抵押贷款制度来调动个人储蓄积极性。4.建立房地产长期资金市场。通过发行债券和房地产企业股票等方式建立一个稳定的融通资金渠道。房地产金融机构越健全，对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 and 房地产市场的成长越有利。

第六，培养和引进一批为房地产业服务的专业人才。

作者单位 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 江 枫

（上接第150页）

是人云亦云，老调重弹。

汉匈战争是汉代重大的军事行动，经过近百年的较量，以汉胜匈败而告终。史学界曾对战争的得失进行讨论，一般认为汉朝的胜利剪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维持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保障了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得大于失，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作者认为这是对的，但不全面，从两方面作了补充阐述，一是从汉代的对外政策、汉武帝向西方开拓的政治眼光、张骞出使西域等论述汉代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二是从匈奴败落分化后南匈奴社会进步的事实论述汉朝先进生产力和较高文化对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的进步产生的积极影响；而汉匈关系的终结，导致了北匈奴的西遁徙，汉军长驱西进，不仅把西域从整体上纳入汉朝版图，而且开通了通向西方的安全道路。总的来说，汉匈战争的结束之日，就是“丝绸之路”大通之时。

汉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方诸国，丝绸、铁器等输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生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一种有失偏颇的观点，即汉代的中西交往基本上是单向的，仅有中国商品的大量输出，中外商业贸易是一种不等价的贸易关系。作者不以为然，以很长的篇幅考察西方新种物的输入，畜产毛皮的传入、医疗技术与药理学、化学

与染料技术、语言与文字、乐器与音乐、舞蹈与杂技、绘画与雕刻技术和佛教哲学的东传，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眼界更加开阔，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换言之，这种交流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对流的，不是不等价的而是互利互惠的。

作者对西域社会形态、中西交往形态、中国文明对西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也很有深度。剖析歧异，钩沉阐幽，发人之未发，显示出作者敏锐的思维与深厚的功力。

无论是宏观把握，还是专题的深入，都得力于作者宏富的史料收集与掌握。由于时代久远，汉代关于中西关系的史料留传下来的很有限，给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作者另辟蹊径，在“广”字下功夫，不仅广泛披阅《史记》、《汉书》、《后汉书》、《续汉书》、《三国志》等历史文献，还注重罗集中外社会学、人类学、语言文学、民俗学、宗教、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资料，包容于自己的著作之中，开拓史料来源的深度与广度，补充了文献资料记载之不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基本功。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凌 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实践与发展

——“珠江三角洲的实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研讨会综述

郑 英 隆

旨在总结过去，探索未来，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珠江三角洲的实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研讨会于1992年12月28—31日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改委、省社科联、省社科院等14个单位联合发起的。会上，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共150多人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实践及其经验、特点、问题、趋势、对策等进行了研讨。现作如下综述。

一、广东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估计

过去的14年，广东改革开放的过程概括起来就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央给予的有关政策，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大胆试验，不断地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在发展商品经济、开拓国内外市场、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先走了一步。实践证明，广东实行市场取向改革的路子是走对了。与会者对珠江三角洲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进程作了如下几种判断。

一是广东的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这种判断主要从市场及其体系着眼，认为经过14年的努力，目前的珠江三角洲市场体系尽管较之发达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但是从总体上说，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市场机制作用比较充分、以公有制为主、多渠道多形式多种市场主体的市场体系已基本建成。其特征是：（1）区内市场发育比较充分；（2）市场结构呈较强的外向型和发散性特征；（3）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强；（4）市场基础设施和专业市场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5）调节经济运行市场机制形成较早，市场覆盖面较大。

一种看法是市场经济已在广东奠定了基

础。这种判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尤其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导向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不等于说市场经济已经形成，而只能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为（1）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远未形成，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还有待探索，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还不能以市场为中心运转；（2）金融、人才、劳动力、房地产、技术、信息、产权等要素市场还处于初创阶段，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完善的任务还十分艰巨；（3）当前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还囿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以行政权力为主的方法和直接管理微观事务的功能严重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4）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同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5）庞大的行政机构仍在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6）逐步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目前远未解决。与这种判断相类似的是“刚破题”、“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看法。

再一种是“形成了雏型”的判断。参会者认为，目前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以外向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雏型。依据是：国内外市场的供需动态已初步成为珠江三角洲生产发展的导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的不断长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外向型发展特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开始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去进行；经济的增长逐步转向对资源资金投入增加和技术含量提高的重视；多元市场主体及其产权地位开始逐步确立。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动点问题

研讨会上的一个共识是，珠江三角洲14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开放并非一开始就一帆风顺，而

是一个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渐次推进的过程，而对这一过程的起动点则各有看法。

一种看法是，珠江三角洲的市场经济实践是从农村开始的，而改革价格，则是该地区通向市场经济之路的最初突破口与起动点。他们认为，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在珠江三角洲首先体现在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价格改革可分三个阶段。1979—1984年，针对当时的商品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事实及其价格管理体制上的弊端，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国家调价为基础，采取了“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价格改革方针，农副产品和地方工业产品价格的调放，缓和了市场供求矛盾；1985—1988年，价格改革主要是放调结合，大幅度放开农副产品和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时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使国家定价限定在计划内部分；1988年后，价格改革进入调放与管理相结合的阶段，理顺不合理价格，完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价格管理办法；1992年初开始放开粮食销售价格。目前，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和深圳、珠海特区中由国家定价的产品比重已不足1%，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工业品比重已占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农产品价格几乎全部放开。

一种看法认为，珠江三角洲市场经济的成长是从引进海外生产要素市场起步的，真正意义上的价格改革亦缘由于此。同其它地区情况相似，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利用价值规律指导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首先是如何改进生活消费品供给问题。有鉴于特殊的国情和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规定性，我国的市场发育所应有的选择是引进市场与建造市场相结合，以“引进”推动国内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从而带动生活资料市场的拓展。亦有的同志从具体的资本市场角度提出，珠江三角洲的市场经济之路是在引进外资过程中起步的。海外资本或外商投资企业的突出特点是资金流动和产品销售受国际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这样，外资的大量涌入就要求我们突破传统的企业管理体制，尊重投资者的主体权益，允许这些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配置资源。另一方面，为引进外资，改善投资环境，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或基本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在国家只给政策不给钱的条件

下只能靠利用外资、利用内联资金和信贷资金达到；这些商业性资金的注入客观地要求突破传统的资金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和劳动力管理体制，开放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建筑材料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允许市场机制进入计划经济的一些传统领地，搞活生产资料市场，催化市场体系的成长。

一些参会者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利用开放的契机引入市场机制的方式和现实途径：一是利用“三来一补”、承接外商订单、与外贸部门合作以及发展贸工农、贸工商、贸工技一体化等引入海外市场信息，使企业的产品结构和经济行为同国际市场机制接轨；二是利用外商在境内办“三资”企业，引入市场观念和市场规则；三是促使一大批企业大步走出国门，到国外投资办厂，到资本主义营地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中的有益成果；四是引进西方市场营销方法，利用合资者的市场渠道和销售网络，促进本地产品向国际市场拓展。

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重组问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最困难最根本的是所有制变革，建立新型的产权制度。8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力得以超常规地发展，年均经济增长接近16%，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和多层次特征的实际，重组所有制结构，逐步革新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目前珠江三角洲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全民、集体、个体、私营、联营和“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多元化格局。对此，与会者概括出六大特点：（1）区域经济发展与公有经济产权主体分散化、具体化相协同；（2）公有经济有很大发展，绝对值大幅度增加，但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3）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因引进国际资本产权而建立的国内产权主体与外商合作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等的非公有经济（它们并非全部都是私有经济，而包含有一定的公有制经济成分）迅速崛起，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活跃的经济形态；（4）以股份制经济、联营经济和合作经济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势头强劲；（5）各所有制之间和同一所有制内部的发展并不平衡；（6）所有制的多元化构成

了经济起飞动力源的多元化。

参会者还进一步探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所有制变革的途径。他们认为,总的来说,变革主要是由对外开放,引进海外多种形式的经济成分而带动起来的,比如,各市县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大胆引进国外产权管理方式,发展“三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该区以产权制度变革为突破口,在保障国家作为公有财产终极所有者的前提下,将公有财产的所有权明确化、具体化和分散化,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推动所有制的变革。表现在:(1)通过推广和完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利益明确化和具体化,为各地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企业奠定利益基础;(2)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企业承包制,将公有产权的一部分转化到企业、集体或个人等承包利益主体中,明确相应的产权利益关系,进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3)通过推行股份制和农村股份合作制将部分公有产权进一步具体化、规范化、有序化,并具体分散到股东手中,从而更大程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要素市场的培育与多元分配机制的塑造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和完善包括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在内的要素市场。与会者认为,珠江三角洲劳动力市场是通过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来培育的。目前珠江三角洲的企业用工已显现出形式多样、充满活力的势态与特征,如劳动合同制、临时工、钟点工等,这些变革的最重要意义是促使劳动者与企业实行双向选择。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为解决国内资金和外汇“双缺口”的困难,珠江三角洲在80年代前期就已着手金融市场的培育。培育首先是从短期资金市场起步。1984年开始了金融同业之间的资金拆借,198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1991年在深圳成立我国第二家股票交易所,近年外资银行开始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信用社兴起于城市街道上等,这些情况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形式、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在发育成长。此外,房地产市场和技术市场等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以生产要素为依据,塑造多元化分配新机制,实现分配制度的多元化,是珠江三角洲走上

市场经济之路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会者认为,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平均主义、“铁饭碗”、“铁工资”的分配模式,多元化的分配格局已开始形成。这包括(1)分配主体的多元化,即各级地方政府有了在交够上头的前提下的财力自主支配权,一些市县实行分配同所创经济效益挂钩的浮动工资制、浮动定级制、联系效益计奖等做法;乡镇企业、私营个体企业、“三资”企业等类型企业基本上是按企业效益的好坏进行分配,不受工资总额限制。(2)分配依据的多元化,包括土地、厂房、资金、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社会生产过程一般都能取得相应收益;区别对待从事技术、管理、营销劳动和一般体力劳动的报酬等。(3)分配形式的多样化。这种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分配机制,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又拉开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距,充分调动各种要素的积极作用。

五、市场经济与地方政府调控体系建设

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塑造资源配置的新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而这首先要在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经济调控方式上取得根本性突破。会上,与会者形成的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珠江三角洲在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与体制的过程中,一开始就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一关键。

参会者根据珠江三角洲的实践,把政府职能转变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纵向上,通过简政放权,把微观经济管理权交给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管理由原先的直接方式变为间接方式;横向上,取消一些旧有的行业主管部门,对工、农、建、运、贸等实行大系统管理;另一方面,在纵向放权和横向分权的同时,强化政府的规划、导向、协调、服务和监督职能,如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近期经济规划、城建规划、基础设施开发计划等。

会上,一些同志主张,对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体制与体系应从五个特点去把握:(1)方针政策引导,企业走向市场,政府退出经营;(2)以经济机制为主,通过建立多级经济信息系统和咨询机构,及时反馈、处理和传递各类经济信息,运用信息手段指导经济决策与实

商品内涵新探

张金良

商品是市场经济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商品定义是否科学，对理论与实践的影响甚大。

在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多数教本把商品表述为：“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①我认为，这一定义存在三个问题：一、未能揭示出商品本身具有的属性。“劳动产品”前的“为交换而生产”限制词是说明这一劳动产品具有不同于其它劳动产品的“特有属性”，但并非这类劳动产品所“固有”，而是这类劳动产品以外的生产者的思想动机。二、生产者具有“为交换而生产”的思想动机时，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称为商品，否则称为产品。而生产者的这一思想动机是属于意识范畴的。三、由于“为交换而生产”的思想动机往往产生于产品形成之前，按常规，先有“为交换而生产”的动机，后建工厂，再后是生产产品。因此，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最迟也是从产品形成之日起成为商品。又由于消费者经交换所属的物品，也是生产者“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因此，它当然属于教科书定义下的商品。这样在教科书定义下的商品，就与劳动产品无

关，实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3）推动公有经济与市场竞争相结合；（4）引入市场机制，实现新的劳动力配置；（5）各级政府部门寓服务于管理、监督之中，在服务与管理、监督中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六、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市场经济相协调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富有地方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新路子，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与会者认为，珠江三角洲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主要有：（1）80年代企业文化、乡镇文化、区街文化蓬勃发展；各类“艺术节”异彩纷呈；大批高档次、现代化的大中小学校舍、文化活动中心、体育馆、博物馆、医院、幼儿园、敬老院等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福利设施拔地而起；群众性的社会公德教育和树新风活动等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人们逐步走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路。（2）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如价值观

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时效观念、平等观念、人才观念等逐步确立，并成为人们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巨大驱动力。（3）大批重务实的市场经济型人才在迅速成长，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初具规模。10多年来，珠江三角洲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遍及城乡上下，深入家庭个人生活，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多渠道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协同的生动活泼局面已呈现在珠江两岸。

与会者把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以经济发展作为物质力量基础，这是该区精神文明建设长期化和富有成效的一条首要经验；二是要确立和倡导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三是要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需要出发，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引导群众自觉参与文明建设；四是要正确评价精神文明“硬件”的载体作用；五是要逐步建立和健全一套有效的精神文明运行机制，如组织领导机制，党政军工青妇等部门、社区、团体的各方共建文明机制，管理操作机制等。

区别可言了。这样，教科书所定义的商品，其定义项——“为交换而生产”的外延，就大于被定义项——“商品”的外延了。还有一些教科书把商品表述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②这一定义与前一定义比较，同样存在前者一、二两项错误。不同之处是定义项的外延不包含经交换进入消费领域的劳动产品。

对于商品的规定性问题，马克思早已作出精辟的论述。他说：作为商品，它们都是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从所有者方面来看，交换实现，交换双方原来各自所属的物，随之发生形态变化；从劳动产品方面来看，交换实现，劳动产品的所有权随即发生转移，说明劳动产品在形成使用价值时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价值，得到了社会承认。这时的劳动产品就具有了经过交换的特有属性。这一特有属性正是商品与产品的本质差异。交换的实现，也是双方各自交换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恩格斯也是不同意用生产者的动机作为商品的本质属性，用“为别人”和“为交换”这些措词来表达商品的本质属性的，他强调，商品必须是经过交换转移到使用者手里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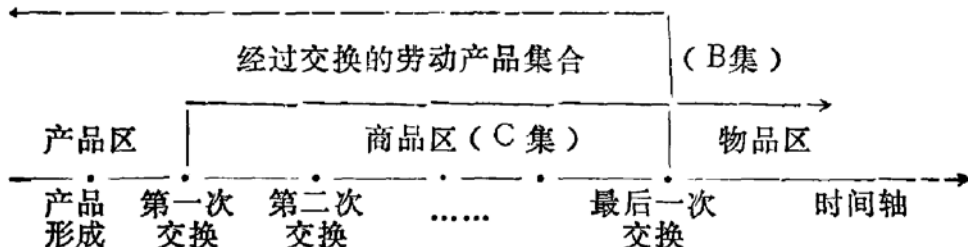
再从商品的运动规定性来看，商品既然是劳动产品发生、发展、灭亡历史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段过程，而过程又是以时间为序列的，因此，商品过程必然存在两个界点。马克思认为，商品要经过交换过程和发生形态变化。这个交换过程可以是第一次，可以是第二次，……也可以是最后一次。但至少要经过第一次。因为在第一次交换过程中，买卖双方构成矛盾的双方。实现交换，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转移到买方一边，劳动产品就具有经过交换的本质属性；如果交换失败，这时卖方手里的劳动产品就不具有经过交换的本质属性。显然，第一次交换的双方，随着交换的成败，分别决定两种事物的特性。因此，第一次交换实现就是商品运动过程的起点。这时的劳动产品在保持原有的使用价值属性的基础上，第一次叠加了“经过交换”的新属性。从第一次交换开始，到最后一次交换实现前止，中间经历的每次交换，所有买方手里的劳动产品，都是以买为手段，以卖为目的，唯独最后一次交换不同，卖方以卖为目的，买方以用为目的，交换的实现是各自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这时买方拿到手中的物已开始进入实用过程，虽然这样的劳动产品仍保持原来经交换的属性，但它第二次叠加了新的属性——实用过程。于是商品就退出市场的舞台了，如果交换失败，劳动产品仍然保持商品的属性，因此，最后一次交换实现，就是商品运动的终点。显然，商品与产品运动的起点与终点是不同的。

据上讨论，商品存在着不同于产品的固有属性，按照形式逻辑学关于定义的逻辑方法的要求，我们可以把商品的这些特有属性概括地表述为：商品既是经过交换又是用作交换的劳动产品。

有关商品的本质问题，定义中已经明确了。从量的范围看，商品是两个不同的劳动产品集合的公共元素组成的集合（称C集合）。这两个不同的劳动产品的集合，一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的集合（称为A集合），这一集合包含：用作交换而没经过交换的劳动产品和用作交换且至少经过一次交换的劳动产品。但不包含使用者拿到手里的劳动产品，因为它已经进入使用阶段，具有新的属性；二是经过交换的劳动产品的集合（称

B集合)。这一集合包含：用作交换且至少经过一次交换的劳动产品和“使用者拿到手里”的劳动产品，但不包含用作交换而没交换成功的劳动产品。现图示如下：

用作交换的劳动产品集合(A集)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1. 劳动产品从使用价值形成之日起到使用价值毁灭止，中间大体经历三个过程：产品过程、商品过程和物品过程。产品过程起于使用价值形成，终于第一次交换实现前夕；商品过程起于第一次交换实现，终于最后一次交换实现前夕；物品过程起于最后一次交换实现，终于使用价值毁灭。2. 如果有的劳动产品只经过一次交换的话，那么它的商品过程仅是一瞬间。如果使用者经交换所属的物，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售出，那么该物就经历了二次商品过程。

对商品下这样的定义，是符合现实经济生活的。第一，它把“为交换”而没交换的劳动产品排除在商品集合之外，这些劳动产品对买方来说，可视为商品，但对卖方来说，只能视为产品。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未出售之前，会计报表上只能反映为产成品，只有当产品出售货款收回后，在财务处理上，才能从产品科目结转到销售科目上；第二，由于从第一次交换实现开始到最后一次交换前止，这一过程中的劳动产品的所有者既是买方也是卖方，所以，不仅买方将卖方所属的劳动产品视为商品，而且就是卖方也将自己所属的劳动产品同样视为商品；第三，此定义把“使用者拿到手里”的劳动产品，排除在商品范围之外，这时劳动产品已退出商品的范畴而进入使用过程了。使用者的动机与效果形成了统一。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购置的设备，称固定资产，人们购回的劳动产品，只能称为物品。

从过程来考察，劳动产品同人生一样都有起点和终点，中间要经过若干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存在着不同于其它时间段的固有特性。由于目前的商品定义“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内涵与界定不确定，不仅使经济理论研究受到影响，而且也给现实经济生活带来不良后果。一些企业将产品视为商品，产品生产视为商品生产，不重视交换现实，盲目追求产值，造成严重积压，使国家蒙受严重损失，这种实例到处都有。

①龚士其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1985年11月第三次印刷，第24页；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89年6月第三次印刷，第99页；贾永正主编《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第27页。②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81年8月第二次印刷，第34页。

作者单位：河南省财政厅

责任编辑：郑英隆

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企业机制转换

李建勇

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固有的内容与要求，深化企业体制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重新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一、改革中的企业行为特征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一个“经济人”；企业在实际运行中，总是必须遵循以扩大投入与产出比率为最高功能的经济法则，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的利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又是独立的“法人”；作为法人的企业，其行为既受法律的保护，又要受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制约。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企业只是政府主管机构的行政附属体，企业行为的目标，就是执行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缺乏基本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品性，因而无法产生独立的经济愿望，从而也无法自主地依照经济法则抉择自己的行为。改革以来，特别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颁布为标志，我国的国有企业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法人地位逐步得到肯定，企业的经济属性逐步明确，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在较大的程度上发挥着对企业运行的调节。但是，由于双重体制的并存，出现了一定的企业行为混乱、运行无序的现象。作为旧体制微观基础的企业，在财产关系、内部结构、经营形式等方面，都还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旧有的行政管理方式，不管是对政府机关还是对企业来说，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力，企业对行政机构的依赖性仍然很大，“不找市长找市场”还没有成为所有企业的行为方式，相反，大多数企业还是处于“一只眼睛盯着市场，一只眼睛盯着政府”的双重依赖之中。

再说企业的预算约束也就是自负盈亏问题。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它必须要做到自负盈

亏，企业法中也明确地规定了这一点，但作为现实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际上又很难做到自负盈亏。除了其它因素以外，企业产权未能明确界定是问题的主要症结；如果企业没有自己的法人产权，严格地说就没有对应的自负盈亏的责任。

总之，我国的改革虽然已经在若干方面使企业开始具有一定的市场主体的经济属性，然而就塑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的要求来看，在许多重要方面，尚未成长为真正的市场运作主体。因而，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舍此，市场经济的建设和新体制的确立将无从谈起。

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内容

企业经营机制是一个包括多种机制的体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就是要将企业过去那种无目标、无动力、无约束的状况转变过来，重新建立或完善新的经营机制，使企业实现权、责、利的有机统一，人、财、物的有机结合，产、供、销的有机衔接，实现完全的自主经营、彻底的自负盈亏、真正的自我积累、有效的自我发展，成为真正的市场运作主体。它包括目标机制、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三大部分。

（一）建立企业的目标机制。

企业的目标机制，对企业的运行、企业的决策行为、动力结构、自调节活动和发展趋向、企业的预算约束关系等都有极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活动的微观主体，是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追求企业资产的增殖，追求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我国的国营企业是全民资产的经营者，全民资产在本质上同样要求它的经营者努力提高资产增殖程度和资产使用效益，要求利润的最大化。如果不确立盈利为企业的中心目标，而把一些本属于社会的目标都强加

到企业身上,如保障就业、保持社会安定等,企业就不能裁减冗员,不能停止生产市场没有销路的产品,不能不接受收购积压产品,不能抵制外部硬性分配来的不适合企业需要的就业人员和多方的摊派,这样,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经济效益也就难以产生。因此,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必须首先确立盈利目标,建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机制。

诚然,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经济中,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不是来自劳动贡献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而是来自资源和要素的级差优势、宏观调控体系的漏洞、供给短缺造成的价格垄断等等,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来加以解决,从而为企业创造机会均等的竞争条件。

(二) 建立企业的激励机制。

企业的激励机制是企业的动力系统,它的内容有四:

1. 企业的动力机制,它是推动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结构。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国营企业作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几乎没有什么自身的经济利益,因而也很少有内在动力,企业运行主要靠非经济力量推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事实上未有也不可能解决企业产权不清问题,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利益问题,难以形成完善的企业动力机制。因此,建构企业动力机制必须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实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用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国有资产的原始产权和法人产权。划清原始产权,再对国有资产折股以债券形式交给企业经营,国家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門,作为原始产权的代表行使股东的权利。企业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积累不再构成国家原始产权,而属于企业的原始产权。原始产权与法人产权的分离,表现为同一所有制内部两个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客体的不同的支配关系。国家的终极所有权通过分离财产权益或行使收益权得到实现,企业的法人所有权通过行使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来实现。实行这种分离后,企业拥有了经营财产,对企业资产拥有充分的占有、使用和处置权,这样,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生产经营者,才可能形成真正的企业动力机制。

2. 企业的激励机制,指的是激发企业经营者

和生产者积极性的机制系统。企业的活力和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的每一个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努力程度,而这又取决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机制转换主要体现在干部管理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上。(1) 要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就要首先造就企业优秀领导人才,而这就必须改变干部管理制度,废除终身制。具体说来,第一要取消企业间人为的行政等级以及由此派生的非经济因素限制,使企业领导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在市场中比高低;第二要废除对企业干部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企业领导一律通过招标或招聘产生,使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能够走上企业领导舞台;第三要建立企业家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人员市场,促进人才流动,培养和造就一批职业企业家;第四要确立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自身利益,实现其责任和利益的有机统一。(2) 从劳动用工制度来看,要充分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就必须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建立就业竞争筛选机制。具体说来,就是劳动者就业不再实行统一安排,也不再是“一次分配定终身”,终身依附于某个单位,而是凭自己的才能自由竞争选择职业;企业对于那些不勤勉工作,消极怠惰者,则可以自然地撤销其职务,降低其收入待遇乃至辞退,从而形成一种就业竞争和职位竞争的动力和压力。(3) 从工资分配制度来看,工资制度改革关键是要克服平均主义。对企业而言,企业工资要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就职工而言,要以贡献论报酬,强化按贡献分配的权益和利益。具体说来,就是以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来确定工资级别和相应的工资总额,这样,既能打破企业之间和劳动者之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弱化收入攀比,又能抑制工资上涨,控制消费基金膨胀。只有敢于承认差别,敢于合理拉开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别,才能进一步调动企业职工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积极性,从而增强企业的活力。

3. 企业的竞争机制。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就必然有竞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运用竞争机制,才能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才能实现企业行为的合理化,促进企业素质不断提高,才能使企业的内在动力转化成为企业的活力。长期以来,我国的竞争机制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环境不平等。为此,要使我国企业竞争机制的功能得以充分发

挥,必须尽快完善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环境。第一,加快要素市场的发育,形成灵敏有效的市场参数体系,为企业提供一个资源选择和资源转让的场所,使企业能够平等地获取生产资源和自主地转让资源,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第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关键是要改革“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地区分割,使企业冲破封闭割据的市场堡垒。第三,理顺市场信号,调整市场主体行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尽快改革价格“双轨制”。实践证明:价格“双轨制”阻碍了我国市场的发育,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行为,破坏了企业竞争的公平性。因此,必须加速价格并轨,努力解决价格形成机制问题。第四,取消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倾斜保护”政策和行政约束,逐步取消指令性生产计划,取消指令性产品、物资分配调拨计划,让企业成为市场中充满活力的细胞,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五,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制定、修改、完善市场法则,规范市场秩序,保证公开的、公平的市场竞争。

4.企业的风险机制,它是企业承受风险制约的经济运行体系或规则,包括经济当事人利益、风险的承担者及风险和利益追求行为之间的联系三个要素。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风险机制特征是“低机会、低风险”。企业风险机制的矫正已成为当前国营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重要内容。企业风险机制的矫正,关键在于实行企业破产制,造成企业生产者和经营者承担风险的压力,促使他们关心生产经营状况。实行企业破产制度,其前提首先必须要确立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这样,企业才有承担破产风险的权利。其次是明确企业财产界限,划清企业债务责任。从法理上讲,如果破产企业和它的债权人的资产同属一个所有者,那么破产制度就失去了意义。实行企业破产制度还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目前我国的现实生活中,银行的贷款是“软约束”,这种现象极大地弱化了企业行为的约束力。所以,改革金融体制,重新构造微观金融基础,实行专业银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经营机制,是国有企业破产制度顺利实施的必备条件。

(三)建立企业的制约机制

1.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一般而言,企业的行为要受资源约束、需求约束、预算约束、行政约束、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前三种约束是经济

约束,后三种是非经济约束。在传统体制下,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调统配,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财务是国家统收统支,因而根本不存在预算约束,社会经济的运行只能靠非经济约束来维持,实际上靠强化行政约束。由于行政约束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其结果必然使国民经济陷入“一控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控——一控又死”的恶性循环。那么,改革向哪些方面深化呢?从内部来讲,主要是改革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关系和资产责任;从外部来讲,主要是改革价格、信贷、财政、投资制度。只有界定企业的产权关系和明确资产责任,使企业拥有自己的经营资产,成为名副其实的法人,才能割断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强化企业责任意识;只有硬化价格、信贷、财政、投资约束,才能使企业软的预算约束失去生存条件,强化企业的需求约束。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和需求约束机制的强化,是对行政约束机制的一种排斥和否定,它客观上要求行政机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必须从直接转为间接,从微观转向宏观。与此同时,还要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约束机制,以及具有重要辅助作用的道德约束机制。

2.企业的自我调节机制。它是保证企业具有应变能力的机制体系。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与市场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换有所扩大,企业自我调节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一个功能完整的企业自我调节机制并未形成,企业尚难根据市场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建造企业自我调节机制,首先,要确立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和权力,让它自主地在市场上进行资金、生产要素、产品等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与此同时,相应建立企业内部控制、调节和反馈系统。其次要搞好外部配套建设,即建立和完善计划、市场体系,端正国家行为,健全法律制度等。企业自主经营是自我调节的前提,没有自主经营就谈不上实现自我调节,更谈不上形成自我调节机制。

3.企业的自我发展机制。建立企业自我发展机制,就是使权、责、利结为一体并落实到企业法人代表身上。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企业发展既无权力,也不承担责任和享受其利益,但更主要的是没有自主支配的财力。一是企业无权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折旧率,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折旧率预提的折旧基金与实际损耗的价格相差

甚远,并且很大一部分被抽走挪用,致使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十分微弱。二是国家替代企业积累,企业只管生产经营,生产经营与积累发展脱节,企业不能靠自我积累的能力去发展壮大自己。为了改变上述状况,必须尽快改革现行的折旧制度和积累体制。在折旧制度方面,要下放企业折旧的管理权限,给予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折旧年限上一定幅度的浮动权;在积累体制方面,要以国家替代积累为主转向企业自我积累为主,企业利润,除部分通过税的规范形式由国家集中外,大部分应留归企业用于发展,并且明确企业自有资金的所有权。这样,企业自我积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增强,企业自我发展机制的建立才有基础。

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协调性与层次性

企业经营机制系统的上述各个组成部分,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又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企业经营机制的构建必须全面推进,协调配套,否则,企业经营机制的整体功能和效益将不可能提高,甚至会出现机制功能错位,使运行过程发生冲突和紊乱。

(一) 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协调性

在过去的改革操作中,由于对企业经营机制缺乏系统整体性认识,存在许多不协调和不配套的现象,它们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机制整体功能的发挥,并且带来了机制功能错位,经济运行紊乱。例如,放权让利改革,意在建立企业的自我调节和发展机制,但由于计划体制、流通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用工及工资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必要的市场环境没有形成,企业自主经营的条件没有具备,结果,发布的规定得不到真正落实,改革的目标也无法实现。事实证明,打乱企业经营机制的整体性,实行单项改革突进,孤军深入,不仅不能提高效率、改进功能,就连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也难保证。我们不能期望改革“一步到位”,但是每一步改革都必须是配套的,以保持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制衡,这样才能使改革处于有序状态。

目前,人们研究企业经营机制问题,仍是只注重在单项机制的转换上,对企业经营机制的系统协调性重视不够。例如有人认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就是用工、分配、人事三项制度改革,

这只是企业经营机制体系转换中的一个方面,如果只注重这一方面,其他体制不作相应的配套改革,那是达不到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目标的。

也有人认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主要是改革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即制订企业的发展战略,优化企业的劳动组合,明确职工的岗位责任,规范企业的生产工艺程序,强化工人的劳动纪律;认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是企业自身的事,应由企业自己负责。实质上,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企业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社会宏观调控部门的体制改革。倘若政府职能不转换,政企不分开,产权不明确,权责利不统一;倘若市场要素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价格不合理,市场竞争不平等;倘若企业经营不自主,盈亏不自负,发展不自求,那么,纵然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方式、办法和手段,企业也难搞好。因此,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必须有外部环境的配套改革才能完成,企业多种功能的发挥也只有在一系列机制的协调运行中才能实现。

最近也有人认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就是全面推行股份制,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推行股份制主要是解决企业的产权制度,形成风险与利益对称的机制。它只是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如果不配套进行市场培育、创立宏观调控体系、转变政府职能,不改革价格、财政、信贷、投资等体制,不仅整个企业经营机制无法实现转换,就股份制本身也难以推行。

(二) 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层次性

1. 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主要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职责。一般而言,国家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制定指导性的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和年度规划;制定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高效发展的经济、科技、社会政策;制定税收、关税、外贸政策;制定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经济有效运行的法律法规,发布国内外经济信息等。各政府部门的职责,一是负责监督国家目标、规划的实施以及政策、法律的执行;二是承担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等非生产建设投资;三是保护环境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搞好城市规划。而企业的职责主要是从事包括扩大再生产在内的经营活动,实现资产增殖,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政

府对企业的关系主要是提供服务。这就要求转换政府职能,弱化经济活动的行政管理,强化间接的经济、法律调控。目前,我国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很多,每个部门的权力很大,对经济活动管得过细。因此,深化改革,首先就是要对政府行政管理机构进行改革,对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机关要下决心撤掉。必要的管理部门要转变作风,多为企业办实事。

2. 理顺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市场是企业争高低比优劣的竞争场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活力只能来自企业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而这种动力和压力只有市场才能公平地为其同时提供。因此,让企业走向市场是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目前,我国的市场主体缺位、行为不规范、秩序混乱等问题非常突出。一是市场主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政府的传动装置,生产经营仍很难根据市场变化进行抉择,行政干预对企业的行为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二是市场主体行为短期化;三是市场主体没有自己稳定的、长远的经营目标和方针,对市场运行的信号不能灵敏捕捉,大多是盲目参与市场活动;四是市场主体依靠政府的“倾斜政策”获取各种优惠的条件,通过特殊的行政政策力量占领市场。从市场主体系统来看,除企业之外,党政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公开或隐蔽地参与市场活动,成为具有特权的市场主体;大量的行政性公司成为市场上具有得天独厚竞争条件的市场主体,一些掌管商品物资的部门和单位在行使计划指标分配和行政管理职能的同时又兼搞业务经营,融官商于一体。由于市场主体存在着上述不规范现象,因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规范市场主体。首先,进一步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对不符合市场主体性质的部门、单位或个人,应严格限制其进入市场。对于所有生产经营企业,要让其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企业的生产根据市场要求由企业自行决定,原材料由企业自己在市场上择优采购,资金由企业在市场上筹集,价格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决定。其次,进一步确立专业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要使市场主体系统规范化,必须把专业银行也推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经营,从而为生产经营企业创造

一个合理的资金供给环境。此外,还要健全有利流通的市场中介组织,包括有关的研究咨询服务机构、各种商会、会计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以及各种代理机构。这些中介机构为进入市场的企业提供各种咨询服务,保护企业的正当权益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进而促进整个市场的正常运行。

3. 理顺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职工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企业的主体。如何在改革中同时使职工具有主体地位呢?一是实行企业股份制。因为股份制更有利于将企业变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样,企业的发展只能依靠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而要使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得以充分发挥,企业就必须真正依靠职工,必须注重关心人、尊重人、信任人。股份制还可以使企业法人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平等,保护企业法人和工人的结合相对稳定。再次,股份制可以使企业家和工人对企业纯收入具有平等的支配权。企业家的工资是其经营劳动和经营风险的报酬,工人的工资是其生产劳动的报酬,他们对工资的支配,都是对自己的劳动力的支配,是直接或间接对自身经营成果的支配。同时,他们的股份投资,都可以获得同等的红利,在经济上都具有相同的地位。总之,股份制可以使职工在身份和权益上获得独立,而这又是职工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二是强化精神文明建设,树立民族精神和企业精神,这是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方面,尽快制定出一整套社会规范,包括政策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文化规范,特别是政策规范和法律规范;另一方面,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鞭策人们尊重社会公德,追求良心的安宁,敬畏法律的尊严,倡导劳动的光荣,使那些兢兢业业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受到社会的崇尚。

按照以上三个层次配套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整体功能和效益将可能得到发挥,机制转换的最终目标也就能够实现。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宏观环境与企业活力

邹建华

目前,我国国营大中型企业有12,000余个,它们创造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6%,在国民经济中起重要作用,但经济效益并不理想。据去年初的调查,全国国营企业的亏损面平均达35%左右,有些省市竟达50~70%。为此,从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要求与条件出发,深化国营企业改革十分必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活力的内涵一般来说是指: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和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及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能力。企业活力的发挥有赖于企业所处的宏观经营环境,也依存于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因此,探讨企业活力必须从这两个层次入手。

一、宏观经营环境

从国际上来看,目前国际环境虽然难以出现50~60年代那些刺激经济的偶然因素,但从总体上来说,整个国际环境还是比较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经营的。事实上,国际环境也迫使各国不得不将重心放在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上。

国内的宏观经营环境,总的来说是较好的,有许多有利于企业活力提高的因素。例如: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已经确定,这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前提;为了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12条政策措施,现正在实施,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企业活力的提高;我国有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有充裕的劳动力、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基础、有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科技队伍、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和逐步完善的法制。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仍然存在着的一些阻碍企业活力产生与发挥的因素。

1. 政企分离不明显。目前制约我国企业活力提高的原因众多,但政企不分或者分离不明显

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政府若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首要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地割裂政企的纽带关系,理顺企业现存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与此相联系的配套改革是要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将原来的有形国有资产转换成以价值形态出现的无形资产,接着以诸如招标等方式租赁给企业的法人代表,每年按合理的费用或年率向企业收取租赁费,从而使“两权”真正分离。

2. 金融市场欠发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融资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国库券、企业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深圳、上海两地的股市热潮等表明了这一点,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证券发行与交易规则不完善,企业内部的财务制度不配套等。就全国总体来说,银行贷款仍是国营企业最为主要的融资渠道,这使得企业的金融活动极为有限。为此,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认真总结深圳、上海两地证券交易的经验与教训,本着小平同志的“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的讲话精神,尽快地在全国较大范围内推开试点。从国内外企业发展的经验来看,股份制应该是我国国营企业改革的方向。在股份制的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我们可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的经验,一是继续完善和发扬现存的企业与银行的纽带关系,使银行为企业的深化改革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二是完善企业债券发行制度,使企业债券发行工作规范化、经常化,以便筹措社会游资;三是适当地鼓励企业间相互持股,组成企业集团,鼓励像保险、信托那些纯粹的机关投资者关心乃至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四是放宽政策,完善法制,适当地吸引国际游资参股,从而使企业今后融通资金的渠道从现今的一条扩大到

三条,即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发行股票。

3. 缺乏有效的竞争性市场。在我国,经过14年的改革开放,竞争意识已开始进入企业,促进企业经营。但在国营企业中,“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现象严重,企业依赖国家,职工依赖企业,经营管理者依赖于行政职别。这种“三铁”现象根源在于政企不分的企业“官本位”制。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一般由行政当局任命,这使他们一开始就以“官”而不是企业家的身份走马上任,尔后以“官”的作风而不是企业家精神经营企业,最后不管干好干坏均有可能以“官”的资格入主政府部门。于是乎,企业管理者不管是否懂行,不管有否好业绩,只要职别不掉,照样可以当“官”,从而淡薄了企业家的进取心,使他们缺乏竞争意识、企业家精神;由于企业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各级主管部门手中,而各级部门为了行使其“权力”,“文山”、“会海”在所难免,作为企业管理者的也非常清楚“关系”的重要性,因而精力多耗在“外交”疏通活动之上;由于铁交椅、铁工资的实施,企业经营者根本无必要去制定或按照各项规章制度办事,从而使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依、依章不严、奖罚不明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但助长了部分员工的惰性,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为此,只有彻底改革那种“官本位”的经营体制,最大限度地破“三铁”,才会有良好的竞争性市场,只有在良好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企业才会充满活力。

二、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

如果说上述的宏观经营环境是企业活力产生的保证的话,那么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就是企业活力产生的根本。故此,要想使企业长久地保持旺盛的活力,就必须深化改革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对此,笔者以为应抓住下面几点。

1. 实行长期聘任制,即对工人的招聘和对经营者的聘任实行“长期化”。当新职工(即包括经营者和工人,下同)一旦被录用后,在非特殊情况下一般不能解聘。这里所说的特殊情况,是指诸如:职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经教育不改者;职工能力低下,又不好学上进,实难胜任本职工作者;违反党纪国法者;因经济不景气,企业不实行裁员,实难维持时以及企业破产倒闭时等等。与此相对,职工在没有充分的理由时也不能自行“跳槽”,即使理由充分被批准调离时,也应

根据情况,按有关规定向企业交纳数额不等的补偿费。为了保证这种制度的运行,企业必须同时实行录用苛严制、厂龄补贴制、零时工补缺制、全员培训制和行之有效的定期考核制等。

2. 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即职工的工资完全取决于其能力、职务、岗位和对企业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大幅度地增加厂龄补贴的数额。这样一来职工的工资可由三部分组成:技能工资、岗位工资、厂龄补贴。为保证该制度的良性运作,可考虑逐步取消全国统一工资标准,将工资的决定权归还给企业,而企业可根据经营效益、当地的物价状况和劳动力的供求状况自行决定工资标准。为保证该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企业应建立一套严格的、细致的考评制度。

3. 岗位业绩奖励制,即企业奖金的发放完全根据职工的岗位和对企业的贡献。其奖金的名目可以增多。如固定奖可分为月度、季度、年度等,零时奖可分为合理化建议奖、突出贡献奖、节约奖、勤劳奖、超产奖等等。其奖金的数额采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使奖金制度真正起到激励先进,促动后进的作用。

4. 灵活有效的福利制,即企业根据经营效益,实行因人而异的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的福利制。企业除了按比率为每个职工投保医疗保险和人身保险这些基本福利以外,其它需根据职工的年龄、工种、性别、职务等不同情况,实行目的性和针对性极强的福利。比如对年青人重在于培训、对中年人重在于物质福利、对老年人重在于子女安排和旅游等精神福利。使企业的福利既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增强职工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企业的观念。

5. 科学的民主管理制度,包括管理体制民主化;管理机构高效化;管理人员专家化;管理方法科学化;管理手段现代化。

由上可见,一个有利于市场竞争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宏观经营环境,一个能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内部经营机制,必将会大大提高我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中国区域经济调控体系研究

张可云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是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与重要内容。随着新一轮改革与经济发展热潮的兴起,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将使规范区域经济调控成为必然。

一、中国区域经济调控的回顾与分析

从区域经济角度考察,体制改革对区域经济运行影响最根本的方面是承认地方独立的经济利益并在政策上逐步形成了经济利益在地区间的分配措施。经济增长加速、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意识增强、地方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活跃等都是其积极影响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回过头来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调控不当及其所导致的区际关系不协调与诸多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是诱发或加剧重大国民经济问题的主要因素。

改革前,在处理地方利益关系时,不承认地方独立的经济利益,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以单纯的行政命令来调控行政区以及排斥市场调节是改革前中国区域经济调控的主要特点,它未能在地区之间建立起经济竞争与合作关系,地方之间的经济冲突主要集中在分配领域,以隐蔽的、被动的形式出现。在生产领域,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地方经济与国民经济死气沉沉。

改革以来,财政、税收、信贷、投资、价格等一系列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地区独立经济利益的客观存在,并在具体措施上有所反映。一元经济利益主体逐步为国家、区域、企业和个人等多元经济利益主体所取代,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正因为如此,各级地方政府一改以前与中央政府同吃“大锅饭”、仅在分配领域“寻租”^①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做法,积极干预和参与地区经济活动,地区经济活力增强。但是,在改革旧体制时,并未形成规范的区域经济利益调控机制。实现地方经济利益的动力机制建立起来了,但保证地方自主权正确运用的规范与约束机制未建立起来,区域经济运行受到来自中央、地方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等多方面的无规则影响。这一方面导致区域经济冲突扩大与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区域经济合作受阻,改革呼声日高。

由于调控方式的变化,改革以来的区域经济冲突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不仅在分配领域的“寻租”活动未停止,而且在生产、交换、流通领域都有表现,冲突在迅速激化。改革以来的区域经济冲突可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冲突都引发或加剧了微观与宏观经济矛盾。第一阶段(1979—1984年)为盲目布局与盲目引进阶段。在“分灶吃饭”等改革措施实施后,各地区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投资与外贸等权利。在这种

背景下,出于对财政收入的追求,各地区竞相向见效快、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投资,竞相从国外引进这些加工工业的设备与技术,重复引进颇多。^②由于各地区财力有限,资金分散,投资规模小,大部分新建企业与规模经济要求相去甚远。这一阶段的冲突造成全国性投资膨胀、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企业规模不经济、加工能力与能源、原材料供给严重失衡。第二阶段(1985—1988年)为原料大战阶段。在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各地区为了不使本区内的加工能力闲置,政府企业甚至个人纷纷加入原料大战行列,区域经济大战^③此起彼伏,冲突剧烈。资源省区采用各种强制性手段命令禁止区内农副产品与原材料输出,到处封关设卡。加工省区则以抬高价格、强行闯关等方式抢购。这一阶段的冲突使全国与区域经济关系进一步混乱。由于投入物的售价不断被抬高,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价格轮番上涨,全国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大,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扭曲的价格信号导致农副产品及原材料的需求虚假,经过涨价与产量扩张的交替影响,部分农副产品与原材料过剩,大量资源浪费或闲置。许多农民与小的原料生产厂家损失惨重。第三阶段(1989年至1992年初)为市场封锁阶段。在农副产品、原材料出现过剩的同时,加工产品因盲目生产也普遍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为了治理过热的经济而采取的紧缩政策加大了企业的市场压力与需求约束。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开始疲软,各地经济增长趋于缓慢,市场成了企业发展、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以及社会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关键。于是,以保护本地市场不被侵占为主要内容的区域间市场封锁^④逐步蔓延,各种以经济、行政乃至法律手段建立起来的关卡遍布全国各地。区域市场封锁加剧或引发了全国市场疲软、经济滑坡、区域间经济联系断裂等,在地方保护的阴蔽下,一些地方伪劣商品横行于市,致使人们谈“假”色变,而有些优质产品却找不到销路。此外,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下,企业不仅产品价值实现困难,而且周转资金短缺。为了维护本地经济发展,除采取市场封锁外,各级地方政府还插手资金流转领域,规定“先区内后区外”的企业清欠债务原则,致使“三角债”愈来愈复杂,酿成全国性问题。

在区域经济冲突不断加剧的同时,合作呼声也日益高涨。早在1980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提出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⑤各地区相应制定了一些规定。到目前为止,虽在全国已形成了各种区域经济组织和协作网络100多个,但由于区域经济调控不规范,区域经济合作步履维艰,区域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区域间缺乏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区域经济合作长期停留在物资串换、发展经协公司等低层次的贸易互补型合作上,结构互补型与结构优化型的合作困难重重。许多地方政府、企业一方面呼吁加强合作,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封锁。这种矛盾的行为的根源在于区域经济调控不当。

由上可见,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以来,区域经济调控均主要是以行政区作为区域框架,区域经济调控不当引发或激化了诸多矛盾。因此,有必要重新构建中国区域经济调控体系。

二、中国区域经济调控的新构想

区域经济调控的基本思路应是：在承认地方经济利益并合理确定其实现机制的同时，建立起实现各地区经济利益的规范与约束机制，协调个人间、企业间、地区间以及个人、企业、地区与国家间的利益，其目标是实现区域内与区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根据这种思路，区域经济调控必须明确两个问题，即调控的机制与调控的内容。

从调控的机制角度考虑，实现区域内与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存在几个必要的前提：（1）中央政府不能无视企业与地方经济利益的客观存在。中央政府应以规划、服务、监督、法规等而不是单一的行政干预作为谋求国家利益的手段；（2）地方经济利益不能恶性膨胀，亦即地方应在国民经济利益最优的框架内寻求自身利益，不能以干预企业内部经营或牺牲其它地区利益为谋利手段；（3）企业是自由的经济细胞，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应是纯粹的行政隶属关系，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企业不受行政干扰，企业也不能插手地方行政。单纯的计划调节与单纯的市场调节都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三方面的条件。可见，区域经济调控必须将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在目前计划与市场一定程度上双重失效的情况下，单纯从一方面着力是不行的。区域经济调控应采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相适应的调节机制。

从调控的内容角度考虑，必须摆脱单纯的行政区调控的模式，因为这样很容易使地方政府行为仅局限于本区利益。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值得注意：（1）国民经济是由区域经济组成的，但并不等于各区域经济的简单叠加，区域经济比国民经济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两者的运行规律不尽一致，不能简单地用国民经济调控涵盖区域经济调控；（2）区域经济不等同于行政区经济（或称地方经济），这是二个内涵不一致的概念。人们往往不加区分地运用区域、地区、地方与空间等概念。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概念是有区别的。空间是与时间相对应的概念，其外延包括区域、地区、地方等。地区是指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其边界是任意的，是根据方便划定的。区域，在这里是经济区（域）的简称，是在经济上具有同质性或内聚性的地区，是通过选择与特定经济问题相关的特征并排除不相关特征而划定的。地方是与“中央”相对应的各级行政区的统称。区域不完全等同于地区或地方。区域的划分是以社会劳动地域分工为依据，根据一定的经济标准与研究目的而进行的；存在不同类型的经济区，因为反映经济标准的指标与研究目的具有多样性。可见，区域经济调控的内容应是多区域框架综合调控。

区域经济综合调控，包括二层含义：一是指综合运用计划与市场调节；二是指按经济区类型进行不同的调控。

综合运用计划与市场的区域经济调控的基本框架是：政府运用政策、规划等手段影响区域企业与市场的运行；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宏观区域政策、区际规划，为各区域提供区域经济运行信息；地方政府负责制定其属地内经济的发展规划与政策，为了协调区内关系，同属一经济区的各平级政府在制定政策与规划时主要考虑经济区的综合发

展,其利益的实现与经济区直接相关;经济区内的企业竞争与合作关系受市场引导,政府不设置壁垒,中央与地方照章向企业征税,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外,各级政府的调控不能直接作用于企业,而是通过市场、法律、政策、规划等间接起作用;政府对国防、基础设施等少数部门实行直接管制,并把握国民经济总量与结构。应该注意,调控有二层含义:一是调节与控制,包括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二是调节与协调。本文采用后一狭义内涵。因此,调控必须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这里,也就是说规划与政策必须考虑各个领域),而直接管理只限于少数领域。这里所提出的计划调节与传统的计划调节不同,它主要是指政府运用规划与政策影响企业与市场运行。

综合区域经济调控的另一层含义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区进行不同内容的调控。经济区主要有部门经济区、问题经济区、规划经济区与综合经济区等类型。部门经济区是根据部门经济发展条件与发展水平的同质性而识别的经济区,如工业区、农业区等。部门经济区调控的主要目的是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区域分布。国内各个区域拥有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各有利弊,识别部门经济区可为每个生产部门指明有利的发展地区,部门经济区调控的主要手段是产业布局规划与政策。问题经济区是根据面临问题的同质性而识别的经济区,问题经济区一般有三种,即落后地区、萧条地区与膨胀地区。识别问题经济区的主要目的是为面临的问题相似的区域制订医治处方。问题经济区的主要调控手段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倾斜的区域经济政策等。规划经济区是根据目前或未来经济政策的同质性与经济内聚性而识别的经济区,如经济特区、流域经济区等。识别规划经济区的主要目的是为实施特殊政策或采取协同开发措施服务,为重点开发或扶持一些地区的发展提供依据。规划经济区调控的主要手段是区域开发规划、特殊的区域经济政策等。综合经济区是根据经济发展条件与水平、经济联系等多种指标综合情况而识别的经济区,识别这种区域主要是为区域综合发展与各种经济活动合理分工、协作和协调发展指明方向。行政区划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经济的同质性与内聚性,而管理一般以行政区为单元,因此,行政区可视为某一级别的综合经济区。综合经济区调控的手段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区际发展规划、区域经济政策等。

区域经济调控相当复杂。不同经济区框架的调控彼此应相互协调,而实际运作时,不同经济区规划与政策并不总是彼此适应的。因此,综合区域经济调控必须由中央政府的一个权威机构总体负责。此外,区域经济综合调控既要考虑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又要考虑微观经济运行,既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又要考虑到地方、企业、个人的利益。在实际运作时,具体关系与利益协调需要以充分、具体的调查研究为依据。区域经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都是多元的。为规范这种调控,应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方式以及责权利等具体内容。最后,由于区域经济规划与政策都是动态的、连续的,区域经济调控是经常性的,有必要成立专门的职能经济部门,专门负责区域经济调控。

应该说,这里提出的区域经济综合调控模式是一种理想模式,实现从目前的调控方

式向这种理想模式的过渡，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三、规范中国区域经济调控的前提

随着市场因素作用的加大与商品意识的增强，区际关系日趋复杂，一个区域所受到的来自其它区域市场发展的促进、制约、诱导影响越来越强。在区际关系不合理、各地区经济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问题的现实基础上，规范中国区域经济调控仍需做大量的工作。运用区域经济综合调控模式，实现消除区域经济冲突、规范区域经济与竞争的目的，除了要科学地识别与划分经济区，进一步深化与区域经济有关的各方面体制改革外，还必须具备下述两个前提条件。

1. 进一步完善市场是区域经济调控的重要前提。

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区域经济调控只能是局部的。中国市场的不完善既表现为市场要素的不完善，也表现为市场空间范围狭小与分割。

市场要素主要包括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市场调控主体、市场交易规则、市场观念与风险意识、市场联系的物质基础等。改革前，中国在理论上否定商品经济的存在，将商品经济作为一个制度概念加以批判，在实践上实行产品经济，压制市场要素的形成或完善，排斥市场调节。改革以来，在处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时，开始承认市场的必要性，并逐步将计划调节的部分领域让给市场调节，但市场仍很不完善；企业未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作为市场调控主体的各级政府行为不规范；市场交易规则不全，扭曲且多轨并行；市场观念与风险意识不强；市场联系的物质基础严重不足。目前，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生产资料市场不全，消费品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市场空间范围拓展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小范围市场、地方性市场、区域性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小范围市场早在封建社会就已存在，它起到了补充与巩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作用。在封建社会末期与资本主义初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与成长，商品经济冲破了小范围市场的狭小天地，若干个市场空间连接为一个地方性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取得支配地位后，地方性市场的空间进一步拓展，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商品经济融为一体，形成区域性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始终未得到充分发展。建国以来，由于体制与市场要素本身不完善等多种原因，地方性市场为主的格局一直未打破。目前，小范围市场在一些落后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区域性市场发育艰难，全国统一市场尚可望不可即。在这样的基础上，市场分割局面极易形成。

目前，各种市场要素均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性统一市场应是市场培育的重点。只有逐步完善区域性市场，才有可能形成全国统一市场。

2. 科学地制定区域经济与政策是区域经济综合调控的手段前提与重要内容。

区域规划是规范区域内企业行为与方向的最主要的手段，是协调企业利益、区域利益和国民经济利益的工具。区域规划科学化必须以对现实经济发展、劳动地域分工的调查、分析与预测为基础，它必须规定区域的专业化方向、发展战略、产业结构选择、商

世界贸易新格局与广东外贸战略调整

谭崇台 薛进军

世界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8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贸易类型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从内向型转变为外向型;在贸易战略上,世界大多数国家从过去的“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替代”,并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实施了“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在贸易结构上,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下降,工业制造品出口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在贸易政策上,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了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在贸易形式上,以“管理贸易理论”为基础的贸易“集团化”和“地区化”(自由贸易区)日益盛行。从目前情况来看,几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有数十个国家成功地

品流动与要素的配置和流动等方面的问题。区域之间的规划应彼此协调。同时,真正实行区域经济综合调控,必须使区域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具有立法性质。这就是说,制定区域规划需有一定的法律程序,为了保证区域规划的实施,需要法律监督与追究措施。

此外,区域规划的实施还有赖于区域经济政策,它包括宏观区域经济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宏观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确定各区域的产业重点和方向,协调区际关系。为了协调区际利益,各项具体的倾斜政策在区际利益分配上应具有合理的互补性,避免区域间机会不均等与苦乐不均等,同时有利于区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是为调节区域内经济发展而制订的一套政策。主要手段有:区域内产业布局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投资政策、补助政策等。它主要是规定具体区域内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不违背区域的总体利益。

①即非生产性寻利。

②1984年,《福建论坛》等刊物对复重引进作过大量分析。

③据估计,区域原料大战约有几十种之多。1988年,国内许多报刊杂志,如《人民日报》、《瞭望》等对“生猪大战”、“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等作过大量真实报道与分析。

④1990年,《经济参考报》对区域间市场封锁作过系列报道与讨论。

⑤张万清主编《区域合作与经济网络》,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实施了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战略。统计资料显示,1965年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中初级产品占76%以上,制造品仅有24%,而到了1989年,它们的初级产品出口下降到48%,制造品出口达到了52%;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变化更为明显,1965年,它们的总出口中初级产品的比重是89%,制造品是11%,而到了1989年,初级产品的比重下降为31%,工业制造品的出口升到69%;1980—1989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年均增长率达5.4%,比发达国家出口增长率高出近一倍,东亚国家的出口年均增长率更高达10%以上;进入90年代,许多国家的“贸易比率”(Trade Ratio,出口与GDP之比)已达10%以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更高达30—195%。由此可见,世界贸易的格局正在从以“中心—外围”模式为特征的旧格局转变为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和交换”模式为特征的世界贸易新格局。

世界贸易新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即以出口为主,并以出口的增长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它的特征是出口已成为该国的主导产业,贸易战略趋于出口优先,贸易政策趋于“自由化”或“中性化”。在具体指标方面,这种模式国家的贸易比在15%以上,进出口贸易额在GNP中的比重在20%以上,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50%以上。出口带动增长模式的典型例证是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推行这种模式,尤其是有的发展中大国。当然,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能效仿新兴工业化国家,因为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越来越多的区域贸易集团使发达国家的市场缩小,无法再重现像新兴工业化国家所遇见的那种有利条件;还有人反对大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出口带动的战略,认为大国与小国在人口、地理、需求、出口在GNP中的比重等方面同小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90年代,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仍有可能持续下去;(2)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遵循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3)大的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大国也能实施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已成功地实施了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从1987年开始实行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991年,中国的贸易比已达到了19.5%,高于出口大国的日本;进出口贸易在GNP中的比重已达到36%,出口额达到了719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出口额的2%,成为世界第13大出口国;1980—1991年,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3.5%,是世界上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事实说明,中国已成功地实施了出口带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表明“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是可以运用于发展中大国的。

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最早从广东等沿海地区实施,因而广东是发展中大国实施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的最好例证。1991年,广东省的贸易比已达37%,高于典型的出口带动增长国家南朝鲜(36.3%);广东的出口占GNP中的比重已超过40%;出口年增长率达24%,是世界上最高的;出口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1991年,广东省的GDP

年增长率为18.5%；同全国相比，广东主要经济指标绝大多数居第一位，更显现出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的优势。这表明，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是能够运用于发展中大国的，至少可以先在发展中大国的某些地区实施。

世界贸易格局的另一个新变化是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管理贸易”的兴起。这一发展趋势是以近年来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管理贸易理论”为基础的。管理贸易理论是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但又兼有二者特点的一种新的国际贸易理论。管理贸易是国家和贸易集团干预和调节国际贸易活动的一种新形式。它利用一个国家制定的国内贸易法规、法令等法律手段，或通过一国的政府和贸易集团同外国政府和贸易集团谈判达成协议等形式，来约束贸易伙伴的行为，以改进本国的某些工业和贸易活动。这种理论名义上遵守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但实际上是将贸易保护主义法律化。但它与典型的保护贸易又有所不同：在形式上，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针锋相对，它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来公开地、直接地限制某些外国商品的进入，达到保护本国经济的目的；管理贸易则并不采用关税壁垒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而是通过由本国政府制定国内的贸易法令和法规，或通过由政府和大贸易集团出面与外国政府或贸易组织谈判达成双方都自愿的贸易协议，来隐蔽地、间接地限制某些外国产品的进入，以保护本国的某些产业；在目标上，保护贸易强调抵御外来产品的入侵，“保护”本国的同类产业和产品不受不利竞争的影响，而管理贸易并不是为了“抵御”外来商品，也不是为了单纯的“保护”什么，而是通过限制或“减少”某些产品的进入，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以从根本上“改进”某些产品和产业，培养其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管理贸易虽然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仍遵循着自由贸易的原则，允许某些国家的某些产品自由进入，甚至采取特别和优惠的政策来鼓励某些国家的某些产品多进入。管理贸易理论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它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多种纤维协定”。这个协定的目标，一是利用配额为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开放市场，这体现了一定的贸易平等和自由；二是限制另一些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进口，以保护发达国家的纺织工业，这又是明显的保护主义。一定的“贸易自由”和主要的贸易保护，是管理贸易的特征。管理贸易主要通过非关税壁垒来实现。它的巧妙形式是由国家规定所谓“进口管理办法”，即政府有意制定繁琐的进口和入关手续来迫使对方“自愿”减少或取消对该国的进口。管理贸易在国际范围的应用或放大形式是地区性贸易集团和近年来兴起的“自由贸易区”。1989年，美国同加拿大建立了“美加自由贸易区”，1992年5月，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决定从1993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欧洲经济区），等等。这些自由贸易区对内几乎没有设置关税和边界，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从而大大降低了成员国的生产成本，增强了它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与此同时，对内部的自由意味着对外部的排斥，对内部的低关税意味着对外部的高关税，再加上繁多的种种规定，实际上大大限制了外部产品的进入。由此可见，地区性贸易集团化和自由贸易区，是打着“贸易自由”旗号的名符其实的贸易保护主义。

广东省发展对外贸易的成绩和主要问题

广东省是中国最早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和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在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的地区：1991年，广东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222亿美元，占全国总进出口贸易额的16.4%，其中出口额达到136.9亿美元，为全国出口总额的19.1%；出口的年增长率为2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居各省市之首；1991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24.2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21.4%，增长速度是全国最高的；广东的贸易比率已达到87%，与南朝鲜同一水平。出口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广东整个经济的发展，1991年，广东的GNP增长率达13.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工业总产值为全国第二位，外贸出口额、固定资产投资、乡镇企业总产值和职工平均工资等经济指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各省市中均列前一、二名。

但是，广东省的对外贸易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有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比较突出的问题是：

(1) 出口产品等级较低、结构不合理。广东省的出口中大部分产品是纺织、服装、中低档电子产品等一般性的工业加工品，与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大致相同。但诚如上述，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竞相发展外向型经济，因而各国的出口产品中一般工业加工品的比重都大大增加了。然而世界贸易中的一般加工品市场容量有限，有的产品市场已经饱和。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已从7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产业结构。目前发达国家已经调整完毕，它们在把所谓“夕阳工业”和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建立起了高技术产业，从而使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逐渐占居主导地位。有资料表明，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资本发生了严重的“倒流”现象，发达国家的“技术输出”正在取代“资本输出”成为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手段。在出口贸易中，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额每年已达几千亿美元，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已达到总出口的80%以上；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大大提高了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但这些工业品主要是一般的工业加工品，属于中、低等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有85%以上是一般工业加工品，中高技术的电气、电子和交通设备产品只占总出口的10%左右。比如中国，1991年出口产品中工业加工品高达77.4%，但电子和交通设备出口仅占11%，高技术的电子计算机和外围设备出口只有一亿美元。在价格上，一般加工品虽然比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高，但仍比高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价格低，因此，从198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出口产品价格指数与进口产品价格指数之比）在经历了70年代的好转之后又开始恶化：从1985年的110下降为103，降低了8.4%；而发达国家由于出口中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增加，贸易条件从98上升到了100。由此可见，如果发展中国家不从根本上改造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就永远无法摆脱不平等交换的局面。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已初步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出口产品已经达到了高技术产品的新等级。广东的外

向型经济起步较晚，出口产品中以一般工业加工品为主，且品种杂、牌号乱、规格不统一，产品和产业结构都处于低层次，这表明在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相当的差距。

(2) 出口伙伴单一，对少数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依赖过强。统计表明，1991年，中国的十大贸易伙伴中，香港是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日本其次，对这两地的贸易额占到中国总对外贸易额的60%以上；广东比全国的情况更为突出，1991年，广东的总出口额是136.9亿美元，出口到香港的为118.7亿美元，占总出口的83.1%，出口到美国的为5.04亿美元，占3.7%。如果考虑到香港可能将这部分出口的80%转口输往美国的话，那么广东省总出口的70%是主要依靠美国市场的。这就形成了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有迹象表明，近年来美国经济很不景气，它的市场容量正在变小，加上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因而过分依赖美国市场会给广东经济的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3) 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广东省的出口增长快主要得益于中央给予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尤其是经济特区和“三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刺激了广东的外贸出口，但同时也是一种很高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使得广东的出口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很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够强，同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其他省份的企业相比，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因此，一旦国际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或是中央政府取消了那些特殊政策，广东的外贸出口就有可能遭受损失。从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有迹象表明广东在某些产业和产品方面的优势正在减弱，比如，江、浙、鲁的一些乡镇企业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赶上甚至超过了广东，上海浦东开发后建成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在以后的几年中有可能超过广东并取代广东的一部分国际市场。近年来广东的某些出口产品转内销，由推向国际市场转为占领内地市场，已显露出这方面的问题。

(4) 出口力量比较分散。世界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是“管理贸易”，尤其是贸易集团化和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区。而中国目前的贸易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分散化：国家、企业和个人多头上马，产品品种杂、规格乱、牌号不一，在价格上更是互相残杀，低价竞相抛售。广东省的这种情况可能更为突出。这与世界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是极不相称的。

综上所述，面对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广东应尽快采取措施，调整和制定新的有效的外贸出口发展战略，以适应世界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90年代广东省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

针对上述问题，广东省在90年代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 改善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等级。在这方面，广东可以借鉴南朝鲜和台湾的经验；与此同时，广东应及早考虑发挥“发展极”的“扩散效应”，向内地辐射比较先进的技术、产品、资金等。要认识到，广东在发展出口贸易的过程中，低工资和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变小，而内地一些省份这方面的相对优势正在显现，比如内地一些省市的乡镇企业的产品已经打入了国际市场，内地的劳动力和资源价格更低更有吸引力，许多外

商已把眼光对准中部地区,尤其是上海浦东的高技术开发,将在近几年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这些对中国总体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好势头,但与此同时也对广东的外贸出口发展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因此,广东应当及早采取有力措施,尽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比如把现在的一些一般加工产业、甚至发展势头仍很好的产品让给内地,或转移到内地,自己集中精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增强广东的未来发展潜力。

(二)大力发展多边贸易,促使贸易伙伴多元化。广东应立即着手调整出口目的地,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经济局势,一方面大力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多边贸易,尤其是要大力拓展同北美和西欧国家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也要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独联体的贸易,以拓宽国际市场,实现贸易伙伴的多元化,从而逐步减少对某几个少数国家或地区的过分依赖,并逐步减轻国际风险的影响。

(三)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广东应率先在外贸出口企业中推行新的改革方案,按照国际惯例来发展出口贸易。在鼓励出口方面,可以考虑试行取消一些企业,主要是国内出口企业的特殊政策和种种保护,把出口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由国际市场价格来调节出口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产品生产;与此同时,还应相应地进一步扩大出口企业的权限,并逐步实现出口企业的对外贸易自由化,即在价格、产品品种和结构、进出口权、外汇留用、税收及贸易政策等方面的更大放开。可以这么设想:广东的出口贸易完全由市场(国际市场)来调节。

(四)发展国际性的贸易集团,进一步向外拓展贸易。面对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日益兴盛的地区性贸易集团化,广东乃至全国都应积极发展我们自己的国际性贸易集团。针对美加自由贸易区和欧洲统一大市场,中国应当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圈”的建设和活动,并积极发挥自己的一定领导作用。广东由于基础雄厚、距国际市场近,可以在这方面先走一步,搞些试点和经验,起到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广东在对内进行产品、技术和资金辐射的同时,还应积极向海外拓展,利用自己的资金、相对先进的技术和具有优势的拳头产品,在国外,主要是在具有劳动力优势和市场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建立跨国公司,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的国际性贸易集团,以适应当前世界贸易格局的新发展。广东的一些乡镇企业已经走向了国外,但还远远不够,应当像对特区那样,采取特殊的优惠和鼓励政策来刺激更多的企业向外发展。

总之,90年代是世界风云多变的年代,是国际贸易新格局逐渐形成的年代,广东应当首先感受到这个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迎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改革开放浪潮。

主要参考文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1988,1990,1991。

关贸总协定:《1991年世界贸易年度报告》,日内瓦,1992年3月英文版。

联合国计划与开发署:《人类发展报告》,1990,1991,1992年(5月)。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版。

谈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魏国洪

一、在富裕的道路上，存在村级集体经济脆弱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乡镇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心思富。以中山市坦背镇为例，1991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收入、银行存款都创历史的最高水平。但是，在富裕的道路上也存在有不少的村集体经济非常薄弱，经济入不敷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差异较大等问题。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导致向农民乱摊派，使农民的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

1. 村级集体经济还停留在以自然经济收入为主的基础上。如中山市坦背镇是一个大沙田区，按照当地的习惯，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级的集体经济主要就是依赖属于村集体的几十亩鱼塘及部分果基承包权。根据目前该镇10个村，经济收入以鱼塘收入为主（即占50%以上）已有4个村，全镇大部分的村办企业发展步子还迈得很慢，就算发展了村办企业，但还是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上，全镇的村办企业中，个体经营的占了绝大部分，村的经济收入路子很窄。

2. 村级集体经济负担加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对于社会的福利、生活的环境改善等的要求越来越高，村级学校的修建、五保户、军烈属的供养、幼儿园的开办、修桥整路等一系列的事情都需要村给予解决落实，村作为一个基层组织既要负担学校的经费，又要解决村干部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既要负担水利费、堤围防护费、绿化费，又要负责修桥整路，要出钱维持民兵、治保会的工作正常运转，计划生育经费……，各方面的开支使很多村的经济负担不断加重，一个管理区，一年正常的支出最少也要十多万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信息》，《统计资料》，1992年5月至6月各期。

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统计资料》1992年2—6月各期。

D. 玻金斯等：《大国：规模的影响》，载拉尼斯、舒尔茨主编：《发展经济学的现状》，1989年英文版。

L. 克莱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能无限持续吗？——对亚太地区的考察》，载于《亚洲经济学杂志》1990年春季号。

薛进军：《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例证》，载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

《中心学术论文集》1991年第637号。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8. 村级经济收入薄弱,普遍地出现了向农民乱摊派的现象。国务院已于1989年发了专门文件,提出了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明确规定了农民的负担除农业税收外,就是交给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还有管理费以及乡统筹费等,加起来不能超过农民上一年收入的5%,在坦背镇,按1990年农民人均收入1375元计,它的5%就是69元,但从1991年看,村民的各种摊派一般都在100元左右,多的如沥心村达258元,远远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

农民的负担过重,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某些村干部人心浮动,干群关系不良,工作难以开展,甚至出现如同茂村农民集体上访等现象。因此,努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减轻农民的负担,已不是单纯经济领域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基层干部队伍,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课题。

二、造成问题的原因

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的负担过重,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

1. 受传统旧观念的影响。地处大沙田区的农村,人们对商品生产的观念认识不足。大沙田区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是以种田为生,解放几十年,按照国家计划而耕种,在人们的思想中,未有形成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使之成为商品的习惯,因而导致对商品生产的认识不足。改革开放后,虽然对商品生产认识有所提高,但对商品生产给本村、家庭及个人所带来的变化容易产生满足感,认为现在和过去比较,已经是好多了。不想去再冒风险,再上新的台阶。

2. 受客观条件的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特别是人材、资金、技术缺乏,村办企业搞不上去。

3. 在重视镇、乡企业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对村级的集体经济发展的扶持和指导。

4. 村级集体经济缺乏健全的管理机制。一方面由于村级经济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人员少,从上到下没有一个管理部门对各种收费进行统筹把关,对各款项的使用也缺乏审计和监督,造成收费混乱,使用不合理等问题。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兴办公益事业没有量力而行,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三、几点对策

1. 把握机遇,下大决心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目前,村级经济的发展较慢,并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已经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近年来已从领导力量、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倾斜,专门下发了文件,制定了具体的措施。一些镇级党委、政府亦把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减轻农民负担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因此,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扎扎实实地做点工作,下大决心发展、巩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减轻农民的负担。

2. 必须提高村级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形成的经济实力与村党组织的工作水平和工作活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坦背镇太平村和坦

背村的情况来看,村级经济搞得好的原因,就是那里的党组织比较健全,干部也比较积极。所以村党组织要把带领群众发展商品生产,壮大农村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不好,村党组织在群众中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号召力。一方面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勤劳致富,扶贫帮困;另一方面要致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只有壮大集体经济,基层党组织才有自身的经济基础,才能在农民中具有凝聚力。

3. 切实加强对村级财务的管理。村级财务管理,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环节,必须加以健全。一是要健全、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究;二是要加强村级财务队伍的建设,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保持财务队伍的相对稳定;三是要实行农村财务审计制度,定时审查村级财务的收支单据、帐目,及时查处、纠正发生的问题。

4. 采取得力的措施,抓好村办企业的经营管理。向强化企业管理要效益,在加强管理上促巩固提高。在一些地方,七分干劲上项目,三分干劲抓管理,是造成村办企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在村办企业的管理上,一要采用全员抵押、风险抵押等形式,进一步完善承包责任制。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杜绝肥了个人,损了集体的状况。二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管理、技术、购销、操作等专项培训,以提高企业素质。三要抓好基础管理。重点抓好标准化管理和计量定级管理,搞好检测和分析工作,以提高产品质量。四要建立健全审计监督制度,加强对企业核算工作,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五要抓好企业的整顿工作,凡不合格的要“补课”,补课仍不达标的可以关、停、并、转。六要广泛深入开展“三上三创一提高”的竞赛活动,上管理,上质量,上等级;创新,创优,创汇;提高经济效益。

5. 积极扶持经济发展缓慢的困难村队。例如,为了帮助边远的困难村队发展经济,坦背镇经济发展公司带头,成立了企业股份公司,在墟镇中心选择交通方便、供水供电条件好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搞工业开发区,实行统一征地,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优惠政策,统一管理。困难村由镇统一担保贷款参加入股,获得利润按股分红,亏本由经济发展公司负担。

此外,还可以把镇办工业效益好的工厂让出些干股给困难村,利润按股份分红给村。实践证明,这是帮助困难村发展经济的一项好措施,深受广大农民欢迎。

总之,只要各级领导重视,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就一定能解决好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以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和发展农村大好形势,保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顺利进行。

作者单位: 中山市坦背镇党委

责任编辑: 有能

深圳沙头角两个文明建设发展的 同步机制

张省轩

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沙头角是个很特殊的地方。这里有一条远近闻名的中英街,将沙头角一分为二,一边为英管辖新界沙头角,一边为我管辖华界沙头角即目前的深圳市沙头角镇。深圳市沙头角镇辖区范围12平方公里,现有人口6.6万人左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兴办深圳经济特区以来,华界沙头角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首先,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

1982年,我镇仅有6间工厂,年工业总产值38万元。到1991年,沙头角镇辖区内拥有工业企业209家,年工业总产值(现行价)7.4亿元,比1982年增长1940倍。1982年沙头角镇大小商业门店只有20间,年销售额仅194.3万元,到1991年拥有国有、集体和个体商场、门店近700间,销售总额达到7.1亿元(不含个体商场门店销售额),比1982年增长363倍。1982年,沙头角的财政收入仅145万元,1991年达到3739万元,增长39.6倍,年平均递增150%。

其次,城市建设、市政设施大为改观。

改革开放以前,沙头角属偏僻渔村,市政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大部分是低矮的旧式砖瓦平房。道路除通往盐田的铺沙“排骨”路面外,其它均为乡村羊肠小道。改革开放以来,为改善投资环境,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我们进行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的城区开发和旧城改造。1983年到1988年间,我们利用沙头角沿海滩涂进行了填海造地,围海堤长3500米,造地56万平方米。随后,又利用国土收入,大搞市政建设。自1982年以来,共完成市政投资6287万元。先后建起了保税工业区、鹏湾工业村、沙头角发电厂、太平洋工业开发区、海涛花园商住区、碧海乐园、邮政大厦、沙头角影剧院、沙头角中学、田心小学、

海涛小学等工业和社会服务设施。28层的天富花园、32层的外经大厦已于1992年破土动工。我国四大深水港之一的盐田港正在兴建之中,首期工程将建成2060〔TEU〕集装箱5万吨级6个泊位,首期港口年吞吐能力达280万吨。预计建成后,年吞吐能力为6000万吨,将成为华南最大的国际中转港。修建道路40条,达22.66公里,兴建了2×31.5千伏安的变电站,铺设深沙、沙盐供水管道8.5公里;修建了日处理1.7万立方米的沙头角水厂;建设了日供水量达2万立方米的引水工程;房屋竣工面积达89.2万平方米,总投资达6.02亿元。开凿了我国最长的一条(2.8公里)梧桐山公路隧道;开辟了沙头角口岸;开通程控电话6000多门。城区的绿化面积已达60.6公顷。今日的沙头角已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3.3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海滨城区。在市政管理上,水平不断提高。在全国十佳卫生城复查中,我镇获全市各办事处、镇评比总分第一名。

第三,人民物质生活大大改善。

改革开放前的沙头角,群众生活水平低下,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00元左右。为生活所迫,先后有2400多人逃到香港和海外谋生。改革开放这10多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到1991年底,沙头角农民的人平年收入已跃到6000多元,家家盖了别墅式的小洋楼,人均住房面积达93平方米,每个家庭都有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和空调机等高级家用电器及高级家私。职工月工资水平由1982年的102元提高到1991年的403元。改革开放以后,沙头角不仅再没有群众外流,而且有200多境外游子陆续回乡定居。

第四,社会治安好,人们普遍有安全感。

近十年,我们逐步建立起严密的治安联防组织,专门成立了保安服务公司,日夜巡逻执勤,维护沙头角的社会治安。公安干警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武警战士爱护人民、保卫人民。因此，社会治安良好，人民的生命财产有安全保障。多年来，基本上没有抢劫、盗窃、吸毒等扰乱社会治安的恶性事故发生。沙头角公安分局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分局。

第五，公益事业完善，文体活动丰富。

我们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群众的文体活动非常重视，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设有专门机构组织开展这项工作。1991年镇府投资1500万元兴建了沙头角影剧院、游泳池、田心门诊大楼和卫生防疫站。正在筹建中的沙头角体育中心，占地6万多平方米，投资6000多万元。有线电视网络1992年年底可望开通使用。沙头角现有医院一家，8个门诊部，一家防疫站，2间影剧院，33个篮、足球场，18间卡拉OK，6间书店以及其它一些公益设施。许多文体设施都以社会效益为主，免费或低收费对外开放。各个部门和单位经常举行内容健康、形式活泼的体育比赛、演讲比赛、卡拉OK大赛、文艺演出、周末舞会等。几年来，我镇的少年武术队、体操队、乒乓球队、青年篮球队、成年羽毛球队在深圳市各项比赛中均名列前茅。近年来，我们还为人民开展了劳动就业、人身安全及退休养老保险等多种福利事业。去年沙头角又作为试点在全市率先实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沙头角村对村里55岁以上的老人，由群利公司付给每人每月100元的福利费，使老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

第六，群众的精神面貌、人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在沙头角，一人有难，政府、集体和群众多方支援已形成风气。中兴街居委会一居民的爱人不幸因病去世，她本人身体也不好，家里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从她爱人患病到办理后事共花去1万多元，家庭生活一度出现困难。其间，除了民政部门、镇政府和居委会给予救济外，许多邻里纷纷解囊相助，共捐款1万多元，使她家顺利渡过难关。沙头角村有一家4口人，他本人及两个儿子都是盲人，妻子也是半痴半呆的，是一户典型的残疾人家庭。他所在的村子几乎家家都建起了别墅式的小洋楼，唯有他家仍住在旧式平房中。于是，他所在的沙头角村委、党支部作出决定，从村、群众集资兴办的群利公司的集体积累中拿出1.7万元，沙头角地方财政也拨出一部分钱帮助李仕宝建房，在沙头角搞建筑

多年的和平县建筑工程队则主动承担了几几乎是无报酬的建房工程。现在他一家也住上了一幢两层四房两厅、使用面积达130多平方米的小洋楼。村委还按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发给他家作为生活补助。沙栏吓居委会一居民，30年如一日学雷锋为人民做好事。80年代末，深圳市发行股票，当时很少有人买，她出于支援特区建设的动机，把海外亲戚给她治病的6万元买了股票，此举使她意外地获利45万元。面对这笔巨款，她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为社会排忧解难，3年来她用于赞助公益事业和扶贫济困的钱就达20多万元。这些相濡以沫、急人所急、助人为乐的事实，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

二

回顾改革开放10多年来沙头角的巨变，我们有颇多的感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14年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无论形势有什么变化，无论政策有什么调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坚定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1989年6.4期间，内地各大、中城市都有学生和群众上街游行，香港一些民运分子不但利用新闻媒介造谣惑众，还窜到我方煽动群众游行闹事，我们不为这一切所动，坚决顶住了这场风浪，各企事业单位工作、生产照常进行，整个沙头角无一人上街游行和捐款，保证了沙头角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

沙头角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是党兴办经济特区战略决策的结果。14年来，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给予特区的特殊政策，在用好用足这些政策上下功夫。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大大吸引了外商投资，并且大力抓好内引外联，注意对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做好消化吸收工作；重视人才引进、人才培养，较快地建立了一支科技和经济管理队伍。与此同时，改革了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建立了市场体系。制订了“以发展工业为主、商业和房地产为重点，兼营其它”的规划，并从实际出发，制定和调整好规划，使沙头角的经济稳定、高速、协调地发展。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我们在成绩面前看到了自己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为使我镇经

挤再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先后采取了几个大的动作：1.加快建设我镇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步伐，真正依靠科技进步，推动我镇经济发展。2.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投资少、见效快的自营工业。3.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三来一补”企业的转型工作。4.充分利用本地优势，发展第三产业。5.深化企业改革，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企业管理。由于我们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近几年来，我镇的工业年年都翻一番。

群众对生活的要求很现实，他们判断事物的根据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60—70年代香港发展了，这里的村民就偷渡到香港，改革开放以后，这里发展了，流到香港的人又纷纷回来。这一切，使我们深深感到，经济上去了，社会主义才有说服力。因此，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落脚点，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合国情，顺民意，强国富民的真理，是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二)做到两手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改革开放14年中，我镇党委一班人对自身所处的“一街两制”的特殊环境和地理位置，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沙头角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两种社会制度的结合部，既有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又是“苍蝇蚊子”飞进来的首选地，人们往往从这里看特区、看全国、看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保持社会主义风貌，发挥“窗口”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镇党委始终自觉地把精神文明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是成立了共建沙头角文明镇建设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亲自挂帅；二是制订好规划，做到具体动作年年都有计划安排；三是从财力上加以保证。近几年，镇每年用于科、教、文、体、卫设施的投资都占财政支出的21%以上，1991年就用了1500万元；四是建立检查督促制度。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两个文明建设任务“双下达”、实绩“双考评”、情况“双检查”的机制。

由于党委重视、措施得力，几年来，我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首先紧紧抓住思想道德建设这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使特殊环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样坚强有力。如围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反腐败等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活动，尤其是在青年中开展有针对

性的活动，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我们还编写了多种教材和摄制了多部电教片，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比较系统的新旧社会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对比，两种制度的对比教育，从而激发了干部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加深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为使思想道德教育经常化、制度化，镇委宣传部和工、青、妇等部门常年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1992年初开展的“精神文明在家庭闪光”的系列活动，由工会、共青团、妇联分别组织评选出10位文明临工、10位文明青年、10位文明妇女、10位好母亲、10位好父亲、10位好儿童、10对文明夫妻、10个文明家庭和10位好老人等活动。使精神文明建设的触角伸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

其次，大力抓好“硬件”设施建设，在特殊环境中建设好良好的育人环境。我镇目前已建立健全了教育和文化娱乐设施网络，党校、成人教育中心、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球场、妇幼活动中心，职工活动中心、老干部活动中心等一应俱全。在此基础上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及体育活动蓬勃发展，昔日的“文化沙漠”变成了“文明绿洲”，并吸引了众多的港方青年。镇团委和妇联还与香港新界成立“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定期举行联谊活动，这些活动既促进了边境秩序的稳定，又传播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加强特殊环境中的党的建设。

我镇历届党委都把加强领导班子思想建设、制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针对沙头角的特殊环境，相继制订了《关于加强班子建设的措施》、《关于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规定》，建立了《办事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提出了“团结、廉洁、服务、勤政”八字精神。这些制度和措施的执行有力地加强了镇委班子的思想建设，使镇党委班子的每个领导成员都能够在沙头角的特殊环境中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镇委一班人被群众称为思想好、党风正、信得过、靠得住的好班子。

我们镇委下属40个基层支部，410名党员，分布在全镇各条战线的40多个部门和基层单位。在抓党员队伍的思想教育时，我们坚持做到：反腐防变思想教育常抓不懈，运用正反典型事例教育党员，坚持从严治党，执行铁的纪律。我们始终在思想上对党员队伍的建设，坚持高标准、严

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也要硬起来

赖泽南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①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为了实现两个文明的战略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重要战略思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等。

在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工作中，怎样才能使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也与物质文明建设那一手同样硬起来呢？笔者认为，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几点：

一、树立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观念，把两个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一起抓

要求。教育全体党员，在特殊环境中生活和工作要有铁的纪律，才能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考验。10多年来，先后有500人次被评为市、区、镇的优秀党员，而党员的犯错误率仅有0.02%。

（四）改革开放是富民兴邦之路。

过去，由于受“左”的路线干扰，沙头角大搞政治边防，闭关锁国，虽然有与香港一街之隔的地理位置，却不能利用这有利的条件发展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从思想上打破了左倾思想桎梏，改革开放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工商、金融、房地产、旅游业迅速发展起来，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年年递增，沙头角人摆脱了贫穷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从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中，我们认准了改革开放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强国之路。邓小平同志南巡时讲的“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这句话，确是至理名言。

（五）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成果。

沙头角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特区中的特区，与境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

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首先必须从思想理论上对发展生产力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仅仅理解为发展经济，把现代化理解为经济现代化。其实，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中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是指发展物质生产力，而且包括发展精神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的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不仅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在十二大时就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一些同志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理论高度来理解这一战略方针，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搞经济建设之后，就容易产生只重视经济工作而轻视精神文明建设，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出

快捷和直接。改革开放14年来，沙头角两个文明建设有许多领域都曾借鉴境外先进经验，并获益不浅。在经济建设、市政建设等方面引进境外先进技术设备，增强了企业生产能力，提高了市政建设的质量。通过联办企业等方式，我们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管理方法，通过举办中港双方社团或居民联谊会、各种竞赛活动等，学习了别人不少先进的东西，为改进工作、树立社会文明风尚提供了不少可用的东西。现实教育让我们大胆取下了“左”视眼镜，懂得了：凡是对两个文明建设有用的东西，都应该“拿来”，不能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顾虑重重。境外先进的文明成果不只是专属于资产阶级的。“拿来”的目的在于“利用”，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加速我们两个文明建设，把沙头角建设成为物质文明发达，两个文明高度结合、人民受教育的水平高、思想道德风貌高尚、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新城镇，为1997年香港回归，平稳过渡，实现“一国两制”创造有利条件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深圳市沙头角镇委
责任编辑：范英

现“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因此，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的重要谈话中重申：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亚洲“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既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内容和共同目标，那么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决不能因为目前经济还不富裕，物质条件还不够好，或者当前经济建设任务重、时间紧，就不愿花时间、花精力、花财力、花物力去搞精神文明建设。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当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计划一起订，两个任务一起下，两个建设一起抓，两个成果一起拿，使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同样硬起来。

二、制定具有一定量和一定质的“软件”、“硬件”建设发展目标，使软任务变成硬指标

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同其他建设事业一样，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正确处理好“软件”和“硬件”的关系很重要。

“硬件”是指导思想、精神建设的物质载体，包括手段、阵地、制度建设等。这种建设的效果是完全可以绝对数式百分比来衡量的，是可以成为硬指标的。只要确定了一定量的发展目标，又采取实际步骤，就能一步步地去实现。而“软件”是指精神文明的活动过程，包括正确理论的灌输，信念、理想的树立，时代精神的培养，思想道德问题的解决，民主法制观念的增强，以及进行各种教育，等等。这些活动的效果基本上是不能变为硬指标，无法用任何绝对数式百分比来衡量。但有些活动进行的次数、参与的人数、要达到的程度等，是可以提出一定量要求的。没有一定的量，也就没有一定的质，这些活动是搞不好的。

可是过去不少同志，总觉得物质文明建设的主要对象是财和物，任务和目标很具体，容易用数量来计量和数字来表示，做起来很实在，物化劳动成果见效较快，劳动价值易被上级领导和社会承认，因此，物质文明建设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技术工作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不易实行目标管理，他们的物化劳动成果也是间接的，他们创造的精

神形态价值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形态价值，不仅周期长、潜在性强，而且不易用准确数字来计量和按直接劳动成果计酬。因此，政工干部劳动价值不易被上级领导和社会承认。加上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比以往难度大，在领导机关检查评比时又常常存在只看物质生产、经济效益指标完成的片面倾向，因而使相当一部分干部不愿做这项工作，造成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难以硬起来。

为了改变上述情况，首先，各级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和对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不同特性，既要尊重经济技术干部的劳动，又要尊重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建立必要的法规和制度，维护政工部门的权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二，必须把是否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作为选拔干部、评选先进的基本标准，并通过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具体制度把它确定下来。

第三，必须根据“积极努力，量力而行，扎实有效”的原则，把教育、科技、党校、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书店、文化馆（或文化宫）、图书馆、博物馆（或展览馆）、体育中心（或场馆）、医院（或卫生院、所），以及乡镇的文化中心（站）、管理区或村的“四位一体”的文化室等阵地设施和队伍建设的发展目标具体化，从各地、各单位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实际出发，提出不同的要求，按一定的比例数制定具体指标，规划落实到基层。

三、精神文明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充分发挥精神对物质的推动作用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②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强调坚持两点论的同时，还强调要坚持重点论。没有重点就没有

政策，就没有中心。因此，不能因为要两手抓，就形成两个中心，或者以精神文明建设去取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心只能有一个，搞多中心，旁移中心，都是违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为此，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围绕着、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搞空头政治和“两张皮”，精神文明才能发挥自己特有的作用，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引起人们的重视、支持和参与。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但精神、意识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对物质、存在发生巨大的能动作用。就两个文明的基本关系而言，它们之间表现为基础与推动的关系。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产生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指导作用；二是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推动作用；三是思想、方向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证作用。理论界有的专家、学者还认为，精神有六种功能：第一，反映、认识的功能；第二，预见、预测的功能；第三，确定目的、目标、任务的功能；第四，制定行动路线、计划、方法、选择最佳方案的功能（包括价值判断的功能）；第五，在进入改造世界的行动过程的时候，又有指导和控制人们的行动的功能；第六，有调整和规范社会成员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功能。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精神的各种功能为它服务。从当前的情况来说：

（一）物质文明的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日益迫切的客观要求。因为社会治安混乱，会把投资者吓走；行业不正之风会把投资者气跑；机关思想守旧、办事效率低，会使投资者丧失信心；没有相应的精神文明做保障，特区优惠政策再多、再特，也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必须坚持两手抓，坚决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加强党政机关的勤政廉政建设，纠正不正之风，清除腐败现象；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迷失方向的危险发生，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加快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们应当下决心抓好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为改革开放和经

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条件和智力支持。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中国发展的道路，是否能够长期坚持，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好后代。为此，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培育“四有”新人，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搞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这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各级领导增强主导意识，摆上位置真抓实干

实践已证明：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抓就不难。只要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带头实干，起表率作用，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就一定会硬起来。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学习和全面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增强主导意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艺术，提高两手抓的自觉性，把精神文明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加强领导，既要有统一部署，又要有检查、督促，既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又要把各部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切实做到党委书记带头抓，主管领导专门抓，各个部门配合抓，吸引群众参与抓，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同时，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也列为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提出每年办好几件实事，定期检查、验收，切实做到真抓实干，促进各项建设的落实。

此外，还要贯彻“抓促结合”的方针。各地区、各部门要订出具体的参赛、评比、奖励条件，在城乡广泛地开展创建、共建文明单位、文明街道和文明户、文明村镇的竞赛活动，进一步强化激励竞争机制。而且要把表扬和指出差距、批评和鼓励帮助结合起来，并建立检查、督促、评比、命名制度，使创建、共建活动形成“压力——动力——效力”的良性循环。

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讲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体现内容并服务于内容。没有内容就没有形式，但没有一定的形式，内容也体现不出来，贯彻不下去。形式与形式主义的根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实效。因此，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既要采取一定的形式去保证贯彻落

在改革开放中迈向文明之路

——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启迪

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研究课题组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珠江三角洲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迈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新路子,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特色与成效

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的特色和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人们逐步走上了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之路。在改革开放中,作为先富起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不但追求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而且对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也成为迫切的愿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不等于文明”、“既要发展生产,走向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又要向愚昧落后作斗争,走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珠江三角洲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坚持“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一是80年代初普遍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使城乡环境的脏、乱、差现象得到了初步的治理和改善。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企业文化、乡镇文化、区街文化蓬勃发展。如顺德市乡镇企业已成立的美术、书法、摄影、文学、灯谜、音乐、舞蹈等业余文化组织就有500多个,拥有120多个有图书阅览、视听室、广播站、培训室、歌舞厅、健身房等设施在内的职工俱乐部。近年举办了全国瞩目的“顺德市亿元企业艺术节”,就有16个亿元企业的近百支业余文艺团队2000多人参加。此外,其他市县五彩缤纷的各类“艺术节”也层出不穷。其中如广州的“民间艺术欢乐节”、中山的“慈善万人行”、东莞的“荔枝节”等等。三是开展了群众性的社会公德教育和树新风活动。佛山市在前几年率先开展了社会公德警句的征集、宣传、教育活动。其后,全地区又按省的部署广泛开展社会公德大讨论活动,珠海、江门、东莞、中山等市还编印了社会公德“三字歌”,从幼儿教起,使省委提出的“28字”文明新风得到了倡导和落实。四是广泛地开展了创建文明户、文明村、文明单位、文明镇,以及文明路段、文明街区、文明城市的活动。特别是创建文明村户活动,把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千家万户。五是普遍开展“文明在我市(县)”的城市精神、城市风气,以及市徽、市歌

实,又要防止只图虚名、不讲效果的形式主义。实践证明,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建立在扎实有效、摒弃形式主义的基础上,才能不断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0页

② 同①,第214页

作者单位:中共清远市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范英

的征集、讨论、宣传活动，把它作为提高人的素质、树立精神支柱的好途径。如广州市发动全市人民广泛征集、讨论、筛选，确定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广州人精神”和“广州市风”，以及市徽、市歌，使广州人和广州市的美好形象有了丰富的内涵和努力方向。六是坚持不懈地开展“除七害”的活动和斗争，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所有这些活动都着眼于群众性，因而有效地把群体的文明意识、文明风尚和文明生活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使珠江三角洲的人们在物质生活逐步共同富裕起来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同步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思想观念大变化，在改革开放中敢开风气之先成为了人们的精神风貌。珠江三角洲人以实事求是，开放、兼容的态度，坚持排污不排外，敢于大胆地学习借鉴外来的现代文明，因此，较早地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换了脑筋，人们的思想观念在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人们牢固地树立起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思想。迷信教条、迷信本本等僵化思想被勇于开拓、敢闯敢冒的新思想、新观念所代替。二是人们能较早地从“恐资病”中解放出来，大胆地学习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三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逐步确立，成为人们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巨大驱动力。人们迅速摆脱了过去那种小农生产观念和 product 经济观念的束缚，培养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时效观念、平等观念、科技观念、人才观念等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要想富、先修路”、“要发财，靠人才”等等新观念已经逐渐成为珠江三角洲人的强大思想动力，并且逐渐向内地和全国辐射、传输。概而言之，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新观念、新风尚和新生活方式的涌现之源。

三、人的素质大提高，一代新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成长。与内地相比，珠江三角洲的精神文明建设在服从与服务于经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表现尤为出色，这主要体现在一大批市场经济人才在茁壮成长。珠江三角洲在人的素质的发展上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这就是重在务实，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他们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着力培养实用型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注重提高人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文化素质。据统计，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开设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已达103个，如南海大沥镇的铝型材专业、佛山石湾的陶瓷专业、广州市白云区的养鸡专业，等等。镇镇都有成人教育中心，大部分乡村有技术推广站，企业工人岗前培训达80%以上。随着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一大批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不断涌现。

四、精神文明建设的“硬件”设施大发展，并与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新农村建设相配套。珠江三角洲地区随着物质生活上的富裕，也舍得对教育、科技设施和文化阵地的投入，使传播和培育精神文明的“硬件”与“软件”配套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新农村建设配套发展。这也是珠三角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一是兴建了一大批高档次、现代化的大、中、小学校舍、文化活动中心、体育馆、博物馆、剧院、幼儿园、敬老院等教

育文化阵地和社会福利设施。二是珠江三角洲广大农村按照村头标志化、道路沟渠硬化、饮水自来化、厕所无害化、禽畜专栏化、保洁经常化、村头村尾绿化美化的要求，广泛开展了改水、改厕、改灶、改路、改造旧房和净化、美化、绿化环境的工作，使农村的脏、乱、差的状况进一步有了明显的改变，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富裕文明新农村。创建文明村户的活动不一定是珠江三角洲的创举，但是，他们是后来居上，并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一条就是“硬件”建设档次高。在珠江三角洲不少乡镇已经形成了农村工业化、农民居民化、乡村都市化、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

五、人们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的新信念。在开放改革以前，由于路线上的错误，即使天天政治学习、“灵魂深处闹革命”，但珠江三角洲人的精神并不见得很高；相反，不少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有些地方特别是青年人纷纷外逃港澳，出现了“青年人逃光，田地丢荒，老年人心慌，干部难当”的凄凉景况。今天，不仅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百万外地民工涌入了这块热土，而且本地外流人员也纷纷回乡定居，热心建设家园。“社会主义好不好，请看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人常常自豪地对参观者如是说。这是多么鲜明的反差！这应该说是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卓有成效的实证性的生动答案和最终体现。

经验与启迪

十多年来，珠江三角洲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遍及广大城市农村，各行各业和家庭个人，已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多渠道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她的成功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迪。

启迪之一：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以经济发展的物质力量为基础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是珠江三角洲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之所以能蓬勃、持久而且富有成效的一条首要经验，也是与过去那套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两张皮”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们从事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精神方面的活动，不以吃、喝、住、穿这些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基础，是寸步难行的。一定的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是一切精神生产、精神生活活动的物质基础。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给我们揭示了真理。我们应当而且“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南海人在总结回顾他们所走过的路子时作了这样的概括：“有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也万万不能”。他们认为，这对于物质文明建设是这样，对于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如此。他们说的“钱”，也就是物质基础、经济条件。

就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水平与状况而论，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该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在“七五”期间便超过我省同期的12.4%，达到20%左右，较之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起飞时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珠江三角洲带来了强大、坚实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成为了那里的精神文明建设勃起的强大、坚实的

物质基础和物质引力。

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开展所取得的经济成效引动了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勃起，而精神文明建设的蓬勃发展又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两者相辅相成，紧密结合，成为了两个文明建设共同协调发展的合力。这突出地表现在人的思想观念的大变化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方面。

“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更新与追求，因而大大推动了珠江三角洲人总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趋向。具有全新的现代观念，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型干部大批成长，新型的农民企业家大批涌现。始自十多年前的“读书热”和“科技热”，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近几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力的增长，科技方面的因素就占47%。总之，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一方面，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谈话时所指出的，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另方面，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切活动，都应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于经济建设。只有这样，精神文明建设才有生命力，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启迪之二：要以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珠江三角洲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蓬勃兴起，很重要的一条，在于确立和倡导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

从珠江三角洲的总体上说，由于其地理和人文的因素，其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是比内地强的。但是，由于过去长期来推行思想意识的保守性、封闭性，严重窒息了人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不仅敢于在经济上向外，而且对于外来的、新异的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主动的，能以客观的、平等的、包容的心态加以对待，对于“排污不排外”的方针积极贯彻。因此形成了眼界开阔，广纳天下，敏锐创新的胸怀，并敢于和善于吸取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港澳台的一切文明成果。顺德人常说的“拿来主义”就是生动的体现。他们所理解的“拿来主义”，既“拿来”中华民族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拿来”港澳台地区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不管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过去的长时间里，我们对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面看得很少，这是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参见《南方日报》1992年5月2日）。珠江三角洲人的“拿来主义”，就是尊重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近十多年来，他们从港澳台地区和资本主义国家“拿来”的东西，除了科学技术和方式外，还有卡拉OK文化、桌球文化、时装文化、美容文化、礼仪文化、广告文化、录相文化、建筑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及至股份文化、股票文化等等。一般来说，这些都是先由珠江三角洲引发而后传及内地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活动不断充实扩展。而且，在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过程中促使了中外优秀文化的糅合，进一步发展了具有岭南风貌的珠江

三角洲的区域文化、本土文化，把外来文化引向民族化、地方化的新方向。

珠江三角洲人的“拿来主义”，又是与“排污”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文明成果的同时，对其糟粕则坚决加以排除和抵制。比如在引进桌球、电子游戏机的同时，坚决抵制了含色情成份的电脑板游戏的渗入，并严禁利用这些活动进行赌博，等等。

启迪之三：要有广大群众的自觉参与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关系到亿万群众的文明建设事业，最重要的是要有广大群众的自觉参与。要使群众自觉参与，就必须从群众的切身需要出发，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的物质生活开始富起来之后，面对着精神生活和农村建设方面存在着的问题，如农村社会环境的脏乱差，社会风气的受污染，一些人精神生活走上歪路，等等，群众迫切地需要改变这种“不平衡”状况；面对着发展市场经济，大办乡镇企业等经济建设的种种问题，群众也迫切地要求提高自身的素质。农村文明村户的创建活动就是在群众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及时引导而开展起来的。而在开展这项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重大社会实践活动中，各级党政部门十分注意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比如，各个地方都建立起有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评议、管理小组；把评选条件交给群众，实行自报与公议相结合的评议方法。经过几上几下的自评与公议，最后张榜公布，三榜定案，送牌上门。整个评选过程，实际上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激励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同时，在评选过程中，还着眼于群众的大多数，采取不限比例和“以多促少”的办法，从而把绝大多数群众吸引到关心、支持和参与创建文明村户的活动上来。形成家家争当文明户，村村争创文明村的生动局面。珠江三角洲的这种做法启示人们，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一定要适合初步富裕起来的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不然就不会被他们所接受，“‘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同时，还要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有这二条，才会有广大群众自觉参与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在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诸多的创造性经验中，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建设文明街道和南海市农村创建文明村户的路子，特别具有典型示范的意义。“两南”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千千万万群众的事业落实到广大城乡基层，落实到千家万户。这个经验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是尊重群众的热情创造，又为群众自身利益服务，因而完全可以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启迪之四：要充分重视硬件载体的作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珠江三角洲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蓬勃发展，同充分重视硬件载体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在珠江三角洲，如果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不着投资，用不着什么硬件设施，

这是没有人相信的“神话”。在那里，经济发达的市县乡村，都很讲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的投资，都很讲究精神文明建设所必需的现代化布局与设施，因而，品种齐全的硬件载体有如星罗棋布，随处可见，一改过去思想文化建设有虚无实的状况。

现象是本质的表现。珠江三角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如此繁多的硬件载体应运而生，是以当地从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的一种内在过程的体现。

一般地说，这些硬件载体，就是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实实在在的设施和阵地，它们对于人们具有认识的功能，教育的功能，审美的功能和娱乐的功能，等等。这些功能作用的明显表现是，一是将美化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与优化外商投资的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将变革人们的生活氛围与改善人们的智德心灵和强健人们的体质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将消除城乡遗留的内外差别与实现现代化要求的城乡一体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四是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化实体设施与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在关联和深层效应有机地结合起来。总之，这些硬件载体对于提高珠江三角洲人的文明素质，建设文明新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

启迪之五：要逐步建立和健全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珠江三角洲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蓬勃发展，还由于它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在这种运行机制中，特别注意引入了社会主义的竞争和法治，这是使创建活动持续、有序和有效进行的协调系统；他们注意从本地建设精神文明的切身体验出发，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机制。按照中共广东省委的统一部署，珠江三角洲的各市、县二级均设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甚至一些乡镇也有相应的机构。各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简称“文明办”，专司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布置、检查、监督、评审、沟通和协调等工作。“文明委”和“文明办”的重要作用在珠江三角洲已经得到广泛的公认，成为了专抓精神文明建设的“另一只有形的手”。

二是强化各方共建机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党、政、军、工、青、妇等部门、团体、社区以及各种人员，将这些力量集中起来加以运作，真正体现共建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有利于把相关的工作落实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在共建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各地特别重视军民的合作共建，人民军队对当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三是强化管理操作机制。这包括具体的竞争机制、法治机制、监督机制、验收机制、奖惩机制、推广机制等等管理环节与操作措施，使之逐步走向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针对该地区邻近港澳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繁荣的景况，省外的流动人口相当频繁的事实和社会治安任务极其艰巨的情况，整个运行过程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的竞争机制和法治机制。在南海市等地创建文明村、户的经验里面，竞争机制和法

价值转化规律论(下)

——《价值转化工程》之一章

黄锦奎

8. 价值转化相关效应规律(相关效应律)

价值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同的价值在本质上或表现上是相互联系的。某一价值或某些价值在时间与空间上或其他形式上实现了价值转化,也同时影响了其他价值的转化,特别是主导价值在整个价值体系中发生变化,对其他价值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某些价值的变化影响到其他价值的转化所产生的一系列效应,叫价值转化相关效应规律。

常见的价值转化相关效应有“规模效应”、“乘数效应”、“马太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虚

拟效应”、“附加效应”等。

价值转化“规模效应”。价值转化各种要素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整体效益。适度规模的集中各价值转化要素使各要素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带来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节约,使其价值转化代价或成本的下降,进而大大地提高整体的效益。经济学上的“规模经济”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价值转化“乘数效应”。某一价值产生变化,使其他价值成倍的增加的效应。西方凯恩斯学派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投资乘数理论以及迈达尔的极化效应理论就是这种“乘数效应”。

治机制的份量很重。在那里,文明村、户的建设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年中初评与年底定评之间,存在着升与降的双向变动态势,使已评上的克服“一劳永逸”的心理,落选的有了上进的机会,因而形成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在那里,除了经常抓好“除七害”的工作外,文明村、户建设突出了法治机制,《义务教育法》、《婚姻法》、《兵役法》、《土地管理法》、《水法》和计划生育方面等等法规,都列入评选文明村、户的标准之中,把一些软任务化为硬指标、硬要求,从而成为千家万户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实际行动。在这方面,与新加坡文明建设的经验有共同之处。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提出,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时代赋予广东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走在前列,充满活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说,更是摆在面前的紧迫任务。目前,珠江三角洲正按照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要求,确定两个文明建设的跨世纪的战略规划,努力争取在现有的基础上,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课题组负责人:梁渭雄、李权时

课题组成员:梁渭雄、李权时、范汉英
关飞进、王逢文、冯达才
叶金宝、贾云平

责任编辑:冯生

注:本文发表时作了删节。

价值转化“马太效应”。如《圣经》马太福音讲的，让富有的更富有，没有的连它本身都要剥夺。这是两极分化的价值转化相关效应。

价值转化“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价值的变化使其他价值产生连锁变化的效应。

价值转化“虚拟效应”。这是一种综合相关效应。有人对我国起步不久股市的发展与繁荣造就大批大富翁小富翁不理解，常常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炒股票人人都会赚钱，公司财富这只蛋糕为何变大了？这是由于股票市场机制的作用产生“虚拟效应”，使社会总财富中凭空多出了一块虚拟增值，即市场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差值的缘故。股票的市场价值是受社会经济多种复杂因素相关效应影响的结果。“虚拟效应”不但产生虚拟增值，而且产生虚拟贬值，前面提到的1987年美国华尔街股票风暴，使五千亿美元随风而去，就是这种效应的作用。

价值转化“附加增值效应”。某一价值的东西附加某一价值的东西，由于相关效应作用使它们价值不是它们的和而是大大的增加。这就是价值转化的“附加增值效应”。附加增值效应是一种相关效应，体现在商品上就是商品的附加价值。商品之附加价值，就是商品除了本身的作用外，因设计的巧妙而具备许多附加作用，以及装璜包装，文化智慧设计价值。在当代，不管是商品或服务，只有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才能以特殊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如外国五星级大酒店，除提供食宿外，还提供电话秘书、文件传真、复印、商务服务等，就是创造附加价值的例子。

9. 价值转化滚动增殖规律（滚动增殖律）

价值转化滚动增殖规律也称雪球增殖律或称“母鸡”律。有一个故事，说一老人临终留给两儿子遗产是两只母鸡，每人一只，老大把母鸡产下的蛋通通吃光，最后连母鸡都吃掉了。而老二却省吃俭用，母鸡生蛋，蛋孵化为小鸡，小鸡长大又生蛋，再孵化为小鸡，不出几年，老二鸡鸟成群，日子越过越富裕。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重要而简单的价值转化规律，即滚动增殖规律。价值转化可以象母鸡孵化小鸡一样按几何级数般增殖。所以又称“母鸡”规律。“母鸡”规律关键在于母鸡生蛋，而在蛋生众多的母鸡。古代商人范蠡谙悉这个规律，他认为“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因此主张合理储存商品，正确使用流动资金，以

减少不必要的资金积压，从而加速资金周转增加利润。他要求“无息币”，就是指流动资金应当不间断的周转，不要停滞于手中，以发挥其效益。最近有人发表文章，题目是《让资金走向市场》，就是让资金在市场上滚动增殖创造财富的机制。所以，也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滚雪球，雪球越滚越大，也称“雪球增殖”。前面提到的蛋生母鸡，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说，是再生产的投资，范蠡提到的“无息币”，实质上也是再生产的投资。西方凯恩斯学派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有一种理论，叫做“投资乘数理论”。其内容是：投资的增加会带来数倍于投资增加额的国民收入增加额。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就是价值转化滚动增殖规律，人类文明与财富就是遵循着这一规律，呈加速倍增的发展。这条规律告诉我们，要创造更大的财富和明天更富裕的生活，关键的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价值资源投入到价值的再转化过程中，也就是财富的再生产。

10. 价值转化良性循环规律（良性循环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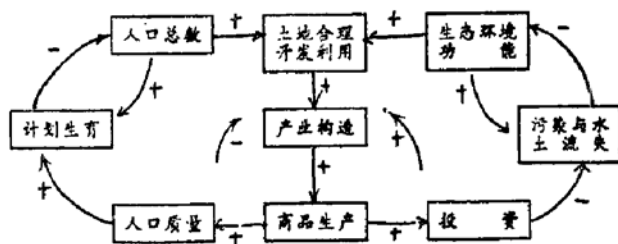
价值转化良性循环是价值转化呈有序的相互促进产生整体增益的连续系统有规律的循环。建立人类价值转化的良性循环非常重要。人类从事改造客观世界一切实践活动，实现了价值转化，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资源枯竭、大气污染、生态环境失衡等大量的问题，造成了恶性循环。这就要求在创造财富实现价值转化的同时，必须保护与节约资源，利用再生资源，减少污染，注意生态良性循环。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经济和人口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社会的发展及“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等问题的出现，人们所认识到的生存空间、环境资源的供应能力和环境污染的自净能力产生了无限到有限，从大到小的转变。60年代，A·斯梯文森提出了“地球号宇宙飞船”的概念，E·鲍丁发表了《未来的太空船——地球经济学》，提出了“牧童经济与太空人经济”两种经济类型，提出了未来的理想经济必将是具有良性循环的“太空人经济”。

所谓“牧童经济”指的是现存经济即开环式经济。人类要发展生产，就要以资源的形式从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然后通过消费，再以“三废”形式排向环境。因而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会影

响环境。如果向环境索取与排放过多，超出环境供应能力和净化能力，就要破坏环境与污染环境。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特别突出，由于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攫取高额利润，就必然追求高生产和高消费，消耗大量资源，排放大量“三废”造成环境污染，加剧人与环境的矛盾恶性的循环。所谓“太空人经济”指的是闭环式经济，它具有完善的良性循环物质性能。其理论依据是，把地球看作一艘宇宙飞船，除能量需靠太阳供给外，人类的一切物质需要都要靠内部的物质循环来满足。它将把“三废”转化为再生产的原料，把有限的物质纳入无限循环利用的轨道，这是一种具有良性循环的符合生态学原则高级的经济。这种“太空人经济”实质上是根据价值转化的良性循环规律设想出来的。

现代生态农业就是价值转化良性循环规律的最好例证。现代生态农业实行各种种植，各种经营结合，专业化与综合化的多样化生产，使生物物质得到高级利用，实现生物能量转化的高效率和价值转化的高效益并正确处理系统内部的控制与外部人工调控关系，重视自然调节作用，使其二者有机结合。生态农业循环利用“废物”变废为宝，减少污染，通过适当的外部投入实现物质循环平衡和增加产品循环利用等等。传统农业是“人口——耕地——粮食”的恶性循环，而生态农业是“人口——土地——商品”的良性循环。如图：



11. 信息价值转化规律（信息律）

著名日本经济学家松田米津写了一本书叫《信息社会》，为信息社会的到来描绘几个方面的特征。他认为工业社会的主导业是制造业，其组成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信息社会的主导业是“智力工业”，与信息有关的工业将以

第四产业出现。工业社会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为目标，信息社会以实现“时间价值”为目标。也就是强调信息社会是以信息工业为主的信息价值转化的社会。信息将与物质、能量一样并列，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美国农业经济学家 G·爱得华舒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虽然农业产量增加了，但是物质资源的投资并未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率提高了，而生产率的提高大部分靠的是新知识与新信息。所以说，信息是一何等重要的资本投入与资源。

信息作为宝贵资源，不但是财富的象征与源泉，而且通过价值转化，直接创造财富，使财富增殖。信息价值转化有自己特有的特点与规律。

(1) 信息使非资源转化为资源的价值转化规律。不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资源，投入相应的信息后都会使其产生价值或增加价值。荒芜的沙漠加上信息就可变为生长作物的土地；呆滞的资本加上信息就会变成赢利的投资；免费的阳光加上信息就可提供无尽的能源。石英过去主要是生产玻璃的原料，但在加入大量信息后，石英变成了能量转换装置——阻挡层光电池，变成了信息装置——硅卡。前者将为我们这个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低廉的电能，并带动这些国家的发展。后者更具有无可限量的价值，一小块薄薄、重量不到一克的硅片可成为强大的电子计算机的“大脑”，具有每年创造价值几万美元的服务和收入的潜力，而制造这样一块硅片所需的全部投入是微不足道的。由此可见，信息通过实现非资源转化为资源的价值转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2) 信息价值转化传递增值规律。信息传递速度越快，越缩短信息的流动时间，实现价值转化与财富的增值过程越快。这是现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明显标志。“时间就是金钱”。有一学者说，推动美国经济前进首先是两大发明即电报电话与铁路。电报电话就是加快信息的传递时间，缩短信息的流动时间。通过缩短信息流动时间创造财富的古老故事之一是，欧洲银行家罗斯查尔德家族通过从滑铁卢放回的信鸽抢先了解到拿破仑战败的消息后，马上从证券交易所赚进了一大笔。现代电子通讯技术如卫星通讯，电视电话，联机检索电视会议系统等一系列先进的技术设备，使信息的流动时间由过去的以周、日计缩短为现在的分、秒计，大大加快了财富的增值

从价值学与价值转化学角度进行抽象概括,可以得出若干带有普遍意义的宏观价值转化规律。本节仅就个别规律提出粗浅轮廓,供研究者参考。

宏观价值转化系统配套规律。宏观价值转化是一个大系统,符合于系统价值转化一般规律。宏观价值转化系统配套规律是使宏观价值转化系统内部各要素、各层次以及结构、功能组合、各子系统通过系统配套、发挥整合作用,从而实现价值转化的正向最大化的规律,没有系统配套,就没有产生协同作用,就不能有序,就不能使系统发挥最大的效益,有时甚至相互抵消产生消极作用,使系统陷于混乱导致无序,产生负目标导向效应。我们通常讲改革要系统配套,就是这个道理。改革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实质上是使价值转化的正向最大化,其途径是通过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等,使资源得到优化置配和最大利用,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不能没有系统配套的观念,靠单项改革、东补西拆,只能导致无序,宏观价值转化受阻或出现漏洞。目前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就是这个道理。

宏观价值转化系统开放规律。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与外界进行能量、物质、信息交换并不断吸取外界物质、能量、信息来充实与发展自己,从而产生生机。与环境外界隔绝的封闭系统由于没有外界环境的作用,只能处于低水平的退化发展状况。宏观价值转化系统开放规律,就是宏观价值转化系统通过与外界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充分利用价值资源实现系统的价值转化的竞争互补协同与良性循环,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扩大对外开放,就是这个道理。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等是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

宏观价值转化速度规律。宏观价值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效益,但速度并不等于效益,高速度并不导致价值转化正向导向的最大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非常深刻地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我们这样较落后的国家就很难得到发展;但经济建设又要量力而行,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才能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健康发展。

宏观价值转化的区域规律。这是空间价值转

化的宏观规律,宏观价值转化具有不同的区域特点,这是由于各不同区域资源、环境地理条件等决定的。是有根据不同的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区域优势,充分地利用可开发的价值资源,进行合理的布局,形成生产力要素的最佳配置,才能产生区域的转化效应与乘数效应,实现宏观价值转化的最大效益。

宏观价值转化大循环规律。例如,前几年经济学界有人提出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它的主要论点是: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丰富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将农村劳动力转移融入国际大循环中,一方面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资源的闲置,使其转化为参与国际分工的生产力创造价值,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宏观价值转化,通过这一宏观价值转化在国际市场上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援发展我国农业,这样沟通了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通过宏观价值转化大循环转换机制,实现了剩余劳动力为农业与重工业发展的宏观价值转化。上述国际大循环战略是宏观价值转化大循环规律应用的一个例子。

(三) 价值转化微观规律与特殊规律

价值转化的微观规律是指微观层次中的价值转化规律,价值转化的特殊规律是指不同领域、各个行业、专业、部门不同的价值转化规律。价值转化微观规律与特殊规律在微观层次与不同领域与行业、专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价值转化工程不仅要以价值转化的一般规律作指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熟悉价值转化的微观规律与特殊规律。现代化大生产中,自动化现代化技术程度很高,某一技术某一生产环节有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生产线上价值转化。这些就是价值转化的微观规律问题。股票市场的价值转化规律是由股票市场的发展变化规律为依据的,与其它相比,具有特殊的规律性。只有认识其股票市场特殊规律性,才能掌握其股市价值转化特殊规律,才能掌握时机,适时买进与抛出,或作中长线投资的决策,实现其正向的价值转化。房地产行业有房地产业特殊价值转化规律与微观规律,其特点是转化速度快,然而只有掌握其中转化奥秘,抓住机会才能稳操胜券。香港不少商业巨子不都是靠房地产业大发横财获得巨大财富吗?因此,从新的价值学体系着眼,着手在研究微观层次上

从价值学与价值转化学角度进行抽象概括,可以得出若干带有普遍意义的宏观价值转化规律。本节仅就个别规律提出粗浅轮廓,供研究者参考。

宏观价值转化系统配套规律。宏观价值转化是一个大系统,符合于系统价值转化一般规律。宏观价值转化系统配套规律是使宏观价值转化系统内部各要素、各层次以及结构、功能组合、各子系统通过系统配套、发挥整合作用,从而实现价值转化的正向最大化的规律,没有系统配套,就没有产生协同作用,就不能有序,就不能使系统发挥最大的效益,有时甚至相互抵消产生消极作用,使系统陷于混乱导致无序,产生负目标导向效应。我们通常讲改革要系统配套,就是这个道理。改革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实质上是使价值转化的正向最大化,其途径是通过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等,使资源得到优化置配和最大利用,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不能没有系统配套的观念,靠单项改革、东补西拆,只能导致无序,宏观价值转化受阻或出现漏洞。目前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就是这个道理。

宏观价值转化系统开放规律。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与外界进行能量、物质、信息交换并不断吸取外界物质、能量、信息来充实与发展自己,从而产生生机。与环境外界隔绝的封闭系统由于没有外界环境的作用,只能处于低水平的退化发展状况。宏观价值转化系统开放规律,就是宏观价值转化系统通过与外界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充分利用价值资源实现系统的价值转化的竞争互补协同与良性循环,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扩大对外开放,就是这个道理。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等是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

宏观价值转化速度规律。宏观价值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效益,但速度并不等于效益,高速度并不导致价值转化正向导向的最大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非常深刻地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我们这样较落后的国家就很难得到发展;但经济建设又要量力而行,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才能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健康发展。

宏观价值转化的区域规律。这是空间价值转

化的宏观规律,宏观价值转化具有不同的区域特点,这是由于各不同区域资源、环境地理条件等决定的。是有根据不同的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区域优势,充分地利用可开发的价值资源,进行合理的布局,形成生产力要素的最佳配置,才能产生区域的转化效应与乘数效应,实现宏观价值转化的最大效益。

宏观价值转化大循环规律。例如,前几年经济学界有人提出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它的主要论点是: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丰富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将农村劳动力转移融入国际大循环中,一方面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资源的闲置,使其转化为参与国际分工的生产力创造价值,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宏观价值转化,通过这一宏观价值转化在国际市场上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援发展我国农业,这样沟通了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通过宏观价值转化大循环转换机制,实现了剩余劳动力为农业与重工业发展的宏观价值转化。上述国际大循环战略是宏观价值转化大循环规律应用的一个例子。

(三) 价值转化微观规律与特殊规律

价值转化的微观规律是指微观层次中的价值转化规律,价值转化的特殊规律是指不同领域、各个行业、专业、部门不同的价值转化规律。价值转化微观规律与特殊规律在微观层次与不同领域与行业、专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价值转化工程不仅要以价值转化的一般规律作指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熟悉价值转化的微观规律与特殊规律。现代化大生产中,自动化现代化技术程度很高,某一技术某一生产环节有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生产线上价值转化。这些就是价值转化的微观规律问题。股票市场的价值转化规律是由股票市场的发展变化规律为依据的,与其它相比,具有特殊的规律性。只有认识其股票市场特殊规律性,才能掌握其股市价值转化特殊规律,才能掌握时机,适时买进与抛出,或作中长线投资的决策,实现其正向的价值转化。房地产行业有房地产业特殊价值转化规律与微观规律,其特点是转化速度快,然而只有掌握其中转化奥秘,抓住机会才能稳操胜券。香港不少商业巨子不都是靠房地产业大发横财获得巨大财富吗?因此,从新的价值学体系着眼,着手在研究微观层次上

以及各个行业、专业、领域规律的丰富资料基础上,从价值转化学角度进行归纳抽象出价值转化微观规律与特殊规律,对于指导人类在不同领域、专业从事改造自然与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 软价值转化规律

软价值是指不可计算与不可估量的无形之物与无形的价值,即精神价值、潜价值等价值的总和。软价值有着自己特有的特点与规律。日本一位学者说,红宝石绿宝石可以标上价钱,孩子天真活泼的笑脸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的。友谊是一种软价值。我们发展对外关系,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这友谊比什么都珍贵。发展同各国的贸易往来与技术交流、经济合作,达到互惠互利,它可以增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实现了软价值向物质价值、宏观价值等的转化。《参考消息》转载了哥伦比亚的一篇文章的内容,题目是《名人口一开,美元滚滚来》。著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离开唐人街道10号,于1991年底对日本进行9天访问,作了9场报告和9次同日本商人的座谈会,收入近100万美元,相当于出任英国首相11年的收入。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日本之行也收入了50万美元,而美国5所大学邀请他作报告,报酬高达200万美元。海湾战争期间盟军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有一次一饭店集团邀请他去参加庆贺活动发表讲话,这位著名战略家开口要价:每讲15分钟要付17万美元。美国前总统里根发表一次讲话要价15万美元。这些就是“名人效应”的软价值转化,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转化,无形之物价更高。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会长吕东在上海搞调查研究时指出,要用好政策资源,用好了,可以开发巨大财富。政策就是软价值,用好

了,可以“点石成金”。广东、深圳不正是利用党中央给予的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利用政策资源,蓬勃发展起来的吗?现代企业管理的公共关系,就是一种软价值。发展企业间对外的公共关系,或进行技术合作与协作或加强市场需求信息交流,提供技术转让与技术情报、取长补短,这些是一个企业得以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企业文化,提倡企业员工真诚的团结协作,奋发进取精神,提高企业的凝聚力,这是一个企业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软价值。日本人认为“丰田”精神正是丰田企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企业的无价之宝。

软价值可以转化为硬价值,并有自己特有的转化规律。而软价值转化规律比其它的价值转化规律具有更高层次的复杂内涵。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在她的著名论文《价值追求》中说过一句结论性的话,“在竞争的环境中,企业家通过新科技赚钱,在完全限制的环境中企业家把所有时间和资源用以追求特权产生的价值”。这里所说的特权的价值就是知识专利的价值,它也是软价值。因为科技知识越公开,越为多数人掌握,所产生的社会福利越大,但知识一旦公开就失去价格。这与其它价值性质不同并具有特殊规律。这一规律对于适应市场机制制定科技政策促进价值转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这种转化规律的研究还很少。深入研究软价值转化规律,将使人类开发比硬价值资源更为丰富的软价值资源,发现更多的“无价之宝”,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全文完)

作者单位: 深圳市卫生局

责任编辑: 石 成

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本主义之超越

乐志强

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继承了“自然哲学体系”传统,主张历史规律象自然规律一样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是一种“自然主义”;①而“马克思的哲学具有人本主义的性质”,“可以称之为……实践的人本主义”;②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综合”。③这种观点,实际上把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化,并使之与恩格斯对立起来,我认为这是缺乏根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自1844年夏在巴黎会面并发现彼此“在一切理论领域中”意见完全一致后,就开始成为亲密无间的同志、战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者、阐发者和坚决捍卫者。他们毕生通力合作创立和使之不断完善的历史唯物主义同人本主义、自然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把二者混为一谈是没有理由的。

(一)

为什么有些学者会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或“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综合”?看来,这可能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点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不无关系。不过,这至少是一种误解。

首先,人本主义、自然主义所理解的人是一种抽象的“人”。费尔巴哈曾解释说:“‘人’这个名称的意义,一般只是指带有他的需要、感觉、心思的人,只是指作为个人的人”。④这正如马克思揭露的那样,这种个人完全是“撇开历史的进程”而“假定”出来的“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而他所说的“人的本质”或“人的本性”,则只是指饮食男女之类的“需要、感觉、心思”等等“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⑤而《形态》所强调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和出发点的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或“现实中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

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⑥在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看来,对“人的本质”或“人的本性”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生产劳动等实践活动和在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他们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还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由于社会关系是伴随着实践活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人的本质或本性也必然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对人和人的本质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我们必须知道,在《提纲》和《形态》时期确立的这些观点,不仅马克思在《资本论》等后来的著作一直坚持着,而且恩格斯直到晚年也始终不渝地捍卫着。例如在《费尔巴哈论》里,恩格斯就曾一再指出,虽然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⑨他还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克服这种人本主义、自然主义观点,用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而“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⑩众所周知,实际上这部著作是他和马克思第一部合著的哲学著作,所以他在晚年坚持的就是他们开始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再次,由以上考察也说明,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都强调要从人出发,但是由于“现实的人”和抽象的“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二者的出发点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相似,而实际上却是根本相反的。人本主义从抽象的“人”出发,只是纯自然主义地顾及作为生物个体的“人

自身”，完全忽略了那些制约着人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忽略了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正是强调制约着人的这些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反对自然主义地只局限于“人自身”。因此，人本主义只是一种把“人”当作一种僵死的概念，并从概念到概念地空谈的“人的哲学”；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真正研究现实的人生存、发展和解放的科学，就象恩格斯所说的，是一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⑩

(二)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时，试图“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⑪并在“自然”的基础上把二者统一起来。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⑫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所理解的自然界和他所理解的人一样抽象，因而自然界和人始终是空洞的、分离的、对立的，他不可能真正理解自然界和人的真实关系。

首先，在费尔巴哈那里，所谓“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就是以人为根本和依据，把上帝和天国世界说成是抽象的“人”及其本质的异化物，从而把他的哲学称为“人本主义”。这时，这个“人”既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自然界里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和现实的自然界毫无关系的；其次，所谓“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就是以自然物质为依据，把人和现实世界的一切都视为一种客观地存在着的自然物或“感性的客体”，从而把他的哲学称为“自然主义”。这时，这个“自然界”只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⑬是同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毫无关系的。因而，在费尔巴哈那里，人和自然界始终是统一不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的根本性突破，就在于把人理解为从事生产劳动、改造物质自然界的主体，而把自然界理解为人和人类实践不断改造着的物质客体，从而借助于生产实践这一中介把人和自然界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主客体关系。

很显然，由于不再从纯自然的视角，而是从历史地变化着的人类实践的视角去观察、理解和把握自然界，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实际上形成了三个“自然界”概念：一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⑭或外在于人类社会，“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⑮这是一个“自然发生”、“自我生成”、“自我演变”着的自然界，这个自然界和人只存在着共同的物质本原关系；二是作为“感性对象”已不同程度地被人类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认识到的、人类已“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⑯是人类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进行生产劳动必须不断探索的自然界。⑰这个自然界已和人类发生了在认知范围内的主客体关系；三是“人化的自然界”或“人类学的自然界”。⑱这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⑲“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⑳这个自然界不仅在认识与被认识的范围内，而且在改造与被改造的范围内，同人发生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当然，这三个自然界本来只是同一个自然界，但是由于它同人的内在本质关系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了。

费尔巴哈象以往的唯物主义者一样，由于不懂得实践的意义，因而不懂得把这三个不同的自然界区分开来和统一起来。这样，当他面对社会现实时，由于不能否认“人创造环境”这个事实，因而只好从人出发，以人为本，得出人本主义的结论。这个时候他忘记了社会历史，包括“人化的自然界”在内的一切与第一自然界共有的物质本原关系，从而把人、人的本质抽象化和神秘化，陷入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泥坑；而当他终究不能否认“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生物”时，又把人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纯粹自然现象，得出自然主义的结论，从而抹煞了人和人类社会与第一自然界的本质区别，再次陷入唯心主义泥坑。这样，虽然费尔巴哈力图按照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但是他的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又总是使他事与愿违地歪曲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使唯物主义半途而废。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正是清算了这种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科学地区分了这三个不同的自然界，并通过历史实践揭示了其辩证统一关系，才真正“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㉑把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贯彻到底，创立历史唯物

主义。

有些学者以《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论及先在的自然界而把恩格斯的哲学归结为“自然主义”，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恩格斯在这些著作里，不仅研究了先在的自然界，得出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②等一系列重要原理，而且也同时深入探讨了人和自然界的认知关系、实践关系。他的著名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劳动对现实世界和人本身的“创造”作用。他不仅没有陷入“自然主义”，而且严厉地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他一再强调，不仅“自然界作用于人”，而且“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造自然界”。^③他曾明确指出：“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变化”着，而这一切变化主要“都是由于人的活动”造成的，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④很清楚，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也象马克思晚年一样，始终全面地坚持他们在《形态》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

（三）

关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问题，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问题是这些规律由于消溶到解放了的诸个人的理性的行为中去而消失。恩格斯则自然主义地把人所创造的规律同不言而喻的仅能被人运用的物质的自然规律混为一谈。”^⑤这就是说，马克思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而恩格斯则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实际上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首先，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⑥“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⑦如果不是故意忽略恩格斯这一系列的论述，怎么能说他把历史规律同“自然规律混为一谈”？

当然，恩格斯同时又指出，虽然“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⑧历史事变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这许许多多意志的“一个总的合力”，“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

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⑨这就是说，历史规律象自然规律一样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过，这不仅恩格斯是这样看，而且马克思强调得更多。例如他在《资本论》这样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⑩在他看来，每个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都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当时有个经济学家叫做莫·布洛克先生，认为“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马克思摘引了他的一大段话后说，他的概述是“恰当”的。^⑪由此说明，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向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原则界限之一。

事实上，人本主义、自然主义根本不理解、也不会承认有什么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把它深刻揭示出来，从而形成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虽然，费尔巴哈也很不满意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提出了要建立“人类知识大厦”即与唯物主义基础相协调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但是他的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却使他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考察社会历史时，“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⑫但是，他在做完这一工作后就止步了。他不理解实践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规定，更不理解由实践活动造成世俗基础自我分裂、自我矛盾和自我运动的规律。这也是使费尔巴哈始终停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止步的地方，通过生产实践，揭示人和自然界、生产和交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等相互作用、矛盾运动的规律，才最终战胜历史唯心主义，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为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开辟新天地。因此，是否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是区分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界标，而正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的界标。

（四）

在历史决定论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

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的；而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始终跳不出形而上学、机械决定论的圈子，因而二者的思维方式是互不相容的。

马克思在《提纲》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时指出，这种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②④}相反，当这种哲学去观察社会环境、即各种社会制度时，它又只看到这些制度是由人制订的，这些“环境”是由人创造的，但是却忘记了这些“环境”对人的决定性意义。很清楚，这种思维方式是片面的、属于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用时髦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单向决定论”。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单向性，所以这类哲学家往往陷入“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恶性循环论和历史宿命论中去而不能自拔。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唯物辩证的决定论，用时髦的语言来说，这也可以称为“双向决定论”。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②⑤}一方面，人们“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另一方面，“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②⑥}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这种辩证决定的思维方式一旦确定下来，就全面贯彻到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并且一直坚持到底。例如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就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②⑦}恩格斯在晚年也反复强调，社会历史“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②⑧}他严厉地批判了那种只强调经济决定一切的所谓“经济唯物主义”，指出他们“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②⑨}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在人与世界、生产与交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等，总之在社会历史的一切领域、一切关系中，总是相互作用、辩证决定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③④}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总

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从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方面，也说明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或“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综合”是多么可笑，不管他把这种人本主义叫做“实践的”还是不做“实践的”。

（五）

不仅在一系列基本观点上，而且在基本方法论上，历史唯物主义同人本主义、自然主义也是根本相反的。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本方法论是这样的：他首先从主观上设想出一种理想化的“人的本质”，然后以这种“人的本质”为依据和标尺去衡量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一切。当他发现人们和他设定的“人的本质”不相符合，例如人们“为了上帝而牺牲爱”、^{③①}“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为无”、^{③②}或者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充满着爱、而是彼此仇恨和杀戮等等，他就认定“人的本质”丧失了、异化了。因此，为了使人获得解放，他就要批判宗教，打倒上帝和邪恶，呼唤人性，使人性和人的本质复归于人，建立“爱”的王国。按照这种方法论，人类历史实际上被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人的本质未异化时期、人的本质异化时期、消灭异化使人的本质复归于人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对这种人本主义方法论批判道：“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③③}也就是说，这种人本主义方法论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彻底清算人本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与之根本相反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他们从现实的个人和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必须具备物质生活条件、而要获得物质生活条件就必须进行生产劳动这个基本前提出发，深刻揭示了生产与交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等相互作用和一般运动规律，然后就依据这些历史规律深

关于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思考

刘景泉

黑格尔是把辩证逻辑系统化、理论化的奠基人，是提出与传统逻辑（形式逻辑）不同的辩证逻辑的开拓者。他的代表作是《逻辑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①遗憾的是，距今将近一个世纪，列宁的告诫并没有引起我们学术界某些同志的重视。有的洋洋几十万言的辩证逻辑教材，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或者根据第二、第三手材料进行不大确切的转述。所有这些说明，认真研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它的分析，概括、总结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大科学家的思维经验，无疑是一项重大而艰难的课题。^②

入分析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动力和过程，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合乎规律的演进过程，进而揭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然趋势。这样，他们也就把人类历史的分期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①②③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88年商务版第47、207页。

④ 刘纲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问题的重新考察》，《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⑤ 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9页。

⑥⑦⑧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7、249页。

（一）

众所周知，自从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系统的形式逻辑以来，它支配思想界长达二千年之久，几乎没有一个学者提出带有根本性的不同意见。黑格尔首次全面地、尖锐地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深入地分析了亚氏逻辑的贡献与缺陷，第一次提出“全盘改造”形式逻辑的任务。他明确地指出：“假如逻辑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没有经受过变化——如果查一查近代逻辑纲要，则变化事实上常常只是作些省略，——那么，从这里所应得的结论，不如说是逻辑更需要一番全盘改造，因为精神不断工作了两千年，必定已使它关于它的思维和关于它的纯粹本质，在它自身中，有了更高的意识。”^③黑格尔提出“全盘改造”形式逻辑的任务，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人心。直至今日，有的学者对此仍然很不理解，甚至提出非难。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稍作探讨，才可以正确理解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真正把握黑格尔辩证逻辑的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9、24、5、48、50、50、48、49、4、4、43、234、77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237、237、236、243、479、243、478、487、502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9、126—128、128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2、494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551、551、377—378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20—23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82、52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真谛。

黑格尔所以要提出“全盘改造”形式逻辑的任务，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大体上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传统逻辑是悟性（知性）逻辑，其基本原则是抽象的同一，“这种同一，就其坚持同一，脱离差别来说，只是形式的或知性的同一。”^④第二，传统逻辑只是从形式去考察思维，不管客观内容的真实性，“直到现在的逻辑概念，还是建立在通常意识所始终假定的知识内容与知识形式的分离或真理与确定性的分离之上的。”^⑤第三，传统逻辑孤立地考察思维，割断各种思维形式的内在联系，“辩证法却是一种内在的超越（immanente Hinausgehen），由于这种内在的超越过程，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性就表述出来了。”^⑥

黑格尔在批判传统逻辑的基础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建立了辩证逻辑的体系：提出了与形式逻辑基本规律不同的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分析了各种思维形式的内在关系并按照人的认识辩证过程对思维形式重新进行分类；建立了比形式逻辑思维方法更高层次的思维方法。总之，黑格尔不愧是辩证逻辑学说的奠基人和开山祖。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与传统逻辑不是枝节上的差别，而是带有根本性的不同。恩格斯指出：“**悟性和理性**。黑格尔所规定的这个区别——依据这个区别，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合理的。”^⑦

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传统逻辑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呢？黑格尔全盘否定亚里士多德逻辑呢？决不是。传统逻辑的思维规律和形式，对于保证人们思维的确定性、首尾一贯性，避免思维混乱和前后矛盾，都具有规范性的指导意义，人们的语言和行动是必须遵守的。问题在于不要把传统逻辑看成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逻辑，不要把它绝对化，认为它可以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和条件，既要看到它的科学性，又要看到它的局限性，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黑格尔本人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而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其优长与缺陷。他一方面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不朽的功绩，在于他认识了抽象的理智的活动——认识并且规定了我们的思维所采取的这些形式。”“这个逻辑学乃是一部给予它的创立人的深刻思想和抽象能力以最高荣誉的作品。”另一方面又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书里面所区别出来

的一般的思维的规定，“这不是思辨思维的逻辑，不是作为与理智有别的理性逻辑；理智的同一性，即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自相矛盾，是它的基础。”^⑧

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前者包含了后者，又高于后者，正如恩格斯所说：“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⑨那种把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量齐观、认为它们有各自的局限性的观点是不妥当的。

（二）

黑格尔对辩证逻辑的突出贡献和不朽的功绩，在于他系统地确立了与形式逻辑基本规律不同的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使逻辑学别开生面，耳目一新。

黑格尔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逻辑学》中，不客气但非常中肯地揭露了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实质和局限性。他指出“这个命题的正面说法 $A = A$ ，不过是**同语反复**的空话。因此说这条思维规律**没有内容**，引导不出什么东西，是对的。”“矛盾似乎并不象同一那样是本质的和内在的规定，这是自古以来的逻辑和普通的观念的根本成见之一。”^⑩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要害就在于排斥矛盾，主张抽象的同一。有些学者认为：从黑格尔关于辩证矛盾的具体论证看，辩证矛盾并不是矛盾律的矛盾，也不是矛盾律所要排斥的矛盾双方，然而对立统一律还必须遵守矛盾律（指在思维和语义中）。这种看法虽然表述得有些含糊，但给人一种印象：黑格尔批评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是不妥当的，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规律与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并没有什么不同，前者还要遵守后者。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形式逻辑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在提出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包含在这两条规律中）时，明确地、公然地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思想，认为“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为是亦可以为非是’，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置信的”，“同一事物不能同一时既是而又不是，或容许其他类似的相反两端。”“一切信条中最无可争议的就是‘相反叙述不能同时两都真实’”。^⑪难怪列宁曾这样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

《形而上学》中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黑格尔在批评亚里士多德的同时非常推崇和高度评价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我们看见说出了无限本身，或说出了无限的概念、本质：无限或绝对的存在是对立的统一——即一般对立的统一，纯粹对立的统一，有与无的统一。”“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⑫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不仅批评了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他在“存在论”中，提出质量互变规律，在“本质论”中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全书体系和“概念论”中，体现了否定的否定规律。这三条基本规律的核心和实质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矛盾与扬弃，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些作为**绝对的思维规律**而提出来的**命题**，更仔细地看来，便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相互扬弃**的。”“思维的理性则可以说是使差异物变钝了的区别锋利起来，使表象的简单多样性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区别**，达到**对立**。多样性的东西，只有相互被推到矛盾的尖端，才是活泼的生动的，才会在矛盾中获得否定性，而否定性则是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在脉搏。”⑬

有的学者认为黑格尔所说的矛盾、矛盾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不是逻辑学上的矛盾、矛盾规律，不是思维规律，而是存在规律，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我认为，黑格尔所说的矛盾规律既是存在的规律，又是思维、逻辑的规律，因为黑格尔是坚持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学者。虽然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基本点出发，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思维规律推出自然、社会的规律，这无疑是错误的。但他概括了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大量的材料，总结了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逻辑史的丰富的事实，从而概括出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这具有存在规律和思维规律的意义，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⑭恩格斯全面地分析了黑格尔提出的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的关系，恰当地分析了其中的合理性与错误，指出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末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也立刻就会变成简单而明白的了。”⑮

为什么说辩证思维的三条基本规律是正确和合理呢？第一，它克服了把同一与对立加以割裂的片面性，把同一与对立辩证地结合起来，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同一。这在科学史、思想史中得到充分证实。第二，它克服了把肯定与否定绝对对立起来的片面性，把肯定与否定辩证地结合起来，“我们甚至可以称肯定为否定，反之，也同样可以称否定为肯定。”⑯第三，它克服了把质与量分割开来的片面性，把质与量有机地统一起来，既把握质的规定性，又把握量的规定性。所有这些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在《资本论》中都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生动的应用。难怪列宁这样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⑰

（三）

黑格尔对逻辑学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突破了形式逻辑关于思维形式的规定、分类等等的局限性，把辩证法引进思维形式之中，揭示了各种思维形式的内在联系。

首先，它把矛盾引进思维形式之中，从而揭示了各种思维形式的内在本质。

在传统逻辑里，思维形式内部是不容许发生矛盾的，它只是概括了事物中的同一性，例如，某一概念就是把某类事物的共同点概括出来，某一判断就是对某类事物的共同属性、确定性加以断定，某一推论就是从某些已知的确定性的判断推出另一个确定性的判断。这种思维形式对于相对稳定的事物是正确的，也是非常有用的。但对于错综复杂的事物和发展过程，只看到其共同性、确定性一面就很不够了，还必须看到其矛盾性、变动性那一面，而这正是辩证逻辑的本质。

黑格尔说得好：“形式的思维为自己制定了一个确定的原则：矛盾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上，矛盾的思维乃是概念的本质要素。”^⑨与此相联系的，黑格尔认为判断就是揭示概念的内在矛盾，“判断是在概念本身中建立起来的概念的**规定性**”。“判断是概念通过自身的分离；因此这个统一是根据，判断从这根据出发来考察其真正的**客观性**。”^⑩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指出推论是概念与判断的矛盾统一，“**推论使自己成为在判断中的概念的恢复，从而是判断和概念两者的统一和真理。**”^⑪黑格尔运用矛盾分析法去揭示概念、判断、推论等思维形式的内在本质和内在联系，不能不说是完成了一项开拓性的工程。

其次，它根据人的认识辩证规律，对思维形式进行重新分类，从而揭示了思维形式的内在联系。

在传统逻辑中，通常是根据外部联系对思维形式进行分类，把概念分为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正概念和负概念、相对概念和绝对概念等；把判断分为非模态判断和模态判断，非模态判断又分为简单判断和复合判断，模态判断又分为必然判断和可能判断，等等；把推论分为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又分为性质判断推理、复合判断推理，等等。这些分类，总结了人类思维经验，是人类智慧的长期结晶，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黑格尔认为这些分类“支离抵牾”是不妥当的。但是，黑格尔揭露了这种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相分离，思维分类缺乏内在联系，却是独创之见。

黑格尔根据人们认识的辩证规律，对思维形式重新进行了分类，从而揭示了思维形式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例如，他把概念分为普遍的概念、特殊的概念和个别性三个环节。普遍的概念是指没有具体规定性的抽象的普遍性和不包含差别的抽象同一性；特殊的概念是指有规定性、差别性的概念；个别性是指具体概念，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概念，多样性统一的概念，内容丰富的概念，“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抽象地看来，也就相同于同、异和根据。”^⑫又如，他把判断分为实有判断、反思判断、必然判断和概念判断。实有判断是一种最初的、最简单的判断，是一种抽象的、感性的判断，这种判断也可以叫做质的判断；反思判断是关于主语的某种关系规定、某种关联的判断，比

实有判断提高了一步，必然判断是主语实在的规定性的判断，是关于内在本性的判断，这种判断比前两种判断又提高了一步；概念判断是符合概念本性的判断，黑格尔认为它是最高级的判断。关于推论的分类，黑格尔也有一套独特的分类法。他把推论分为实有推论、反思推论和必然推论。实有推论的项是单纯、抽象的规定性，是知性的推论；反思推论的各项映现着其他的规定性，是扬弃了抽象的、知性的推论；必然推论的中项不是别的直接内容，而是两端的规定性的自身反思，是一种揭示本质性、规律性的推论。^⑬

再次，它根据两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揭示了思维过程的螺旋式。

黑格尔在谈到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关系时指出：“普遍的东西，作为一般的否定性或按照**第一个直接的否定说**，就在自己里面具有作为特殊性那样的一般规定性；作为**第二次普遍的东西**，作为否定之否定，它就是**绝对的规定性**，或说**个别性及具体化**。”^⑭在谈到实有推论、反思推论和必然推论的关系时又指出：“反思推论才包含直接性**第一次否定**，现在第二次来了，从而外在的反思普遍性被规定为自在自为的普遍性。”^⑮总之，思维的过程是两次向对立面转化，完成一个周期的过程，是波浪式发展或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的深化过程。

有的学者认为黑格尔的思维形式分类、思维发展过程完全纳入三段式，是一种僵死的形式主义。我们认为这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毫无疑问，黑格尔对思维形式的分类的某些细节，确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但这是表面的框架，究其实质，他却揭示了思维过程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过程，即矛盾的统一、分裂和新的统一的过程，具有很高的科学性、真理性。恩格斯公正地指出：“不管这些东西在这里读起来怎样枯燥乏味，不管这种判断分类法有时初看起来是怎样任意作出的，但是，对于仔细研究过黑格尔《大逻辑》中的天才阐述……的人来说，这种分类法的内在真理性和内在必然性是明明白白的。这种分类法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以思维规律为根据，而且还以自然规律为根据”。^⑯

（四）

黑格尔对逻辑学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提出一系列的辩证思维的方法，给人以新的启迪。传统逻辑也提出了不少从已知到未知的方

法,如演绎法、归纳法等,这对于人们的思维和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它孤立地、静止地考察人们的思维,其思维方法就不可能避免它的局限性。

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是一种矛盾统一或辩证结合的方法,避免了孤立主义的弊病。

在逻辑史上,曾经出现过归纳万能论、演绎至上主义,曾经发生过把分析与综合绝对地分割开来的倾向。黑格尔与此不同,他总是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辩证地结合起来。他认为演绎推论与归纳推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演绎推论的“大前提就自身说,并不就是正确的,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直接的、成为前提的判断,它应该是结论的根据,而本身又已经以结论为前提。”“归纳在本质上毕竟还是一种主观的推论。”“归纳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成问题的(或然的)。”^②这就是说,演绎法不能保证它的前提的正确性,归纳法缺乏必然性。黑格尔同样剖视了分析法和综合法的优点和缺点,强调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认为他的绝对的、辩证的认识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③恩格斯事实上同意黑格尔上述的看法,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④

其次,它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浅至深的思维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避免了简单化的弊病。

黑格尔认为最初的范畴是最简单、最贫乏、最没有内容的范畴,愈是后来的范畴就愈丰富、愈具体。一门学科要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便要运用从抽象进展到具体的方法。“开端的规定性,是一般直接的和抽象的东西,它的这种片面性,由于前进而失去了;开端将成为有中介的东西,于是科学向前运动的路线,便因此而成了一个圆圈。”^⑤马克思一方面批评了“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⑥另一方面又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⑦

再次,它是一种思维内容与思维方法相结合

的方法,避免了脱离思维内容的形式主义的弊病。

黑格尔尖锐地批评了形式主义的思维方法,指出“形式主义固然也采取了三分法,并且保持了它的空洞公式”,“认识是从内容到内容向前转动的。”^⑧当然,黑格尔所说的内容是概念的内在规定性,是规定客观事物的本原,这是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必须批判和剔除的,但他要求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却是合理的内核,难怪列宁这样说:“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⑨

①⑦③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第357页,第80页。

② 参阅拙著《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1986年4月辽宁人民出版社)、《辩证逻辑概论》(1989年5月中山大学出版社)。

③⑤②⑨ 《逻辑学》上卷,商务1977年版,第33页,第24页,第56—57页。

④⑥⑩⑪⑫ 《小逻辑》商务1980年版,第247页,第176页,第256页,第33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页。

⑧ 《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75页,第366页,第378页。

⑨⑬⑮⑯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4页,第484页,第546页,第548页。

⑩⑬⑮⑯⑰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 《逻辑学》下卷,商务1981年版,第32页,第66页,第29页,第69页,第543页,第293页,第295页,第341页,第270页,第377页,第370页,第373页,第537页,第545页,第549页。

⑪ 《形而上学》商务1962年版,第62页,第216页,第78页。

⑫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01页,第295页。

⑬⑭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第103页。

⑯ 参阅拙著《辩证逻辑概论》第113—211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冯 生

从地窖到顶楼——法国心态史学探析

吕 一 民

70年代初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是由勒高夫等人为领衔人物的法国“新史学”(亦称年鉴学派第三代)。而纵观这一史学流派,或更确切地说这一史学创新运动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新史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显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心态史学的勃兴和成功。确实,作为近二十多年来法国史坛中的一门显学,心态史已与历史人类学一起成为当今法国式新史学的最重要的标记。对它如何进行全面的评析,本文试图作一尝试。

一、由社会史到心态史:法国史坛的一次集体运动

1968年5月风暴无疑是法国战后社会文化史中最重要的分水岭。正是在这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冲击下,年鉴学派第二代的大师布劳代尔被迫辞去《年鉴》杂志的主编,开始把权力移交给勒高夫等新一代,一场以“创新”与“开放”为特征的“新史学”运动由此在法国史坛逐渐地形成。“新史学”在继承布劳代尔的遗产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不仅重新恢复了年鉴学派创始人在偏重社会经济史研究时也不忽视对人们的精神状态的研究的传统,而且将法国史学研究的重心逐步地由以研究社会经济结构为主的社会史转向心态史。在杜比、芒德鲁、阿兰·柯林斯、勒高夫等心态史学的开拓者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新史学”的推动下,法国史坛出现了一次耐人寻味的由社会史到心态史的集体运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投身于心态史领域的研究,许多重要的杂志(包括较为保守的杂志)的栏目、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选题亦都在朝这个方向转变。更有甚者,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为主、且已声名赫赫的史学家,如现在在法兰西学院执掌教鞭的阿居隆、勒高夫也自觉地、或不由自主地加入了心态史学家的行列。特别是后者,当年曾扬言要固守地窖,但他在1975年问世的《1294—

1342年间奥克语地区的蒙塔尤村庄》却清楚不过地表明他终于也走出地窖,登上了顶楼。^①心态史学不仅在史学界博得赞美之辞,而且在普通读者和大众传播媒介中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心态史方面的许多著作销路甚佳,勒高夫、杜比等人也频频被请入电视演播厅,在著名的图书评论节目里向观众介绍其在心态史方面的新著。正如阿里埃斯所说,心态史已成为法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富有特征的现象。”^②与此同时,心态史学在国际史学界也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心态史学的勃兴和成功使一位法国心态史学大师骄傲地宣称,心态史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峰,是全世界史学的必由之路。

人们会问,法国史坛为何会有这样一场从社会史到心态史的集体运动,或者说为何会出现心态史学的勃兴。这一问题较为复杂,但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考虑。其一,心态史学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中人们的现实心态,较好地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寻根热”的需要。经过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步入了后工业社会,法国也不例外。后工业社会在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极大满足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各种弊端,使得不少人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西方文明。他们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下,在对现代——超现代的事物厌倦之余,不禁怀恋起过去的那种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寻根、怀古成了一种风尚。这当中,人们特别希望能了解过去人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观念和意识,以及这些观念和意识的演变。心态史的出现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心态史学的一些热门课题,如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对性爱的态度以及魔鬼的观念、时间的观念、家庭的观念为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历史参照系,使历史上的人们与现实中的人们有了一种沟通。其二,是因为年鉴学派第二代的社会经济史范型已无法适应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步入后工业社会之后,线

性史观已普遍受到了西方史学家们的怀疑和责难。现实社会的多元化也导致了史学家在史学认识论方面的变化,使史学解释机制的多元化成为大多数史学家的共识。不少史学家们逐渐地认识到把社会历史的研究只停留在物质生活、经济生活的层面上是不够的。对人的主观因素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关于史学的三个层次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把一般史学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传统的事件史,属于短时段。第二层次是经济的、或社会的历史,属于中、长时段,这是一种变化不太显著的“缓慢的历史层次”。第二层次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便步入了文化——心态这一第三层次。第三层次的历史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其变化较之第二层次还要慢,因而是对历史作长时段研究的最佳领域。随着这一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所接受,心态史自然也成为人们偏爱的对象。此外,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当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越来越多的社会史学家认识到,按照原有的路子再搞下去已很难有所突破,促使他们舍此求彼,转向心态史领域的研究。

二、萌生与勃兴:心态史学的嬗变

法国心态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萌生、初步发展和勃兴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心态”(mentalité)一词与心态史学的含义及涵盖面亦有所不同,人们不断地给“心态”添加新的内容,使心态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大。

法国心态史学的产生可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人追溯到19世纪后半期)。这一时期亦可称为法国心态史学的萌生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其创始人布洛赫和费弗尔从一开始就继承了13、14世纪法国一些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反对实证主义史学把史学研究限定在狭隘的政治史框框内的作法,力主研究历史的全貌。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们在偏重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对人们精神形态的研究。例如,布洛赫在其第一部重要著作《创造奇迹的国王们》(1924)中就大量地涉及到了民间信仰和社会心理问题。在他的综合性巨著《封建社会》(1939)中,布洛赫在对封建制度作全面研究时,亦对中世纪人们的精神形态进行了相当的研究。费弗尔此期在这方面主要写有两部著作,其一是《马丁·路德:一个命运》(1928),该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办法分析探

讨了当时德意志社会中到处存在的不满情绪,以及社会冲突与宗教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力图从集体心态的角度来阐释马丁·路德的个人心理、行为及宗教改革运动;其二是《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1942)。费弗尔在书中对16世纪是否有可能出现理性的无神论思想进行了探讨。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囿于从拉伯雷的书中去探究拉伯雷的思想,而是另辟蹊径,着力考察拉伯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习俗以及人们的心态结构。上述著作作为后来的法国心态史学提供了典范。

诚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在这时期并未明确地提出心态史学的口号,“心态”一词的涵盖面亦还比较小,往往等同于“集体心理”。但是,他们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将心态引入了史学家的领地,并且还从心态研究与整体史学的关系、心态研究与物质生活条件研究之间的联系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等方面入手为法国的心态史学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无疑也是心态史学的开创者。

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后期是法国心态史学的初步发展阶段。战后初期,费弗尔成为年鉴学派唯一的领头人物。此期的费弗尔已进一步认识到研究精神形态史的重要性,甚至计划撰写一部欧洲精神文明史。从1956年费弗尔逝世到几乎整个60年代,年鉴学派进入了以布劳代尔为中心的第二代时期。不少史学家纷纷仿效这位大师的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雄心勃勃地展开了“总体历史”、“长时段”的研究,并在社会经济史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年鉴学派创始人的某些传统被第二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遗忘。对此,阿兰埃斯曾指出:“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在年鉴学派的遗产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这些遗产,布洛赫和费弗尔当时研究领域中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即从想象、群体心理学和文化角度出发对社会所作的研究,在第二代中已黯然失色,这个属于心态的领域已留待少数探险者去继续开拓了。”^①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芒德鲁和杜比在费弗尔的直接影响下开始了对心态史领域新的开拓工作。他们在合写《法国文明史》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的过程中都认识到不能让社会的历史只停留在物质生活、经济生活的研究上,而应当把它们与心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一共识的基

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形成了有关心态史学概念的共同看法,并在50年代后期开始率先倡导心态史学。同时,他们还在法国的高等院校里开设了最早的心态史讨论班。1960年,芒德鲁在《年鉴》发表了《欧洲的巴洛克:悲怆的心态与社会革命》,此文堪称心态史学早期的力作。翌年,芒德鲁出版了《近代法国导论:论历史心理学》这部心态史学在此期的代表性著作。书中揭示了近代法国各社会群体的心态及其演变,在分析构成此期历史的非物质因素方面着墨甚多。在芒德鲁、杜比的不懈努力下,心态及心态史学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所接受,甚至连巴黎文献学院教授夏尔萨马朗这位颇具官方色彩的史学家在60年代前期为《七星文库》主编《史学及其方法》时,也特意约请杜比撰写《心态史》一章,这象征着心态史学已被整个法国史学界完全承认。60年代中后期起,勒高夫、阿里埃斯、佛维尔等人也分别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开始了对心态史学的探索。随着心态史学开始得到初步的发展,人们对“心态”一词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心态成了某一集体或群体的精神习俗、信仰和情感的总称。心态史学的研究领域也随之扩大。

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心态史学进入了勃兴阶段。法国史坛出现了由社会史到心态史的集体运动。在这一时期,芒德鲁在前期悉心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推出了心态史学的扛鼎之作《17世纪法国的法官与巫师》(1968)。在这部约600页的著作中,作者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在17世纪初,对巫术魔法的追究仍然是世俗法律机构的重要任务,法官们往往毫不犹豫地追究巫师。但到了17世纪末,各地的法院却大都放弃了这类对巫师的诉讼。芒德鲁从分析人们对魔鬼的观念的变化着手,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一种心态结构的解体。另一位“探险者”杜比也不甘示弱,在这一时期接连抛出了《战士与农民》(1973)、《大教堂的时代》(1976)、《三个等级与封建主义的想象》(1978)等心态史著作。特别是《战士与农民》更是也被人们誉为心态史学的典范之作,作者在研究征税或交换对当时的人具有什么意义时,使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章名“心态”,通过分析考察农民在中世纪时的心态来解释当时的赋税制度,令人耳目一新。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以勒高夫、阿里埃斯、佛维尔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出色的心态史学

家。勒高夫作为“新史学”的领衔人物,在心态史领域也身体力行,相继出版了《为研究另一个中世纪》(1977)、《“炼狱”观念的产生》(1981)、《中世纪的现象》(1986)等颇具影响的著作。特别是他在收入论文集《为研究另一个中世纪》中的力作《教会时间和商人的时间》中,从中世纪人们时间观念的变化入手,分析了贯穿于整个中世纪的人们的心态变化。这一研究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自称为“星期天历史学家”的阿里埃斯尽管多年来以业余研究为主,著述也不是很多,但他的几乎每一部著作都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史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他在心态史方面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有二,一是人们在避孕及其他与家庭、性生活有关的问题上的心态变化,一是人们在死亡问题上的心态变化。更值得称道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佛维尔在心态史研究中也硕果累累、独树一帜。他在非基督教化运动、大革命中的节目和英雄崇拜以及人面对死亡等方面的出色的研究,使他成为法国最杰出的心态史大师之一。在心态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法国的心态史学在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中都取得了不容低估的成功。然而,随着心态史学成为一种时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史学家径直投身于心态史研究之后,尤其是心态史学在80年代出现与历史人类学合流的趋势之后,人们对“心态”的理解更加宽泛,心态史学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杂货铺,其研究课题不仅无奇不有,而且越来越琐碎。这种状况使人们对心态史学的前景表示担忧。

三、作用与误区:对心态史学的初步评价

心态史学的勃兴给年鉴——新史学派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得以继续保持在法国史坛中的主导地位,并推动了整个法国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此,勒高夫也指出,心态史“对近年来的史学研究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④笔者管见,心态史学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第一,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更新了人们对史料的认识。年鉴学派第二代的史学范型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经济史范型。心态史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年鉴学派的欠缺之处,使精神形态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而大大拓展了史学

家的领地。这种拓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史学的领域扩展至旧有的界限之外，一切与人类精神形态有关的事物均可作为心态史学的研究对象，而一切资料（包括历来被史学家弃之不用的材料）都可以为心态史所用。二是重新发掘以前被人认为已彻底发掘过的旧有领域。为此，一些史学家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读某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使用过的文献资料，从中发现足以提出新的见解的依据。

第二，为跨学科研究，尤其是计量史学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场所。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多为一些对立因素（诸如无意识与有意识、个人与群体、长时段与瞬间、历史与现实）的交切点，这就使得心态史研究必须倚重于有关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如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考古学等等。同时，心态史本身又可以看作是跨学科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心态史学更是为计量史学方法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场所。计量史学能够把某一较长时期中超越个人经验的、连过去的行为者和见证人也无法知晓的演变形式揭示出来，可以减少证据的主观性和不可预见性，这些长处为心态史学的许多代表性成果提供了较为令人信服的基础。如孚雷在《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这部著作中勾勒了18世纪法国社会心态发展的趋势，其研究的基础就是作者与助手对这一时期的书名、书评、读者构成、术语概念的使用等可计量因素所进行的计量分析。又如佛维尔在《巴罗克的虔诚与非基督教化》一书中认为，在18世纪，特别是70年代左右，人们的宗教观念、社会准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重要依据就是他借助计量方法对普罗旺斯地区的两万份遗嘱以每十年为一阶段进行分析研究后所揭示的事实，即人们在遗嘱中提及天堂并要求死后举行弥撒的字句在日益减少，而涉及死后遗产安排事宜的词语却逐日增多。这一统计资料还使佛维尔得以从阶级、性别、地区、时间等方面对这种变化进行归类，从而大大深化了人们对非基督教化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法国计量史学正是在被引入“第三层次”之后，才再次释放出新的能量，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它的怀疑态度。

第三，为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闯出了一条新路，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年鉴学派经过其第二代的发扬光大，影响力日渐扩大，不仅稳稳地占据了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

同时在国际史学界也博得了盛誉。然而，这种影响力毕竟仍囿于史学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一味追求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而极大地忽略了史学著作的可读性问题。心态史学使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心态史学较好地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寻根热”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心态史学促成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社会经济转向文化——心态。一般而言，在一个物质生活较为丰裕的社会里，后一类题材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且心态史学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依靠这一优势上，仍非常注重在选材、文笔等方面花费苦功，保证了心态史著作能拥有一个令外国史学家艳羡的读者群。

第四，扩大、深化了社会史的研究。由于社会史、心态史的界定在史学界仍众说纷纭，使人们对两者的关系莫衷一是。但总的来看，尽管有人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但更多的人倾向于把心态史看作是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延伸。心态史研究不仅直接推动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使法国社会史研究扩大了领域，更重要的是心态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给社会史的全方位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社会史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可以说，法国史学家之所以仍能在国际性的新社会史研究潮流中居于领先地位，心态史学功不可没。

诚然，心态史学对法国当代史学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话，就会在看到心态史学种种长处的同时发现心态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和误区，其表现如下：

第一，片面强调心态的地位和作用。心态史学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人类精神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揭示了历来被史学家所忽略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也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纠正了社会经济史范型的偏颇。但是，这当中，为致不少的心态史学家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尽管他们也宣称要给心态史研究以坚实的基础，即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往往把心态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实体，一味拔高心态的地位，夸大心态的作用。因此，他们的研究尽管在许多方面能给人以启发，但其最后的结论往往很难让人信服。

第二，往往只热衷于研究心态的时代性（或某一历史时期的共同心态），而对心态因阶级性

明代预备仓述论

钟永宁

明代预备仓是政府锐意经营、规制较完整的仓储制度，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唯有明代设有此种仓制，它虽与明代以前各代和清朝的主要仓制常平仓的终极目的一致，但其具体运作却自成一体。80年代，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梁方仲先生曾写《明代预备仓》一文，^①着重对预备仓的仓储定额和亏空原因进行了阐述。自此以后，这一颇具特色的仓储制度就无专文论及。本文即欲在梁方仲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预备仓的建置、仓谷来源、仓储管理和兴废等进行考察，并试图从预备仓与社会经济间关系的角度，简要评

述这一仓储体制。

（一）建 置

明代预备仓初创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这年令户部尚书杨思义在全国各地颁行预备仓制，^②以后各朝屡屡申明此制，但各地建仓时间有先有后，相去甚远。现将嘉靖《广东通志》中记有预备仓建立时间的州县列表于下，从表中可以看到各地设仓先后不一，最早者在洪武二年（1369），最迟者在嘉靖十八年（1539）。

等因素引起的差异性注意不够。从大多数心态史学家的著作来看，他们特别偏爱于揭示某一历史时期人们的共同心态及其演变，并对这种共同心态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往往是滞后性的）给予相当高的估价。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另一方面，即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其阶级性等方面的因素必然表现出心态的阶级性差异。将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绝对化虽然不妥，但贬低甚至无视它同样也是不对的。在心态史研究中，只有把心态由时代性所产生出来的共同性与各种差异性综合起来考察，才可望得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应该说，法国的心态史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至今大多数心态史学家（佛维尔等少数人除外）在这方面做得还非常不够。相形之下，意大利史学家金兹贝格在《夜之战》、《乳酪与蛆虫》两部著作中，在揭示心

态的阶级性方面比法国心态史学家略胜一筹。

第三，整体综合性的研究愈益减少。“碎化”现象日见突出。这实际上也是法国“新史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心态史学发展的前期，大多数心态史学家由于在社会史方面训练有素，所以其研究课题大多是整体综合性的。但是，随着心态史学日益成为时髦并吸引了不少在社会史方面缺少功底的年轻史学家径直涉足心态史领域，尤其是80年代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逐渐合流之后，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越来越少。不少心态史学家一味地迎合普通读者的口味，满足于对饮食、服饰、举止、礼貌等问题的研究，其课题越来越显得琐碎。事实上，80年代的心态史学并没有能够解决总体史学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心态史学的研究显得愈益分散，缺乏内在的联系。

① 法国心态史学家佛维尔曾用“地窖”、“顶楼”分别形容经济结构与文化——心态，并把从社会史到心态史的转变称之为走出地窖，登上顶楼。

②③④ 参见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单位：杭州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 峰

明代广东省部分府州县预备仓设立时间表

府州县	设仓时间	府州县	设仓时间	府州县	设仓时间	府州县	设仓时间
新会县	正统十四年 (1449)	归善县	正统五年 (1440)	阳江县	成化七年 (1471)	琼山县	正统四年 (1439)
清远县	化成二十二年 (1486)	博罗县	正统五年 (1440)	高明县	成化十八年 (1482)	澄迈县	成化八年 (1472)
从化县	正德十一年 (1516)	海丰县	正统九年 (1444)	德庆府	成化七年 (1471)	临高县	成化八年 (1472)
曲江县	嘉靖十八年 (1539)	河源县	洪武二年 (1369)	泮水县	正统四年 (1439)	文昌县	1所正统六年 (1441)
乳源县	正德十一年 (1516)	龙川县	“成化中” (1463—1487)	封川县	成化五年 (1469)		1所成化六年 (1472)
英德县	正统五年 (1440)	长乐县	正德五年 (1510)	开建县	成化七年 (1471)	会同县	成化八年 (1472)
始兴县	正统六年 (1441)	兴宁县	景泰四年 (1453)	茂名县	成化元年 (1465)	乐会县	正德六年 (1511)
饶平县	嘉靖十六年 (1537)	石城县	永乐十四年 (1412)	信宜县	正统五年 (1440)	儋州	成化八年 (1472)
高要县	“成化年间” (1465—1487)	廉州府	嘉靖七年 (1528)	化州	永乐十四年 (1416)	昌化县	成化八年 (1472)
四会县	1所成化七年 (1471)	钦州府	洪武五年 (1372)	吴川县	永乐十四年 (1416)	万州	成化八年 (1472)
	1所嘉靖六年 (1527)	遂溪县	嘉靖十年 (1531)	陵水县	成化八年 (1472)	感恩县	成化八年 (1472)
新兴县	成化三年 (1467)	琼州府	成化三年 (1467)	崖州	成化八年 (1472)		

资料来源：嘉靖《广东通志》卷21，“民物志”8，“预备”。

预备仓初创时，朝廷要求在每县的东、南、西、北四方各建一个。但由于“仓廩悉在乡村，居民鲜少，难于守视。或为野火燃烧，或为山泽之气蒸溽浥烂。有司往往责民赔偿”，永乐年间，朝廷又令预备仓从四乡移至城内。^③

关于预备仓设置的行政范围，《明史·仓货志》只言州县设预备仓。其实除了州县外，地方的府一级行政机构，有预备仓的设置，这从前文所列表中即可得知。军队的卫所也设有预备仓。如在大同府的驻军中就建有大同前后二卫预备仓、大同左卫预备仓、大同右卫预备仓、阳和卫预备仓、天城卫预备仓、威远卫预备仓、平虏卫预备仓。^④甚至盐运司也设预备仓。如两浙盐运司就有“专储运司罚赎稻谷”以赈济亭户的预备仓。^⑤

（二）仓谷的来源和使用

预备仓的仓谷来源有官钞收采、富民捐纳、

犯罪罚赎、官田租半四途。明初，政府令地方库藏钞银中的“无碍官钱及引契鱼盐茶酒诸课税不复解部者”采粮储备。特殊情形下，户部官钞和关钞也用来采买预备仓米。洪武二十一年（1388），“上谓户部曰：‘曩者，山东岁歉民饥，盖素无蓄积，以备不虞故也。今岁山东夏麦甚丰，秋稼亦茂。户部可运钞二百万贯往各州县预备粮储’”。^⑥又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遣老人往福建诸郡县收采备荒粮储，凡钞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五十五贯”。^⑦永乐元年（1403）杨溥上奏要求整顿预备仓，令各地多积仓谷，亦提到用官钞买谷：“乞令户部行各布政司、府、州、县，除近被灾伤去处外，凡秋成丰稔之处，令府州县官于现有官钞官物，照依时价两平文采谷粟，储以备荒。”^⑧

正统后仓谷的主要来源为富民捐纳，朝廷正式颁行捐谷的奖励条规，而见诸文献的捐纳事例大都是正统以后。如金华府的义乌县预备仓，“正统五年（1440）增置一处，六年知县刘同劝富民出谷以实之”。^⑨章懋《兰谿县新迁预备仓记》亦云：“宣〔德〕正〔统〕以来，岁或不顺，而生灵嗷嗷无所仰给，朝廷始用大臣之议，令天下郡县

劝募富人入粟于官，以为备荒，其输粟至千石者赐以玺，其旌为义民。时无锡薛侯理常乃作大仓于县城之南数里，仓岭之下，储谷以数万计。”^⑩

明代罪犯赎罪，或纳银两钱钞，或直接交纳赎谷。赎罚银两，在明代主要是用来购买预备仓粮。令囚犯赎谷入预备仓，始于正统年间，此后的弘治、正德、嘉靖等朝，频频下令不许赎罚银两、纸割，作别项花销，需储谷备赈。如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议准：“在外司府州县问刑，应该赎罪等项，赎罚等物，尽行折纳，采买稻谷上仓，以备赈济。并不许折收银两及指称别项花销。”^⑪正统间杭州府预备仓谷除了劝富民捐献外，“又犯罪自笞以上非流徙及论死者，并叫纳赎赈告以备赈济”。^⑫

官田租米亦是明代预备仓的一个谷米来源。嘉靖中广东香山县预备仓谷即来自官田租谷：

“嘉靖二十五年（1546）知县邓迁勘量三灶余田归官者，岁收其谷入仓备赈，……共该田十五顷四十一亩三分三厘，今惟裁节豪强销患海岛备，将勘量出前项余田，一归诸官，照依别省公田追纳官租事例尽数归官。……逐年每亩追纳官租八斗，内将一斗照依轻赈折色每米一石纳银三钱事例，解赴本布政司收库以备军饷，余谷七斗各赴县预备仓上纳。逐年该租谷一千零七十八石九斗三升一谷，以备赈济凶年之用。”^⑬

预备仓储谷是用来救济灾年饥民，分赈济和借贷两种使用方式。预备仓兴举之初，旨在备谷无偿赈济。正统时规定“凡振饥米一石，俟有年，纳稻谷二石五斗还官”。^⑭则已是息借贷。正統六年（1441）于谦总督河南、山西时曾奏道：“今河南、山西积谷各数百万，请以每岁三月，令府州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得到了朝廷的允准。于谦还曾用仓谷赈济山东、陕西灾民：“时山东、陕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余万，谦发河南、怀庆二府秋粟以振。”^⑮因而是赈济与借贷兼而行之。历代常平仓主要是通过采买仓谷，调节米价，间接救荒，而预备仓则通过赈、贷直接救荒，因而从仓谷的使用方式来看，预备仓与常平仓有别，而近似于社仓和义仓。

（三）仓储管理

据《明史·食货志》，“外仓则布政、按察、都司关防之”。“外仓”即指京都以外之仓，作为非京

仓的预备仓，则应由地方最高衙门主管。但正德以前，预备仓的直接管理者是乡村里社的绅衿大户，府州县官名义上则需巡查监察。洪武年间规定于每县四境设仓，“在近仓之处，金点大户看守”。^⑯永乐年间，令预备仓由四乡移至城内，仍由“内府老人及丁粮有力之家守视”。^⑰明初，政府在乡村基层社会推行严密的里甲组织，里长、“老人”多为一方殷实富户，负责征派赋役、“教化”乡民，亦管理预备仓这样的地方民政。朝廷赋予了他们以很大的权力，是农村社会的直接控制者，因而有“土官”之称。对预备仓，官府如不督察其直接管理者的里长、“老人”等，它就易于滋生出种种弊端。事实正是如此。成化三年（1467）商辂奏道：“访得各处提调正官，不行亲阅，展转委付，致使看仓大户人等多生奸弊。放支之际，或插和糠秕沙土等项，每米谷一石，止得五斗六斗者有之；及还官之时，或刁蹬留难，多收斛面，或高估价值，折收银物，名虽无息，其实加倍。”^⑱杨溥曾说南方仓储的亏空，“皆乡之土豪大户侵盗私用，却妄捏作死绝及逃亡人户借用，虚立簿籍，欺瞒官府”。^⑲因而频频有官员奏请朝廷命令地方官能对预备仓“躬行勘察”、“亲行提调”。

至正德年间，朝廷下令改由州县正官来管理预备仓。《明史·食货志》云：“初，预备仓皆设仓官，至是革，令州县官及管粮仓官领其事。”此事在正德五年（1510）。引文中的前一个“仓官”即为“土官”，《大明会典》有言：“司、府、州、县、卫所预备仓添设土官，尽行革退。”^⑳

明朝政府为促使地方官加强预备仓的储备和管理，把预备仓的仓储数额纳入考绩的范围内。《国朝典汇》载云：“府州县官考满吏部者，并须开报预备官仓所储实数及修筑过陂塘堤岸等项，吏部行该部查考虚实，以凭黜陟。”^㉑储谷不足者，或罚俸，或降用，或不得升转，乃至问罪。弘治三年（1490）规定：“限州县十里以下积万五千石，二十里积二万石，卫千户所万五千石，百户所三百石。考满之日，稽其多寡，以为殿最。不及三分者夺俸，六分以上降调。”^㉒罚俸又具体规定为：“少三分者，罚俸半年，少五分者，罚俸一年……军卫不及三分之数者，一体住俸。”^㉓嘉靖三年（1524）又下诏令：“各处抚按官督各该司库散官州县官，于岁收之时，多方处置预备仓粮，……每季具数开报，抚按衙门以积粮多少为考绩殿

最。如各官任内三年、六年全无蓄积者，考满到京，户部参送法司问罪。”^②

由于仓谷定额过高，各地预备仓难于达到相应的数额，而依据定额来颁行的对官员的考绩、奖惩制度，就如空中楼阁。官员上下之间往往敷衍应付，视为具文。史籍中很少看到地方官吏因仓储不足额而罚俸、贬官或问罪者。相反，高悬的定额却易生弊端。嘉靖时的潘潢即说道：“但如每一小县十里之地，三年之间，不问贫富丰凶，即令积谷万五千石，限数既多，责效太速，以至中才剥削取盈，贪夫因循为利，往往岁未及饥，民已坐弊，及遇凶荒，公私俱竭，为困愈甚。”^③刘麟《积谷预备仓粮以赈民疏》转述武昌县知县王纪减额的奏言称：“本县秋粮原额，每年该二千八百余石，三年共七千余石，小民输纳不前，甚至卖产鬻子，若限三年之内，积谷有三万余石，揆之事势，实难举行，乞要宽减。”刘麟疏中又指出：“今议定积谷之数，虽江南膏腴之地，岁岁丰登，犹或难完，况江北以来，地利不同，若不分别等第，一概取盈，窃恐徒为张急，难收后效。”^④朝廷迫于各地预备仓谷无法达到定额，也只能减少定额和从条款上减轻对官吏的处罚。“隆庆时剧郡无过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数益减，科罚亦益轻。万历中，上州郡至三千石而止，而小邑或仅百石，有司沿为具文，屡下诏申饬，率以虚数欺罔而已。”^⑤可见预备仓也并不会因为由“正官”来管理而健康有序地运作。

（四）兴 废

预备仓是国家的社会福利性制度，在旧地方志中，常归于“惠政”、“恤录”、“储恤”中记述，政府设置的动因，在于维系社会的稳定。它的兴废，从主体上来说，与统治者的安危意识的强弱和吏治的好坏息息相关。明朝建国之初，由于长期的战争，田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各级官僚从改朝换代的战争中又深深感受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而能励精图治，重视备荒救恤之政，“天下州县多所储积”，“官借其数，敛散皆有定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统治集团的安危意识日益淡薄，官府也就不大关注预备仓这项“善政”，疏于对仓储的巡查及里甲老人的约束。洪武后期，“官仓储谷，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无存”，^⑥宣德后，史乘中就更充斥了

“仓廩废弛”、“侵盗挪移”等记录。正统四年（1437）大学士杨士奇奏说预备仓，“岁久弊滋，豪猾侵渔，谷尽仓毁”。^⑦次年，英宗从其言，派遣京官赴各地整治预备仓储，更重要的是推出了奖劝乡村富民捐谷的措施。正统五年（1440）定：“凡民人纳谷一千五百石者，勅奖为义民，免本户杂役二年。”^⑧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又奏准：“令天下州县义民出谷以备凶年赈济，出谷一千石者，勅旌其门，仍免徭役三年，其次随多寡立碑旌异”，^⑨奖劝的谷额较前一年降低了。纳谷者除了勅奖为“义民”、免役外，还可使其免于科举考试，直接充吏。正统九年（1444），“令直隶保定等府州县两考役落吏典，纳米一百石，起送吏部，免其办事考试，就拨京考。二百五十石，免其京考，冠带办事。一百七十石，就于本府拨补，三考满日，送部免考，冠带办事，俱挨次选用。其一考三个月以里无缺者，纳米八十石，许于在外历练两考。”^⑩成化年间，把纳谷充吏的政策推行到全国，并且可以捐得散官。《大明会典》载道：“成化元年（1465）奏准预备救荒，凡一应所考吏典，纳谷五十石，免其考试，给与冠带办事，在外两考，起送到部未拨办事吏典。纳米一百石，在京各衙门见办事吏典，一年以下；纳米八十石，二年以下；纳米六十石，三年以下；纳米五十石，免其考试，就便实拨，当该满日，俱冠带办事，各照资格，挨次选用。又令在外军民子弟原充吏者，纳米六十石，定拨原去衙门，遇缺收参。”成化年间还下令凤阳、淮安、扬州三府，纳米预备仓二百石，给予正九品散官；二百五十石，正八品；三百石，正九品。^⑪

国家用荣誉地位和权利来刺激那些不能通过科举和庇荫之途进入仕途的乡村富民捐纳粮食，契合了广大乡村富民的心理。被官府旌奖为“义民”，在乡村里社和宗族中，其地位和威望就会提高，享有各种特权，若通过纳谷进入仕途，更能光宗耀祖，深孚族望，因而乡村富民对官府的奖劝捐纳预备仓谷，反应是积极的。在福建的建阳县，由于政府规定捐谷一千石可以旌表其门和免役三年，即有“县坊徐德润、黄应童与下里丁普皆出谷一千石上仓，俱获旌表，时以为荣”。^⑫据于谦所奏，正统年间河南、山东积谷各数百万石。^⑬常德府成化年间预备仓达8所，储谷118750石，米2830石。^⑭广东在正统、成化年间建仓较多，据前文所列表，有31个府州县在正统、成化

日本的维新志士的确从中国革新派思想中吸取了营养,然而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明治维新的结果则又导致日本对中国观念的转变。福泽谕吉在其著名的“脱亚论”中公开声言:日本在政治与文化上将与中国分离,从而摒弃了长期以来把中国作为发展模式的历史。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这个东方岛国,在不到30年内就称雄东亚。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震撼了中华大地,使一向以王土自封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再也无法妄自尊大了。过去的学生变成了今天的老师,中国的赴日留学生代替了以往古代日本赴中国的“遣唐留学生”。从而掀开了中国学习日本教育的历史。尽管这种学习始终伴随着侵略与战争的阴影,但是近代日本教育改革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的影响是积极而又意义深远的。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魏源、林则徐等人首先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喊出了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了以“求富求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可以说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把学习的目标指向了西方。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在中国学习西方步履艰难,事事处处都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和掣肘,以至于洋务派官员不能不对日本学习西方的顺利进展投以羡慕的眼光,并以日本为范例替自己的主张做辩护。

1867年,奕诉奏拟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时说:“若以师法西人为耻者,此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者。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84页。)这里奕诉以日本为例,论证师法西人是明智之举。从两方面肯定了日本的教育改革,其一是敢于学习西方发愤为雄的精神;其二是派遣留学生学习数学、制造的实践。此时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未取得成功,奕诉就预见到日本如此学习西方,“不数年后亦必有成”,对日本大胆变革表示赞赏。

1877年,李鸿章、沈葆楨等,在《奏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奏请清廷准允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赴英国学习水师操练时,也以日本为借鉴。折中写道:“闻日本近时已有七人在英兵船学习。臣在烟台阅视洋操,即见有日本武弁在英国铁甲船随同操演。”言谈中除对日本学习西方表示赞赏引为共识外,也隐含着对日本抢先一步的忧虑。这种忧虑始终潜藏在李鸿章的头脑中。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十日,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曾经谈到:“该国(指日本)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哄,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方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这份奏折同样反映出李鸿章极为复杂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从局部出发,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学习西方、派遣留学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从整体出发,对改革传统旧制持否定态度,更对日本强盛后威胁中国感到忧虑。无论是赞赏也好,忧虑也好,都证实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正在崛起,超越中国,由以往的学生地位转换为老师的地位。

恰恰是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能否改变,对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认识深度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近代中日两国在教育近代化上的差距。在应不应该改革旧制,敢不敢于与传统观念决裂的问题上,中国的洋务派与日本的洋学派的选择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某种对立。正如李鸿章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改变旧制,变衣冠易正朔”的确遭到过国内的反对,但是日本的洋学家们却执着地坚持直接输入西方教育,移植近代文明,不管其基础多么薄弱。这一点,从福泽谕吉发表的《要晓得汉字已经失效》一文中,就可窥见一斑。此文驳斥了当时日本国内有人认为,“各地少年轻浮、躁进、妄谈时事”是“学习洋学之过”的观点。福泽谕吉说:“从古至今千百年来,我国的文明有神、儒、佛教的功德,不能抹杀这一点,相反还应大加赞赏。但不能否认他们对近代的文明进步没起什么作用,其软弱无力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今天如被暂时的社会风潮所吓倒,企图借助和学汉学做为退守之策,应该说这是脱离实际的想法。”(王桂主译:《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中译本,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页。)“尤其是将孔孟之教定为基础,来制止今日的人心波动,束缚人的思想,以便经营文明昌盛的社会事业,这不仅是脱离实际的迂腐,依我来看,简直就是极端的迂腐,极端的轻浮行为。”同时他指出:“少年的浮躁不是学洋学之过,相反是不知洋学之罪。”为此他大声疾呼“要提高洋学的地位”。极力提倡“在全国鼓励后来的学者学习洋学,直接根据欧文原著介绍文明思想,以便达到深远的佳境,取得实际的效果”。无论我们在感情上多么难以接受,近代日本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如此否定,而对西方近代文明却倍加推崇,事实上日本教育正是在这种痛苦经历中,不断融合东西文化,走向近代化,反而成为中国教育仿效的模式。

日本教育经过西洋化的洗礼,并重新构建了日本化的教育体制。清政府在不肯于放弃中国封建传统的情况下,却肯于模仿和学习日本的近代教育,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获得的文化与文明成果是不可能轻易消除的。尽管日本近代教育积极地、大量地吸收西方欧美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但是日本的民族特点,以及隐藏于这些特点中的中国儒家教育的因子,却仍然在它的各个层次上发展着,成为日本近代教育发展的一个特点。清廷官员认同的正是这一点。又有谁能否认,直至今今天《论语》一书在日本仍然很畅销呢?这反映着中国教育与日本教育之间的天然联系,也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首先以日本近代教育为模式的内在契机。

近代中日教育关系主从地位的转换,伴随着战争的阴影,交织着观念冲突的痛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不断变化,极其微妙复杂的局面。中国对日本近代教育的肯定,建立在近代日本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否定基础之上,中国对日本教育改革的赞赏,以承受日本轻视中国传统教育迂腐的痛苦代价为前提。尽管如此,历史的格局一旦形成,就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日本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探索。

二

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的不幸命运也波及到日本。当时“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以助立约之事”的中国人罗森,是近代史上记载日本实地见闻的第一位中国人。据罗森所见,当时的日本与中国一样对于门户开放毫无思想准备,对美国人拿来的火车模型、电话机、照象机等,惊诧为奇

术。而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仍推崇倍至。罗森在日记中记载:“日本人民自葡萄牙滋事,立法拒之,至今二百余年,未曾得见外方人面,故多酷爱中国文字诗词。予或到公馆,每每多人请予录扇。一月之间,从事所请,不下五百余柄”(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予问其国取士之方,称说文、武、艺、身、言皆取,而诗不以举官。所读者亦以孔孟之书,而诸子百家亦复不少。”(同前,第37页)罗森在日本所见有限,而且记载的篇幅不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明治维新前日本教育仍处于效仿中国教育模式阶段。不过,20年之后,当1876年,清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日使团官员踏上日本国土时,日本的教育却脱胎换骨了。中国第一位驻日大使何如璋在《使东述略》中记载:“其(指日本)学校:都内所设,曰师范、曰开成、曰理法、曰测算、曰海军、曰陆军、曰矿山、曰技艺、曰农、曰商、曰光、曰化、曰各国语、曰女师范,分门别类,节目繁多。全国大学区七,中小学区以万数,学生百数十万人。”日本“近趋欧俗,上自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而遗老逸民,不得志之士,尚有敦故习,谈汉学。以旧俗自守者,足怜已”。这批官员们所看到的是日本教育已经基本上西化,而中国传统教育在日本已经失落了。

为了使中国人对日本有全面细致的了解,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从1879年开始撰写的《日本国志》(1890年正式出版),和1893年访日的黄庆澄所记述的《东游日记》,都较为详细的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学制。《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描述:日本于明治四年(1871年),设立文部省,明治五年(1872年)颁布学制,在各大学区分设各级各类学校。其中小学、中学为普通教育,专门学校为“研究学术,以期专精”,大学规模近欧美大学。学校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书还详细介绍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目的及课程设置。《东游日记》记载日本“全国学校共有27800余所,教员74700余人,学生3219700余人。”(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页。)日本近代学制系统的建立,是日本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它的意义在于顺应了教育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历史进步趋势。学制的颁行,使日本教育迅速走向普及。使中国人认识到建立

学制的必要。

日本学制建立后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也引起中国官员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对女子教育、师范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感触更深。

黄遵宪、黄庆澄笔下的日本女子教育,的确使沉迷于封建传统观念中的中国各界人士大开眼界。当时日本的师范学校、盲哑学校、游画学校,学生均已男女同校。此外还专门建立了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女学校。据明治十年(1878年)统计,日本全国有1866名女教师,575112名女学生。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记述,日本女学的首倡者是黑田清隆。他从美国回到日本时,力陈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得到明治政府的赞同,并选送5名女生到美国留学。又在东京设立女子师范学校。其后各地纷纷仿效,女学校越来越多了。明治五年(1873年)日本建立了高等女子学校。设在上京第二十一组驹之町。分为普通学科,缝纫科等。主要课程有:汉文、国语、英语、伦理、地理、数学、史学、理学、家事、图画、音乐、体操。可见日本女子教育的建立与发展十分顺利。

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中记载:“明治九年(1877年),国后出藏金,命择士族、华族女百人,延师教之,曰女子师范学校。亦三年得为女师。开餐之日,卒業之时,国后亲临,鸾铃载道。校中勤慧者,时赐书,时赐衣。”19世纪末叶,日本国后亲自出钱办女学,实在是鼓舞人心之举。当然这决不仅是国后个人的开明之举。而源于整个日本统治阶层赞同西洋化的立场。

明治三年十月(1871年10月),天皇对全体华族发表的敕谕中说:“我国的女学制度尚未确立,众多妇女尚不通事理,因此男性去海外时可尽量偕女性同往。足可使她们通晓外国女子教育的情况,了解育儿之方法”。天皇对向西方学习,提高妇女文化水平予以充分重视。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20世纪初清政府的学务大臣们竟然仍在《学务纲要》中大言不惭地宣称:“惟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女子师范学校。”(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02页。)这种轻视女子教育的态度,导致近代中国第一个学制中无女子教育的立足之地。然而任何人也阻挡不住历史潮流。女子教育的博兴是世界进步的大势所趋。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中国民间人士就不断建立女学,

1897年经元善在上海筹办经正女学。同年梁启超发表《论女学》一文,而后又作《倡设女学堂启》……人们不会忘记,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兴起所产生的启蒙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女学对近代中国女学产生的早期影响。

日本从明治维新伊始就重视师范教育,目的是推行学制和普及小学教育。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论述了日本师范教育产生的原因。他说:“师范教育所养成教员以期广益者也。(自改习西学,苦于无师,旧日师长,唯习汉经史,故文部省议以养成教师为急务。美国有师范学校,所以教为人师者,特仿其学制,并聘请其国人开师范学校,凡小学教育皆于是撰取焉)。”访日中国官员参观了许多所日本的师范学校,其特点是所有师范学校都设有附属小学。如:上区二十组两御灵町的一所寻常师范学校,在校男女生共23名,附小学校学生281名。日本师范学校的主要课程有:各国文字、国史、外事、算学、化学、光热、制造、乐画等。有各种书籍和器具供学生使用,如化学、物理器具,几何教具等。学校还设有应接所,会议所,养病所,沐浴所等等设施。足见日本当时师范学校已经比较完备了。

近代日本的师范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且不说20世纪初派往中国的大批日本教习所发挥的作用,就中国赴日本的留学生而言,许多留学生都就读于日本的师范学校,或速成师范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主要的师资来源之一。

对于军事教育,的确,日本的军事学校,对于鸦片战争后连连战败,割地又赔款的中国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成为20世纪初中国赴日留学生投考的热门。引起中国访日官员的重视就更为自然了。中国在洋务运动中,由于抵御外侮的需要,最早创办的学堂就有军事学堂。访日官员在日本参观了许多海陆军学校,认为日本的军事学校,在军事理论课中重视图文书并茂,训练课中注重身体力行,同时敌情教育很强,“无事之时,若临大敌。”从兵种教育上讲,日本的陆军多学习法国和德国,海军学校则以英国为样板。日本军事学校始建于1868年7月,发展极为迅速。1872年时学校已设有鱼性水雷房,细测机电等学生训练处了。

此外,中国官员也注意到日本的实业教育,当时他们参观过的实业学校有商学校、工学校。

农学校、工部大学校等。对于日本振兴实业教育，中国官员颇多感触：“西人以器用之巧，艺术之精，资以务财，训农，资以通商惠工，资以练兵，遂得纵横倔强于四海之中，天下势所不能敌者，往往理反为之屈，我不能与之争雄，彼挟其所长，日以欺侮我，凌逼我，终不能的簪笔雍容坐而论道之日，则思所以捍卫吾道者，不得藉资于彼法。”（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第809页）通过对日本发展实业教育的理解，中国官员认识到实业教育是国家富强的基础。

森有礼在就任文部大臣后发表过这样的演讲：“可以断言，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尚低，国力尚弱，外交经验也尚缺乏。那么应该如何打开局面呢？为此，只有切实改革教育，培养人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所说的人才当然不能只空谈事物之道理或只重视品德，而不充实社会知识；也不能只言读书，写文章，而毫无实际能力。因为当今与外国竞争，这样愚蠢之辈已不能满足国家之急需”。（转引自：永井道雄：《近代化与教育》）1881年开办的日本东京职业学校和日本东京商法讲习所是日本实业教育的先驱。然而正如当时专门学务局局长浜尾新所说的那样：“在我国不是先有工厂，后办工业学校，而是先办起工业学校，培养出毕业生，才计划办工厂”。（同前，第98页）振兴实业教育，兴办工商学校，是日本政府根据工业立国的政策预测未来所采取的果敢行动。这反映出近代化起步晚的东方农业国，移植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特点，因此黄遵宪说：“日本蕞尔国耳，年来发愤自强，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乎有富强之势。则即谓格致之学非我所固有，尚当降心以相从。”（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第809页。）日本实业学校的建立，从时间上晚于中国，（中国福州船政学堂创办于1866年。）但其发展速度却比中国快，后来者居上，成为中国实业教育效仿的榜样。

三

近代日本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使日本教育成为中国教育仿效的模式。其改革主要是放弃中国儒教的传统模式，转而学习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其发展主要体现在教育近代化上。的确日本教育近代化是以西洋为模式，但绝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日本教育近代化的过程，就是西洋化的过程，因为日本教育近代化事实上经历了从西洋化到日本化的发展道路。一直在探索日本教育如何

走向成功的中国人，究竟怎么理解明治维新后一直处于急剧变化不断发展中的日本教育呢？他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中西学术在近代日本的命运。

中西学术在近代日本的命运如何，几乎是所有到日本的官员共同关注的问题。当然研究的侧重点却因人而异。黄遵宪研究汉学在日本的兴衰以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黄庆澄重视中西学术的比较以及中西学术的不同源流。王韬探讨学习西学的态度与方式。傅云龙关注日本汉学家对西学的抵制，对汉学的眷恋与追求。然而殊途同归，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西学在近代日本盛行，但却不能完全取代儒学。中国应该通过学习西学来发展儒学。一句话没有人抛弃儒学，也没有人拒绝西学。这就是中国官员们从日本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得到的重要启示。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融合，恰恰是中国教育近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一个民族的传统，决不是谁想抛弃就抛弃的了的。传统扎根于不可能进行历史交换的事实之中。日本的成功正在于他们积极地解决不同文化的融合问题。在这方面企图了解日本的中国官员的见地又如何呢？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曾影响了中日甲午战争起至辛亥革命时期止的一代人。时至今日，这部著作仍不失为研究中日文化教育交流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日本国志》研究了汉学在近代日本的兴衰，分析了汉学失落、西学兴盛的原因。他倡言学习西学来恢复汉学的本质，采取“西学东源说”，并考证西学即墨翟之法，从而使自己推崇西学的观点能够被朝廷名正言顺地接纳。“学校甚盛，唯专以西学教人。余考泰西之学墨翟之学也。”“古以儒、墨并称，或称孔、墨、孟子且言天下之言归于墨，其纵横可知，后传于泰西，泰西之贤者衍绪余，今遂盛行其道矣。凡彼之清微，皆不能出吾书。第我引其瑞，彼况其委，正可师其长技。”（同前，第643—644）无论黄遵宪的“西学东源说”多么荒唐，他至少承认西学的长技值得中国学习的基本事实。或者说他在为提倡西学寻找根据。

王韬在《扶桑游记》中，谈到向西方学习应采取的态度。他认为“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指出：“法苟择其善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王韬是光绪五年（1879年）访问日本的，日本正处于学习西学的高潮中，王韬对日本学习西

方的方式提出了批评。“余谓仿效西法，至今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毛病在行之太骤，摹之太似也。”他赞扬在学西学的潮流中，仍推崇孔孟之道的学者是最有见地的，“冈本近日又著《要言类纂》，就古今言理诸书，综其要而隐括之，皆孔孟遗意。彼以为是说也，遍天下可行也；于泰西学士之言，则独摈之，是亦具特识者”。提倡学习西学，但仍崇尚汉学。这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开明知识分子的共性。中国官员体察到日本在西化过程中，没有完全抛弃汉学的现象，特别是政教合一，社会本位等儒教传统，在改革后的日本教育中仍占主导地位。但他们没有深入探究日本进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是怎样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东方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彼此融汇的结合机制是什么？

黄庆澄善于比较中西学术的异同，认为中西学术源流不同。通过对日本国民性的了解，他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日本民族学习西学的有利因素，中国学习西学的不利因素及其对策。

明治二十五年（1893年），黄庆澄在日本访问了锦城学校校长平井君。平井君著有《战国策讲义》，又学习洋文，可以称得上是兼通中西的日本学者。访问时，黄庆澄问平井君：“中西之学孰优？”平井君说：“格致制造之学，当让欧美为独步，若君臣父子之义，则我亚洲自有万古不变易者。”问：“中西文字孰长？”平井君说：“中文以神韵胜，西文以缜密胜。”平井君客观的态度，恰恰说出中西之学各有所长。

又有一次，黄庆澄与日本中和学校校长石崎君讨论算学。石崎君是一位数学家。黄庆澄说：“中西算术虽互为里表，然其造算之始，途径微别。中算从九数入手，西算从十字入手。”石崎君问：“何谓从十字入手？”黄庆澄回答：“西算之祖出自几何，几何一书由有等至无等，由有比例至无比例，何处非从十字悟出？”驳斥了“西学东源说”。

他明确指出：“三代自三代，欧美自欧美，援三代之学以驳欧美不可也，援欧美之学而强附之三代亦不可也。”他批评日本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含糊不清的。他说：“东人论学，动辄曰集万国之长，庆澄观其学校，途径之阔，诚未可厚非，然过于夸大，往往多是而非语，如云‘三代之学亡于中土，而存于欧美’夫欧美之学，凿破

鸿蒙，别开生面，庆澄断不敢执迂腐坐井之见，而与之争。”他的观点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那些极力想论证西学是中国古圣贤三代之学所传的继承与发展的人要高明的多。至少他已经认识到中西学术的结合，不能靠简单的比附。总结日本学习西方的特点和经验，他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应如何学习西方的具体见解。

黄庆澄从对比中日两国的不同国情入手，分析日本民族的特点，探讨日本学习西方取得明治维新成功的有利因素。指出中国学习西方的不利因素及其对策。他认为“夫君子之观人国也，必洞观其上下实在情形，反复推勘，然后悉其利弊所在。”因此他“细察其（指日本）人情，微勘其风俗”了解到日本民族，“大致较中国为朴，而喜动不喜静，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无坚忍之气。日人短处在此，而彼君得以奏其维新之功亦在此。”也就是说，日本民族好动、喜新、进取是他们学习西方取得明治维新成功的有利因素。相比之下，他尖锐地批评中国的官绅们：“除闽粤及通商各口岸外，其缙绅先生则喜谈经史而厌闻外事，其百姓则务本业而不出乡闾。”这种保守闭塞的状态，导致“中国之士之识则太狭，中国之官之力则太薄。”然而他不敢直接否定中国的封建统治，只是站在顺乎历史潮流的立场上，呼吁朝廷“但望当轴者取泰西格致之学、兵家之学、天文地理之学、理财之学及彼国一切政治之足以矫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之。竭力扩充，勿以难能而馁其气，勿以小挫而失其机，勿以空言而贻迂执者以口实，勿以轻信而假浮燥者以事权”。他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结合中国特点学习西方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他的思想也没有走出“中体西用”的怪圈，在指导思想上他仍坚持“但师彼之法，而不师彼之意”的基本观点。

综上所述，中国官员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发展的共识，建立在对日本的近代化融合中西文化的认同基础之上。访日官员在日本的教育见闻与感想，清楚地反映出这条思想脉络。日本学习西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中国应该走日本的发展道路，即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近代化道路。

作者单位：辽宁师大教育系

责任编辑：凌峰

梁发及岭南基督教的传播

关汉华 胡波

梁发其人,由于中国史籍对他并没有留下多少直接的纪录,因而鲜为人知。知之者,亦多有误解,当人们偶尔地提起他的时候,这位曾对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有过深刻、积极的影响,并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虔诚信徒,竟往往被视为“叛逆者”。因为他所作出的人生抉择,以及为传播基督福音所作的种种努力,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因而梁发和他抛诸身后的一切,就不得不充当历史运动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事变。对于这位有过种种非难的人物,要真正认识他、理解他固然困难,恰如其分地评价他更非易事。本文拟对梁发及其在岭南传播基督教的影响,作一次历史的检视,并对十九世纪中西文化的撞击作些反思。

一、传教·信教·禁教

梁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华人牧师,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要谈论梁发,首先离不开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去探讨诸如传教、信教、禁教这样的大背景。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形形色色的宗教,大多采取过“兼容并包”的宽松政策。虽然在历史上不乏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义理名教论争和“三武灭佛”之类的教案,然而中国人民对异教的宽容态度却大体地保持着,只是在外来宗教触犯了中国人的利益、传统的观念或“天朝”的尊严时,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和道德规范,才会作出一些自我防卫式的反击。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里的人首先是容忍外国人的,因为那些看来不会损害君主权力的东西并不引起他们的注意。……一个欧洲人可以用他所得到的某些知识使他们欢迎他。这在开始的时候是好的。但是,当他得到一些成功的时候,纠纷发生了;有些利益关系的人们也知道警惕了;由于这种国家在性质上特别需要安宁,最微小的纷扰就有可能把它

推翻掉,所以,他们立即禁止这种新来的宗教以及宣传它的人。”^①

诚然,早期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曾经光鲜过一阵子,并异乎寻常地受到朝廷的重视,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政府从根本上接受了基督教,而是由于传教士们以他们所掌握的天文、历法、数学、舆地等有关新科学技术知识暂时满足了中国朝野人士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传教士们采取了较为委婉的传教方式,想方设法地去迎合中国固有的风俗民情。他们“为了防止新宗教引起中国人疑心,神父们在公开场合对宗教事务缄口不言。……把剩下的时间都用于学习汉语,书法和了解中国的习俗。他们努力以身教感化异教国民,就是说,他们是用自己的榜样力量和生活的圣洁赢得人心。……”^②然而这只能是短暂的,因为基督教不象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与中国固有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有着许多共同点,它本身所具有的排他性,即强调一神信仰和教会绝对纯粹性,必然与中国人的多神崇拜和尊孔敬祖观念格格不入,它既不承认儒家学说的地位,也不承认王权的绝对尊严,又常常介入世俗事务,所以,它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还在西方人为死去的利玛窦大唱赞歌的时候,历史上著名的“南京教案”却在中国爆发了。理由是教士们违反了中国朝廷的禁令和“煽惑愚民”。随后又发生了攻击汤若望及其教义的“历狱”事件。又由于“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便从宗教态度上后退,开始采取部分禁教政策。到雍正时便实行全面禁教,对于华人信教则更是严加取缔。谕令指出:“澳夷原属教门,多习天主教,但不许招授华人,勾引入教,致为人心风俗之害。……倘敢故违设教从教,与保甲夷目一并究处,分别驱逐出澳。”^③到了乾嘉时期,由于清王朝的外部形势更为严峻,因而禁教更严。1811年,嘉庆出于防微杜渐,根据御史甘家斌的建议,命刑部议定并颁布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将基督教与“左道异端”等同治罪,规定:“嗣后西洋人有

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并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诵经立会，煽惑及众，确有指实者，为首律拟绞监候；为从及被诱入教之人，照煽惑为从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④嘉庆还发出上谕：“如地方官办理不力，致令传教惑众，照新定条例，严参重处。若内地人民私习其教，复影射传惑者，著地方官一律查拿，按律治罪。”⑤可见，在当时，清政府对基督教的取缔是十分严厉的。

如果说，朝廷的取缔政策和禁教措施大多是出于稳定国家统治和纯化民心的考虑，那么，民间之排斥基督教、憎恶传教士和教民，则大多出于传统习俗，尤其注重道德伦理和文化价值观念。“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夏”的自尊心态，以及注重群体生活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主张“除上帝外不得崇拜别神”、反对祭祖的外来宗教——基督教有太多的好感和礼遇，更谈不上改信基督，崇敬上帝了。积习相沿的生活方式和年深日久的传统文化观念，以及朝廷的种种禁令，有形无形地使他们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构成了一道壁垒森严的防线。普通民众那种害怕被社会和群众视作“越轨者”而受到排挤，以及对官府严厉惩罚感到恐惧的心理，更加遏制着人们的入教。而梁发却异乎寻常地成为西方宗教界所称道的第一位华人牧师，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觉的、虔诚的基督信徒，是当时民众信教入教人数不太多中的一个例外。

二、阅历·信念·事功

梁发为什么会崇信基督教？为什么会至死不渝地为传播基督福音而尽力？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其实一个人是否信教，往往是以个人的命运、素质、机遇和环境等等主客观因素为转移的。

1789年（乾隆五十三年），梁发出生于广东省高明县的一个偏僻的农村（三洲司古劳村），世本农家，家境贫寒，曾参加过农业劳动。幼年时期的梁发，压根儿就不知道基督、耶稣为何方神圣。他和中国亿万的老百姓一样，自幼即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尽管他是到了十一岁时才进村塾念书。但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刻苦地攻读儒家经典。对儒家的伦理观念最为崇信。然而梁发的生活道路以及他所向往的仕途并不通畅，艰苦的攻读并未能改变他多舛的命运，更未能成

为他青云直上的阶梯。幼年时所向往的儒家梦，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得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破灭了。1804年（嘉庆九年），梁发年满十五岁，由于家境的每况愈下，不得不辍学离开父母去省城广州谋生。初学造笔工艺，后转习雕版印刷技术，四年师满后，便到一间离洋行街（十三行）不远的印刷厂当上一名雕版印刷工。

青少年时期的环境和经历，对梁发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当他刚刚接触基督教及其教义时，也是以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一“新奇宗教”，并抱有怀疑的态度。但他最终选择了基督教作为自己精神家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他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的机遇有关。同时也与他接受马礼逊、米怜牧师以及基督教方面的书籍有关。他长期受雇于传教士，常到他们家中作客，“每日参加那所有家人仆役都参加的家庭礼拜，听那属神之人祈祷讲道”，⑥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影响。为了寻求对“罪过”的解脱，他便在闲暇之时察阅圣经，认为“此是一部劝人离恶之好书”。当他从耶稣之异迹中获得证明时，便“决志为耶稣之门徒而求受洗”，⑦做了一名基督教徒。梁发于1810年在马六甲入教，三年后回到家乡，不久就因刊刻传教书籍，被当地官吏拿获，多次遭受笞刑的厄运，甚至妻儿也受到牵连。但梁发仍然对基督教笃信不移，并以“我无所夸，惟夸我主耶稣基督之十字架耳”自勉自慰。

宗教既是麻醉剂，又是兴奋剂。梁发入教后，便过着严格的基督徒生活，学道至勤，热心布道。他成功地使他的妻子成为“中国第一个信奉改正教的妇人”。以后他的儿子和父亲、媳妇以及其他一二亲属，也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了基督教，从而使他的家庭成为第一个华人基督教化家庭。⑧1847年，梁发将他在岭南地区传教的进展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在福音堂中曾先后向130人宣道，分送圣经68份、小书218本。他曾为4个妇人和孩子参洗。在医院里，他的听众共有男子2487人，女子和小孩550人，并先后分送给他们312份圣经和小书1568本。⑨而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当他与古天青合办私塾，以便利用中国历来尊师重道的传统进行传教时，他就曾被指责为“宣传迷信”与“卖国”。他的学塾被解散，“而他自己有性命之危，不得已而逃至澳门。”⑩其后他虽避居广州南郊江岸的新沙，但仍然未能避免被攻击的厄运，他住所内的陈设被尽

行捣毁或被抢走。然而,梁发对于外界的干扰和阻力却义无反顾。在他风烛残年之时,儿子劝他不要劳作,他却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更有责任向华人宣播福音。由此不难看出,基督教对于梁发不啻是一种最好的兴奋剂。

其次,梁发为了更好地在岭南地区传播基督教义,除了自身努力“精研真道”外,还“决意著作布道小书,分与国人,觉得这是传扬圣道最能实行的方法”。^⑩他一生撰写了不少传教专著,主要有《劝世良言》、《救世录撮要略解》、《熟学圣理略论》、《真道问答浅解》、《真道寻源》、《灵魂篇》、《异端论》、《圣经日课初学使用》、《祈祷文赞神诗》、《赦世之神谕》等。^⑪为了获得更好的效应,梁发在解释“基督真理”时,还特别注重自己的文风,他曾指出:“现在圣经译文所采用之文体与本土方言相差太远,译者有时用字太多,有时用倒装之句法及不通用之词语,以致意义晦暗不明。圣经教训之本身已属深奥神秘,如再加以文体之晦涩,则人自更难明瞭其意义矣。……虽然读者信仰圣经或反对圣经系另一问题,初与文体之晦明无关,但吾人总应竭吾人之力求使圣经文字易于通晓。”^⑫应该说,梁发是了解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也是了解西方的民族和文化的,因此他的宣教比起西方传教士的宣教更切近于中国的实际。

梁发在岭南的传教活动,除了以自己的言行进行感化外,还特别注重在知识阶层中宣教和布道。对于知识界他虽然很难获得公开演讲的机会,但通过派送书籍对他们进行传道,则不失为当时所能用的好办法。他到高州去,目的就是要将基督教书籍分派给由各县来城投考的生童。这种布道小书,仅高州一城,便派送了七百多本。回广州后,他们继续在学院前派送有关布道的书籍,这些士子来自全省各地,梁发正是利用了这三年一次的乡试机会,发送他亲自撰写、亲自印刷的宗教小书,而这些应试士子亦“甚欲得之,且有看过内容之后,再来讨取者”。^⑬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就是在应试时得到了这些布道小册子的,不管其作用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它毕竟与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其影响显然是不可低估的。

三、效果·影响·评价

历史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它不以人们的意

志为转移。“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⑭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间的差距,客观效果与主观努力间的背离,就在梁发身上错综复杂地揉合在一起了。

梁发为传教而殚心竭虑,“为天国而忘私家”,不以丧明之痛而障碍其布道之精神,足迹遍于澳门、南洋一带,并随考而遍走省府州县,虽因布道派书印书而屡被凌辱窘逐,屡遭鞭笞与幽囚,但他毫不畏缩。就其主观意识来说,不可谓不坚。但他所能影响并使其信教入教的人数毕竟不多,因为在当时的反教氛围下,梁发的活动在人们看来,不啻是对祖宗、神灵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背叛。至使教会同工也认为:“他是一个忠心的宣教士,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宣教士。”^⑮

的确,从传教布道的直接效果上看,梁发始终没有太多的自信。他没法使更多的乡亲毁弃偶像改信福音,敬仰上帝,甚至无法使人们相信他的真诚和纯正。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并没有享有为所欲为的特权,相反,人们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敌视态度却由此而越发激愤。梁发在其有生之年,仅凭一腔宗教热情,是无法弄明白这种复杂的、微妙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也无法检视自己一生信教传教的得失,但平心而论,梁发之信教与传教固然越出了传统的轨道,然而梁发出自内心的爱国热情也常常溢于言表。如果说他襄助美国公理会牧师翻译《新加坡栽种会敬告中国务农之人》小书,以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还只是他对农事稍有兴趣的话,那么,他为劝人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而写的《鸦片速改文》,以及力图以在华传教的利害关系去阻止中英战争的爆发,为此,他怀着真诚的愿望去拜访英国驻广州领事马儒翰先生,敦请他用他的能力去阻止战争。^⑯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真诚的爱国热忱。

黑格尔说过:“在历史里,人类行动除了产生旨在取得的结果——即他们认识并欲求的结果之外,通常又产生一种附加的结果。他们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并不是现在他们意识中也不包含在他们的企图中的某种东西,却潜伏在这行动中一起完成了。”^⑰梁发的信教与布道,表面上看是他个人的信仰和追求,他对偶像迷信和祖宗崇

拜的否定,似乎是基督教排他性在他身上的一种表现,但是信教、传教活动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一种否定和对主体自我人格理想的重构。他经常劝乡亲们不要崇拜鬼神和崇拜偶像,迷信风水,尽管当时响应者寥寥无几,但他的言行毕竟会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文化进行检视和再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梁发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使人们从过去闭塞的环境里打开一条缝隙,去开眼看世界。梁发之编写《劝世良言》,就是“甚愿中华大国之人,观此书者,勿徒恃礼义之邦,文华之国,必要虚心理会,忘乎国之礼义文华,混于道之传自何方,准情度理,只思神天上帝生我为人,而人所以为人者,真经圣道福音之理也”。^②诚然,梁发要人们虚心学习的不过是西方基督教教义,但他敢于批评国人固步自封、抱残守缺、骄傲自大等病根,在当时是需要胆量的。由自身的局限看到民族整体所存在的弊端,由外在的感触回归到内在的精神铸塑,这种由内向外,再由外向内的心路历程,既是中国士人主体自觉的一种心理建构模式,又是先行者感觉到孤独后的一种情感“升华”。对现实生活的敏锐直觉和对理想人生的探索追求,使梁发迫切地感到了自身的责任和某种应尽的义务。当然,他不可能看到现实生活背后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冲突的根源,也没有象历次农民起义的英雄那样充当旧王朝和旧体制的掘墓人,而是企求借助外来的基督教这个所谓的精神武器,指向他所不能赞成的东西。毫无疑问,这既不现实,也决非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方式。不过,能够正视自己和民族文化的缺陷,在当时无疑是可贵的。因此,有人断言:“他作劝世良言,在1830年顷,可谓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最早者之一,早于魏默深、林则徐等人。”

梁发的布道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此,他那有形无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亦时隐时现地表现出来。他所撰写的布道小书,对于孕育人们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曾起过积极作用,特别是《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宗教知识和革命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有的学者认为《劝世良言》至少在十个方面影响了洪秀全:即弃除偶像,施用洗礼而拜一神;创立“拜上帝会”和定名“太平天国”;天堂地狱、天下一家的观念之确立;十款天条和礼拜祷告仪式的制定;以及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言行等,大都来源于《劝世良言》

中的说教。^③也就是说,洪秀全及其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纲领条例上以及盲行仪制上,都从梁发的《劝世良言》中获得了启迪,并且是比较全面地予以借鉴。当然,严格地说,洪秀全的革命,并不只是因读了《劝世良言》后才突然拂袖而起,发动武装起义的,这里还应有更多的历史、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劝世良言》之本意也并非教人起来“造反闹事”、反抗朝廷官府;梁发本人也从来没有闪过以武力反抗或诅咒官府朝廷的念头。不过,梁发在《劝世良言》中所阐发的思想,无疑孕育了洪秀全的反叛意识和怀疑批判精神。列宁说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④“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⑤宗教没有麻醉人们的政治神经,相反却唤醒了人民,这是梁发所未料到的。

或许还有一种历史后果,梁发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即他所作的布道小册子和宣教布道工作,本身就具有文化传播的意义。且不说他协助马礼逊、米怜雕刻出版《华英字典》、《圣经》中文本、创办英华书院和《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等中文报刊所具有的文化传播意义,就是他自己编辑撰写的布道小书和劝人毁弃偶像、信奉基督教的种种言行,也不能说它不具有文化传播的价值。他把上帝才是“真神”,余“皆非神”的学说以及天堂之说,“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的“平等”、“博爱”观念传入了中国。

宗教是一种哲学,它不同于封建迷信,它有其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独特看法。基督教的传入无疑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体制、以及过于保守的禁教政策都是一大冲击。同时,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基督教的兴起与发展与整个西方世界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代表了一种与中国文化不同特质的西方文化模式。尽管西方近代文化最初是以宗教的形式传入中国,但它的实质和特征我们仍然可以在基督教教义和传教士身上得到体认。所以当梁发津津乐道于基督教并不失时机地发送他所撰写的种种布道小书时,事实上他是在宣传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宗教观和价值观,起着文化传

汉语词义人文研究论纲

苏新春

一、逼近词义本质的文化研究新范式

在古代,以认读为基本目的的语言研究对汉语词语意义的古今变化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知识。在结构观统领下的时代,人们对汉语词语的内部结构方式与外部组织形式,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精深研究,构词法中的主谓、动宾、偏正、动补,或对词素结合规律名名、动动、形名、动名的划分,足以令人眼花缭乱。而构形法中对内部形态、外部形态的区分与描述,又使得词形的奥秘,得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揭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又发现,对词语的理性认识远未结束。且不说现有的研究向西方语言理论认同的前提是否靠得住,也不说其结论的价值幅射面有多广,它起码给后人留下了关于词语认知上的两个大疑点:1. 词义的这些属性是不是它的根本属性,人们对词义的理性认识是到此基本满足还是远远不够?2. 在词语表现出来的这些现有特征的背后,还有没有更为根本的因素在制约着它?

播和文化交流的作用。尤其是在当时清朝政府严厉禁教和实行闭关政策的情况下,梁发这种布道工作所具有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意义与作用,就更为突出、更为重要了。因此在对梁发

出历史评价的时候,对于他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不应予以忽视的。

-
-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第172—17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第5页三联书店。
③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
④ 《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三)第45页。
⑤ 《清仁宗嘉庆实录》第326页。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 麦洁恩著、胡簪云译上海广学会重译《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载《近代史资料》总39号中华书局出版。
⑰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119页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版。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⑲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72页,三联书店。
⑳ 梁发:《劝世良言》载《近代史资料》总39号中华书局出版。
㉑ 邓嗣禹:《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载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24页,9—16页。(台湾)学生书局民国54年出版。
㉒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9页。
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中国纪事》。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中山大学孙文学院
责任编辑:凌 峰

这些疑问的提出，正象英国学者L·R·默帕尔所说：“我们对语言的究研到此算是到了最高点，从这儿我们可以回顾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开始时我们认为语言只不过是人类的喉头发出的声音组成的系统，现在证明语言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它是人们表达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工具，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是历史的宝库。”（L·R·默帕尔《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8页。）

随着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和理论的成熟，对这两个问题持有明确答案的人愈来愈多。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把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引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在人们还没有冷静下来思考它的所有涵意，并从理性上接受它的观点时，有时彷徨，甚至责难，这都不足为奇。因为与曾被人们奉为圭臬的结构观相比，它的视角相距太大，它的界域显得太宏阔。这种心态的调整需要时间。以索绪尔创立的结构学说为座标，可以看出在以后的语言理论发展中有两个方向明显不同的突破。它们冲破了“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纯结构观点，一个从广的方面延伸，提出了以“语境说”为中心的注重语言环境的理论，一个从深的方面延伸，提出了关注着语言主体以人为中心的种种学说。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发展，在继续一段路程之后，都很自然地集中到这么一个融汇点：文化——以人为中心的周围环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环境。

语言不是天外之物，它的形成、源起、应用、生成、搭配、组合，都牢牢扎根于特定的某一文化环境之中。这种文化环境不仅对实际运用中的语言表现出强大的制约力，而且对语言结构的静态存在面貌也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语言结构的形成本身就是在天长日久的动态使用中稳固下来的，这从古今汉语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得到证实。在特定目的要求下，不是不可以把语言当作一种超乎一切的形式符号来进行一种高纯度的结构分析，但这样做可能会人为地割断了语言与其母体之间的血脉联系。它所得到的结果要么是一种人为的理想状态，要么是对现实的一种变态反映。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开创了人们认识语言的新天地。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必将成为语言学发展链中带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一环。

词义的人文认同派主张对词这一级语言单位进行一种主要是结构性的静态人文分析。它努力使汉语词义的文化研究遵循这么一个原则：描写与阐释相结合。结构观指导下对词语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描写性的研究，它回答的是词语是什么，所关注的主要是词语的外部形式标志。文化语言学对词语的研究早期主要是一种纯阐释性的研究，它以现有词语认识为前提，阐释它们的文化意义与基因，研究的重心是回答语言结构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随着文化语言学的深入，文化认同派的主张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即它并不简单地认可现有的关于语言结构是什么的认识，而是在追究语言结构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的同时，还探讨在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语言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结构特征。这种从文化到语言，从文化到语言结构的认同更具有本质意义上的价值，它涉及到对语言的本体进行重新解释。因此，文化语言学并不单单是解释，对现有的描写结果进行一种补充式的阐释工作，它还要进行描写，在进行文化意义阐释的同时进行一种全新的结构描

写工作。只有描写与阐释相结合的文化性研究，才有可能将人们关于语言的认识引入到一个新的境地。

它努力使汉语词义的文化研究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建构起符合汉民族文化内涵的汉语词义新理论。汉语从它形成的第一天起，就扎根于汉民族文化土壤，以此为滋养生息的母体。这种生息条件不仅制约着词义个体的出现、消失、演变的各个环节，也不仅制约着词义的整体分布与发育，还深深地制约着词义的依存形式与组合规则。在对语言的认读与教学特性已经进行了数千年的研究，和对语言结构规律作了百余年研究的漫漫历史面前，对语言文化意义的研究肯定还显得浅近，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肯定还颇为有限，但这种研究道路所昭示的前景却如此灿烂，它将吸引着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投身于其中。

它努力使汉语词义的文化研究具有这样的学科性质：成为对汉语词义本体作出阐释的汉语言本体科学的一个分支。词义的文化性研究曾为众多的人文科学服务过，词义总是其它学科撷取语言素材时所首先涉足的对象。正因为如此，词义也成为文化语言学初创之时的语言与文化交叉性研究的一块开拓之地。但这只是对现有词语知识的一种补充。文化认同派的词义研究不满足于文化语言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说法，它将努力对词义作出一种全方位的文化考察，尤其在词义的单位 and 结构，如词语命名源由、单音词的基本结构、复合词结构的组合规律、词义类聚的内在根据、词义的整体发育水平等这样一些涉及到词义物质客体的重要方面，来回答汉语词义的文化意义及其表现特性这一重大问题。

在词语的内部，可以分为词义与词形两大部分，但这并不是两个对等的部分。词义在其中占据着核心的份量。尽管词义仍必须在词形的依托下才能生存于语言和言语的空间之中，尽管种种不同的词形也会对词义的生成和表达形成这样那样的影响，但词义仍对词形有着更为重要的巨大作用力。词义对词这一语言基本单位的形成和确定是两个重要鉴别标准中更为重要的一个；词义对词单位的分化与繁衍起着内在的重要起动性作用；词义决定着词语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词义规定着词语的交际范围和表达力、基本的色彩与客体的称代。因此，词义将成为词汇研究中应予关注的主要对象。

词义与文化的关系在语言与文化的双边关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语言这个交际符号的体系中，词义是最基本的使用单位，它依托着词形，凝合成一个有独立意义的语言单位，与人及其周围的一切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它的具体表达形式所充盈着的意义内涵中，与周围的文化事实相互渗透，你我难辨。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的文化意义首先也最为外在地就表现在词语的身上。而文化，无论是作最广义或是最狭义的理解，它最终都将被语言所记载所表达，成为词语所反映的对象。如此说来，一切的文化，文化的一切又都将在词义中得到反映。那么，作为力图成为语言本体科学的词义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就不是从词义来看那缤纷的文化世界，恰恰相反，它的立足点尽量驻扎在文化一边，将着眼点对准语言，来探寻词义那或明或暗的身影。

二、词义文化分析的多角度

词义与文化意义之间具有全方位相互通达的关系。在对汉语词义进行完整的考察时,可以依次对它们进行三个不同角度的观察:词义的单体、词义类聚和词义的形式。

词义单体的文化显现。在对一个具体的词义单体进行考察时,我们既可以按这个词义内部不同成分的构成,也可以按这个词义整体的迁移过程作出通观的安排。在前者,词义内部的种种意义成分如概念义、色彩义都有可能与文化背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后者,则一个具体词义在它的产生、消失、滞留、命名、起源、繁衍、引申、替代等各个环节都将可能成为人们探讨的视点。在对词义单体进行文化意义的分析时,可以以它的变迁过程这一动态的纵线为主,以词义内部构成这一静态的横面为辅,分出词义的产生与消失、词的命名、词义演变三个阶段作为论述的对象。由此可以发现尽管个别的具体词义所含有的文化因素可能会千差万别,但它们所接受文化影响的方式和在此之后的运行方向却是相当固定的。

词义类聚的文化剖析,致力于全面解释一种语言的词义文化问题。词义类聚可以小至词组、词群、词聚,也可以大至整个词义系统,而之所以将这些大小不一的词义群放到一起,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凭着词义与词义之间的联系而归结在一起,尽管其中的纽结点可能会大相径庭。比起词义单体来,词义类聚的文化意义要显得隐蔽些,它把文化研究的视野从最表层、最活跃的个体词义扩大到词义的群体,这就需要人们具有较好的系统观念,而词义类聚所与之发生联系的文化问题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深化。在这里,基本词汇成为关注的第一对象。因为自从研究者们从整个词义存在中把它与非基本词汇作为两两对立的事物划分开来,人们就一直从它在词汇体系中的作用来考虑问题,而现在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文化因素对基本词汇的形成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根据不同的划分原则,词义可以划分出不同的词义类聚,而词义类聚的大小,发育的健全与否,都与该文化体系中某一方面的文化发育有着一种表里相应的对答关系。在词义的整体系统中,更是深受文化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或是直接施之于词义系统的客体,或是作用于词义系统的研究者本身。词义类聚的千姿百态,使得要对它进行穷尽的研究相当困难,但正确原则的提出,将使我们的研究遵循着一个合乎逻辑的轨道进行。

词义形式的文化内核。尽管在词语中,核心是词义,但词义仍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词形才能有所作为,因此词形研究也就必将在词义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一环。词形包括词的语音形式、语法形式,作为高度发达的语言,书面语早已对口头语言产生了无比重要的影响,因此书面语的形式也有放到一起进行考虑的必要。以前,人们在谈到词形的时候,总是比较多地想到它的物质性、约定俗成性,或干脆就是那不可考究的自然性。这里面当然与词形的物质成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人们还没有象对词义那样把词形习惯地与文化背景挂起钩来考虑,还在于文化意义在词形里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相当隐含的特点。在对词形的文化考察中,应该从汉语的单音词开始,单音词

是汉语词语形式中最早的形体，又是在整个汉语词汇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核心部分。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复合形式，也很深地影响了汉语的书面记载符号——汉字。而更应受到重视的是继发性的词形问题——汉语复合词问题。因为它是在业已形成并日益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其影响、受其左右而问世的。在它身上将更清楚地反映出汉文化对汉语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以上三方面的考虑与划分，希望能基本包括整个词义问题的所有方面，当然这仅仅是就所概括的“方面”而不是就所有的“实际”问题而言。在与这种横切面相对的是实行“类别词”分类的纵向研究，类别词的提出有点象上面提出的“词义类聚”，但词义类聚所着眼的是这个类聚群中的关系，而对类别词的分析将主要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它们的存在、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它的分析实际上又是把它看作一个词义单体了。要划分出一个语言中的所有类别是相当困难的，它几乎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庞大数字，如“动物词”“人名”“地名”“饮食语”“称谓语”“亲属语”“禁忌语”“委婉词”“成语”“谚语”“地理类词语”“新词新义”“外来词”“农业类词语”，都是人们曾关注过的类别词。

这样，“词义单体”、“词义类聚”、“词义形式”、“类别词”四大部分的划分，将构成词义人文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框架，它把我们逐步引入到词义王国中去探究那新奇无比的奥秘。这四部分的划分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既能做到对词义的文化意义分析不至于出现大的遗漏，又能显现出词义文化分析的难点之所在。前一个目的是否达到姑且不论，但后者却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词义单体”“词义类聚”“词义形式”三者中，研究的难度有依次递增的趋势，而于词形的文化探秘将成为所有的词义文化研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因为词的意义从它产生开始，就可以说是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向来对语言，对词汇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就主要是针对它而言的。而词义形式部分则在语言结构观一统天下的时候，它以纯物质的面目出现，使人们总是把它排除于人文活动的圈子之外。人们在醉心于描写它的ABC之外，就很少再考虑什么了。当然，在进行词义形式的文化研究时，不是可以完全不论及语言的物质性，而是它将特别注意在词义形式的物质性与文化意义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力图寻找它们二者之间的对应力，并力图根据这种对应力来对词义形式重新描写。这是一种愿望，这是一个目的，笔者相信，它终将成为文化词汇学所以能独立于语言学之林的一块奠基石。

三、词义文化内涵的多层次

在对词义进行了四个领域的考察后，我们会发现，在词义所负载的文化内涵上，有着深浅不一的存在状态，而这些深浅不一的文化存在又与词义的意义或形式、单体或类聚、动态或静态，有着浅近与藏伏的相互对应的显隐关系。这点与语法的文化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语法作为语言的组织规则，它主要以一种有序的排列规则表现出来。这种次序实质上就是思维顺序的反映，因此语法的人文意义很大程度上就与汉民族的逻辑思维规律联系在一起。在语法的文化研究视野中，尽管因不同的语法单位会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但这些文化意义的表现却会呈现出相对整齐的处于同一平面的特征。

对“社会心理是文艺与社会存在的中间环节”的一些理解

何 梓 焜

读了《学术研究》1991年第5期关于“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现实的中介”问题的一组文章，觉得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笔者曾在该刊1984年第5期发表《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心理的论述》一文，也谈到文艺与社会心理的关系。现受到以上讨论的启发，拟作一些补充和具体论证。

一、几个基本概念须要明确

文艺作为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通常又说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说社会现实的反映，还说文艺是社会心理的反映。文艺究竟反映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上面提到的几个基本概念。作为文艺的反映对象，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社会生活、社会现实几个概念是可以并列使用的，但它们并不等同，它们的内涵从不同侧面表明文艺反映对象的属性，它们的外延则部分重合、有交叉关系。

而在词义范围，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却千差万别，一般说来，词义单体的产生、消失与变迁，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最为外在，而词义类聚却相对隐含，总体词义系统则与一种大的文化观念体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词义的生长消逝中，词义的文化意义较为外在，而在词形方面其文化意义又隐含得多。词义单体、词义类聚、词形结构，这三个词义领域的划分角度，又会因其文化内涵的表现特征而具备文化意义上的三个层次。人们会有趣地发现，在词义文化意义的这三个层次之间，竟与文化世界的三个层次有着不尽相等却大致相衡的一种交叉中呈现对应的关系，即词义单体与文化物质层次、词义类聚与文化制度层次、词形结构与文化心理层次相互照应。当然，首先需要阐明的是，这种照应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其中的交叉性很大。要将它们一一归类，作出对应性的阐述，是十分困难的。这个问题，必将在以后的研究中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广州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我认为，要揭示这些概念的涵义可以求助于普列汉诺夫用以概括整个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的公式。这五项因素是：“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页）他用一个梯形的等级序列的公式表明这些社会结构的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依赖关系。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对这个公式可以这样理解：就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而言，前三项（即生产力、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属于社会存在，后两项（即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属于社会意识；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则前两项（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后三项（即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思想体系）属于上层建筑。社会的经济关系既是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又是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文艺既是社会意识，又是上层建筑，它既是被社会存在决定的，又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社会存在与经济基础两个概念并不等同。

社会生活这个概念的外延比社会存在这个概念的外延要大些。前者包括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后者主要指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而精神生活的大量表现属于社会意识。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因此，社会存在与社会生活是近似的概念。

正如社会存在是由生产力、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等因素组成一样，社会意识，也可以区分为社会心理、社会风气、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又称为意识形态）等层次。思想体系是高层次的社会意识。社会生活除了包括属于社会存在的社会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外，还包括社会心理、社会风气、社会思潮等低层次的社会意识。文艺属于意识形态，是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它反映的社会生活除了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外，还有社会心理、社会风气、社会思潮等社会精神生活。它直接反映社会心理，间接反映社会存在。所以，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社会存在的中间环节，而说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中间环节就不够确切，因为它本身就属于社会生活。

社会现实是客观存在的现成的各种社会现象的总和及其本质，它既不等同于社会存在又不等同于社会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现实一词来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时，指的是现实世界或现实事物。“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239页）唯心主义哲学家对现实一词作出不同的理解，例如黑格尔认为，现实高于实存，把现实作为绝对观念反思自身的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对于现实一词，既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

又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因此,我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社会现实的反映的说法并不十分严谨,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现实的中间环节的提法也是不够确切的。严格地讲,还是说文艺是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社会存在的中间环节更为准确。

二、文艺是否有两个或多个源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个基本层次,又把思想体系(或译作意识形态)区分为低级的意识形态(政治理论、法权观念等)和高级的意识形态(科学、哲学、艺术等)。社会心理作为社会存在与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是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是被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决定的,又是比它更高一层次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的根源,社会心理决定思想体系。这样,作为高级意识形态的艺术,它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是社会心理的反映。艺术是间接反映社会存在,直接反映社会心理的高级意识形态。

普列汉诺夫首先肯定艺术是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反映。他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我们说艺术是意识形态之一,因之,我把它和其他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法权及其他等等相提并论,这些意识形态中的每一个也都是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54页,《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俄文版第3集第154页)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为高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对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反映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的环境。”(《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22页)按照他的五项因素公式,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中间环节就是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

艺术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即既来源于社会存在,又来源于社会心理。前年广东文艺理论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认为,这“可能导致哲学上的二元论”,“难以避免二元论之嫌”。这种担心在哲学界也存在。有的同志提出,把社会心理看作是思想体系的根源“容易与根本意义上的最终根源相混淆。因为哲学上所说的‘根源’通常是指第一性与第二性关系上的‘根源’而言的”。“在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并不存在源和流、派生和被派生、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见李清昆、王秀芳著《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第203页,周积泉在《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7期上发表的《谈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文。王秀芳在后来出版的《美学 艺术 社会》一书中更正了以前的说法,认为,社会心理对艺术的“这种决定关系和根源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而是指在社会意识的范围内艺术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见该书第159页)普列汉诺夫用“根源”、“决定”、“反映”等词来说明社会心理与包括艺术在内的思想体系的因果联系和依赖关系,并不是指世界的本原上的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不可能导致承认有两个世界本原的二元论。在哲学上第一性与第二性、谁决定谁、谁反映谁、谁来源于谁的提法不是等同

的。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只能用于说明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而决定、反映、来源等则广泛地用于说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依赖关系。普列汉诺夫说社会心理是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体系的根源不是最终根源，即使属于社会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也不是思想体系的最终根源，思想体系的最终根源是生产力的状况。“争取生存的斗争创造他们的经济，而在经济的基地上生长他们的心理。经济本身亦是派生的东西，正如心理一样”。“只有在通俗的演说中才能说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的原因。远在成为最初原因之前，它本身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功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16页）

有人说，反映与被反映之间没有“中间环节”，意识之间没有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如果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都看作是一个整体，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是整体对整体的反映，并且反映是直接的摄影，那么，意识之间当然没有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反映与被反映之间也不会有什么“中间环节”。但是哲学上讲的反映是与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密切地连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意识是人脑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的产物，“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5页）社会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有机体，意识对存在的反映也是多种多样的，反映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反映，正面的和侧面的反映，单向的和双向的反映，单渠道的和多渠道的反映。因此，反映者与被反映者之间就存在中间环节，在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因素、各个层次之间也存在反映与被反映、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普列汉诺夫指出，在没有阶级划分的原始社会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影响着他的审美趣味，艺术常常是生产过程的简单的重演。但在已经划分为阶级的社会里，生产活动对文艺的直接影响就不大显著了，社会心理对文艺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要了解澳洲土著妇女的舞蹈，只要了解她们采集野生植物根茎的劳动就够了，但要了解法国世俗美人的“米努哀脱”舞，单知道十八世纪法国的经济是完全不够的。“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是表现非生产阶级的心理的舞蹈。所谓正规社会的大多数‘习惯和礼仪’就是用这种心理学来说明的。因此，这里经济的‘因素’就让位给心理的因素了。但是不要忘记，社会里非生产阶级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86页）

就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而言，文学艺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但就人类精神生活的范围而言，文学艺术则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心理的反映。

普列汉诺夫在研究社会心理与艺术的关系时，吸取了法国文艺学家丹纳的研究成果。丹纳认为，艺术是由人们的心理创造的，心理是由他们的境况决定的，而他们的境况又是由他们的心理决定的，因而陷入二律背反，把社会心理看作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最后靠山。普列汉诺夫指出，当丹纳说人们的心理是随着他们的境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时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当他认为人们的境况是由他们的心理所决定的时候，他是在

重述十八世纪唯心主义的观点。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才彻底解决了这个二律背反的命题。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地说明了艺术与心理、心理与境况的关系，从而克服了阻碍丹纳的观点继续发展的矛盾。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50页）

三、社会心理制约着整个艺术活动

社会心理是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的中间环节，这是普列汉诺夫美学的重要论题。当然，对这一论断的理解也不能绝对化，以为古今中外一切文艺、各种思想体系，毫无例外地都是社会心理的反映，都必须通过社会心理这一环节才能反映社会存在。事实上，不仅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存在大量的直接反映生产力状况的艺术品，就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也还有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原始、比较粗糙的艺术品直接反映社会存在而未必都经过社会心理这一环节。普列汉诺夫说：“原始艺术是如此鲜明地反映着生产力的状况，以致现在遇到疑问的时候，就依据艺术来判断生产力的状况”。“在文明民族那里，生产技术给予艺术以直接的影响要少见得多。”（《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37页）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直接反映生产力状况的艺术品虽然少见，但毕竟还有。普列汉诺夫承认这点并不表明他轻视社会心理作为艺术反映社会存在的中间环节的作用，他曾强调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2、273页）

那么，社会心理怎样决定艺术，艺术是如何反映社会心理的呢？

首先，社会心理决定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渗透到艺术创作活动中，从题材的选择、典型的塑造、灵感的生产，到艺术表现的手段与形式的采用，都受到社会心理的直接影响。艺术创作过程就是使各种“心理力量开动起来”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典型的塑造，把群众的心理个性化为典型人物的心理，另一方面，作家不仅描写别人的心理，还自我表现自己的心理，把自己心里在现实的影响下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传达给别人。“艺术家应当把构成他的作品的内容的一般东西加以个性化。既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个人，所以我们面前出现的是某些心理过程，而且在这里心理分析不仅是完全适当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是非常有教益的。但是剧中人的心理在我们心目中之所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是整个社会阶级或者至少整个社会阶层的心理，因而个别人物心灵中发生的过程就是历史运动的反映”。（《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186—187页）

如果说艺术创作是社会心理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那么艺术欣赏则是社会心理从个

别到一般的过程。艺术欣赏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的灌输，而是能动地再创造的过程。欣赏主体以自己的体验，按照自己的愿望，用自己对社会心理的感受去与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共鸣，从而使自己受到熏陶和启迪。“艺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艺术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的一种手段。”（同上书第837页）艺术作品之所以能与欣赏者产生共鸣，是因为作者的感情与读者（观众）的感情都是社会心理的表现，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反映，使艺术创作与欣赏沟通起来。

艺术批评是艺术欣赏的深化，通过揭示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文学批评的任务首先在于确定该艺术家是不是表现了该时代和该民族的人为的或者自然的愿望。”（同上书第796页）而这些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人们的愿望就是社会心理。艺术批评要理解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心理营构，揭示艺术作品对社会心理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普列汉诺夫指出，普希金的长诗《茨冈》远不是简单讽刺利己主义和不一贯行为的作品，它把握事物要深刻得多，它阐明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心理。即使是别林斯基这样一位具有敏感的艺术嗅觉的批评家，也未能完全理解普希金的作品中的深远的含义。艺术批评家和作家同样要深入社会生活，研究影响艺术的各种因素，尤其是要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才能对艺术作品有深刻的理解，作出全面的评价。

说社会心理制约着整个艺术活动并不是说它是制约艺术活动的唯一因素，说社会心理是艺术的根源并不是说它是艺术的最终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五项因素公式，从纵向来看，制约着文艺的因素除社会心理外，还有生产力的状况、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从横向来看，有政治理论、法权观念、哲学和宗教等意识形态，还有各民族各个国家的文艺的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的纵横交错的力量体系。“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重大的步骤引起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因而也引起社会心理的改变。社会心理所发生的变化，一定也多少鲜明地既影响到文学，也影响到艺术，又影响到哲学等等”。（同上书第245页）普列汉诺夫一再强调，他的五项因素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又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公式，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生产力的发展是各种社会现象变化的最终根源，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共同源泉，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根基。而同样重要的是“历史科学不能把自己局限成一个社会经济解剖学；它所注意的是直接或间接为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全部现象的总和，包括思想的作品在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37页）

基于上述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学说的理解，我认为陆一帆同志在《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中表明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有些提法还要仔细斟酌，有些具体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1985年4月，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在洛阳召开第七届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作了肯定的评价，对他关于社会心理是文艺与社会存在的中间环节的论断取得初步的共识。（见《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论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但是，联系现实问题研究社会心理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地探讨社会心理与文艺的关系，阐明这一关系的正确解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

梁凤仪小说中的财经风云

张 绰

旋风——流行小说的新品种

财经小说，是继武侠、言情小说之后，正在从港台向大陆蔓延的一股新“旋风”。

被香港书局公认为最受欢迎的三大作家之一的梁凤仪，在短短的三年内创作了24本财经题材的小说，不仅连续高居香港畅销书榜首，在台湾、东南亚、加拿大等地也深受欢迎。1992年初由香港政府市政局、香港艺术家联盟联合主办的艺术家年奖中，梁凤仪被选为1991年度最佳作家。由于梁凤仪的小说多以香港风云变幻的商界为背景，并将财经知识融入现代大都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以曲折缠绵的爱情故事为中心情节，揭示出“九七”前夕这一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生活环境中的重重矛盾和种种心态，这与以往言情小说的风格迥异，因而引起了内地出版界的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版了《醉红尘》、《花魁劫》、《豪门惊梦》三部小说，总印数已超过27万册；即将出版的还有六部小说。另有多家出版社正为购买其余十多种小说的版权而竞争。

梁凤仪出生于1949年，分别在香港和英国、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于1985年工余时间完成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早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梁凤仪就是香港商界知名的女强人。她先后在香港金融界、市场推销及公关公司、联合交易所、币业集团等机构任职，业绩显著。她凭借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她觉得有责任把自己所熟悉的财经行业和香港人的心态告诉广大读者。

反映经济题材的小说，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

的国家已经出版了不少，象加拿大籍作家阿瑟·黑利就出版了好多本如《大饭店》、《汽车城》、《航空港》等。国内这方面的创作刚开始，《商界》、《公关小姐》是这方面的开拓之作。这类小说，是在商品经济充分发达、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形成和健全之后才能出现的。它在今后应该成为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梁凤仪在这方面的创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内地作家开展经济题材的创作起着一种很好的激励和借鉴作用。

梁凤仪的财经小说，涉及的面很广。它主要写香港上层人物的活动，包括商界、政界的联系、勾结，以及儿女情怀、婚外恋等等。这里有女强人顾长基两度力挽狂澜的《豪门惊梦》；有被遗弃女子庄竞之对忘恩负义的情人进行报复的《醉红尘》；有写传统女子转变为现代女性，敢与雄霸商场的大男人一争高低的《花魁劫》；有记录下一段段人海恩仇，为自己、为香港的真正发达与安定而奋战的《今晨无泪》；有写一家庭主妇突然感悟，立志奋斗成为叱咤风云的企业钜子的《风云变》；有展现商场巨人办事法则，让你窥视他们的内心世界的《尽在不言中》；有揭露人与人之间千种利害冲突，展示人海惊涛，卷起恩怨情仇的《千堆雪》；有布置陷阱，让对手陷入灭顶之灾的《九重恩怨》；有写商界巨子与官商勾结，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与经济目的的《强人泪》；有写两个现代女性与一个男人的关系和心态的《我心换你心》；有写一个金马玉堂的富户兴衰以及另一富户上下两代之间的情债孽债的《笑春风》；有写一名交际花穿梭于顶级富豪与政府高官之间，洞悉官商勾结，从而正确处理个人恋爱与国

的意义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展开。这是哲学工作者、文艺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共同的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族情怀的《花帜》；有写一个刚出校门，开始在社会上奋斗的女孩子，如何成长为职业女性的苦乐悲喜的《信是有缘》；有写一家百货公司董事家族内部倾轧的《芳草无情》；有写蔡明军和左恩程、谢文适之间的恩怨情怀，反映商场内部斗争的《昨夜长风》；有写现代男性承受工作和家庭的压力，那种境况遭遇和心理历程给人以启示的《骄阳不再》；等等，等等。这些小说，有的仅仅以财经为背景，有的只涉及到一两起财经事件的勾斗，有的是写财经巨子商界富豪的家庭生活。但是，也有一些是比较具体地写到年青一代白手起家，或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突然省悟，毅然走出江湖。也有一些写到受了欺侮之后，存心报复。总之，这些小说让你看到刀光剑影，杀戮沙场。这里有战云密布，有人海沉浮，有强人泪涌，有豪情难全，有时也会雨过天青，但更多的还是人际较量，它们都让人惊心动魄，低首回思。

恩怨——刀光剑影，成王败寇

从财经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写得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能够看出商场上各种阴谋毒辣、陷害与报复手段的，应数《九重恩怨》和《千堆雪》，其次是《醉红尘》和《笑春风》。《千堆雪》和《九重恩怨》是姊妹篇，都是写名城巨富江福慧家族的故事。在《千堆雪》中，杜青云布置的骗局是暗写，表面上他和江福慧的爱恋如胶似漆，最后才知道这是他和陆湘云合谋的复仇计划，弄得江福慧损失了七亿港元而心肝欲碎。《九重恩怨》则开宗明义写江福慧非复仇不可，布置了天罗地网，使杜青云和陆湘云走入圈套，跌得粉身碎骨。作为财经小说，它的布局、计划、行动是比较具体的。从杜青云来说，一是他把从江福慧家骗去的钱，约四亿投资联艺，而联艺一方面申请投资加拿大，买入温哥华区内的列怡文一块地皮，兴建巨型货仓。这样，他就可以拿这个计划向有意移民的港台人士兜售，集资一亿加元，三年后才需归还。二是杜青云在新界希望补地价以兴建商住楼宇，以及把机器搬入大陆。更重要的是菲国加丹矿务筹组上市，联艺企业想以最优惠的条件获得开采办权的合约。

江福慧的布局是：通过富达经纪行设在菲律宾的分支，让联艺企业获得开采办权的合约。通过香港的高官夏理逊，在他任内拖延批准杜青云在新界开发的计划。通过加拿大富德林银行主

席史提芬吉拿，拖延杜青云的投资计划。然后，以菲律宾邱仿尧、单逸桐兄弟的企业，出面收购杜青云的联艺企业，把股票抬高。这使杜青云以为邱仿尧为情所驱，进行反收购，把杜青云的资金缚在联艺的股票上，不断高企，逼使他向银行贷款补仓。接着，单逸桐宣布放弃收购联艺，使股票大泻，让杜青云跌得头破血流。江福慧为了要收买霍守谦，替他找到大陆失散的女儿，答应事成之后，他可以持第一百支玫瑰花插进她卧室的床头。为了要加拿大史斯吉芬拿的父亲帮助延迟批准杜青云申请投资加拿大的计划，她花了十万元加币买了一幅程十发的画送给老吉拿先生。为了要香港的夏理逊帮忙拖延批准杜青云在新界的计划，她花了七十多万英镑在伦敦威士达区买了花园洋房作为礼品。为了要单逸桐出面收购联艺企业，并勾引陆湘灵以出气，她答应事成之后放弃心爱的邱仿尧，彼此不再见面。总之，心思用尽，手段不拘，一切为了寻仇报复，为了雪去心头之恨。这个财经计划设计得非常周密，令人看到财经巨子的险恶用心，也令人看到所谓女强人在爱情与事业上是如何抉择。尽管江福慧的内心有矛盾，有不舍，有悔意，但在行动上还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金钱的法码，到底重过感情的分量。

《醉红尘》写杨慕天如何用极端自私的手段从一个偷渡犯爬上高位；又写被遗弃的庄竞之如何成为菲律宾富商遗孀，寻仇报复，使杨慕天倾家荡产而入狱。小说的前半部写杨、章幼年生活、偷渡过程、在底层挣扎的情景，比较一般。后半部，庄竞之以12亿元巨款，夺了杨慕天之标，投中巨大花园住宅，是写得有声有色的。特别是庄竞之最后几下板斧，写得很诡谲：一是让杨慕天跟妻子离婚，分掉他的一半家产；一是让杨慕天收购股票，使永盛企业成为杨慕天的独资机构；一是办妥庄氏集团的资产估值及核数，让永盛企业成倍提高价格收购庄氏产业，然后再跟美捷商行订意向书，准备卖给美捷。这一耍弄，杨慕天的产业只剩下20%。事成之后，庄竞之去警局坦白，承认指使会计师在估产中作假。法院判庄竞之入狱十八个月，而杨慕天却坐牢五年。这也算是一个奇女子了。

《笑春风》则是写两家富户争夺君度大酒店股权的斗争，同样耍弄阴谋，使对方措手不及而倾家荡产。史俊杰要抢夺司徒家的财产，主要布置

了如下圈套：一是劳子均受命于史俊杰行事，他知道自己妻子史俊文与司徒震有私，便找司徒震谈判，要他把君度酒家15%的股权交出来，便可成全他们。史俊杰与司徒震有染，要司徒震交出10%的君度股权，以换取连达贺兰莎与史俊杰离婚。这样，史家控制的股票（司徒震的股权也计算在内）已有30%。而司徒家的则锐降至35%。只要暗地里再买5%的股票，提出全面收购，就可以把君度酒家的管治权夺取过来。接着，史俊杰收买了在司徒家服务多年的股票代理人江华，要他故意把司徒家的股票抛出，然后把股票炒高，使司徒家无法补仓。结果，司徒家也就破落得不堪了。作者把这一故事说成是大顺大逆之轮回，有点宿命论的味道，我可不敢赞同。但是，小说让人看到了商场中的狡黠、奸诈、你吞我夺、不择手段的种种伎俩；也看到爱情有真有假，真也不必如醉如痴，假则更须提高警惕，别过份天真。这多少写出了股权占有和掠夺的风云变幻，以及内中奥秘。

心态——生活压力与迎接挑战

不过，梁凤仪的小说多数还是以财经为背景，主要写香港人在九七前过渡期的各种心态，以及他们对家国的情怀。在这方面，以《尽在不宣中》和《花帜》较有特色。《尽在不宣中》写一个金融巨子练重刚追求另一个企业家的助手程梦龙而不可得之事。程梦龙与众不同之处，是坚决维持一点自尊，这也是她最能炫耀人前的了。她不贪图富贵，不爱慕虚荣，而是毅然辞职，一心写作。三年后，她的第一本小说《尽在不宣中》出版了，首先送一本给练重刚，感谢他给了一个考验自己的机会。这个程梦龙，很有点作者自己的影子，至少显示了与作者一致的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显示了与作者一致的性格特点和内心的矜持，也概括了当代职业妇女的愿望与要求：自尊、自立、自信和自由选择。《花帜》是写当代奇女子杜晚晴的故事。她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回到香港后却操了她外祖母、母亲的为娼旧业，成为本城内首屈一指的交际花。她很讲义气，也很讲交情，对于第一个扶她出道的恩客顾世均，不着痕迹地帮助他渡过难关。而对政府高官的嘴脸和伎俩，却揭露得颇为深刻。从财经风云的角度来看，小说揭露了有人因外汇汇率变动很大而大获其利，原因在于政府里总有人

把消息外传，广大群众却白白蒙受损失。美联银行即将倒闭，政府官员却故意宣布没有问题。这充分暴露了过渡时期港英当局为了敛财而要尽手腕，点出了风云的根在政府的操纵。杜晚晴这个人物有一定的传奇性，但作为一个留英大学生而自愿操此职业，似不大可信。杜晚晴的性格缺乏一贯性，前面很冷静，很有决断，玩别人于股掌之间；后面一遇到政府高官洗崇浩，一投入恋爱，则完全丧失理智，连一些最明显的事实，也缺乏分辨能力，完全相信了洗崇浩，难道这就是爱情？

在写临近九七，揭露洋鬼子阴谋方面，《强人泪》有颇佳的表现。商界巨子赵一波，是在英属殖民地的香港白手起家的。原先与外资利必通银行的关系甚好，但该银行因九七临近，不断培植新势力，赵一波已逐渐失去作用。他一连吃败仗，他的后继岳母马淑球偏又告到证券监理处以及商业罪案调查科，认为赵一波有意使股市萧条，以利必通银行股票的假象愚惑欺蒙大众。正当赵一波需要洋鬼子救援的时候，利必通银行的领导人却说着冠冕堂皇的话，不愿参与其事。这真使赵一波欲哭无泪。《我心换你心》则是写两个现代女性与一个男人的关系和心态。汤明轩的妻子盛颂恩大学毕业后，当了家庭主妇。她对丈夫的同事丁逊君的能干甚为艳羡。当她看出丈夫确实与丁逊君亲近之后，便毅然走出厨房，去舅父的股票行当经纪人。丁逊君却因老板不主持公道，愤然辞职，与汤明轩结婚而当了家庭主妇。丁逊君起始是红，是热，是强；盛颂恩与之对比，是淡，是冷，是弱。当盛颂恩成为女强人之后，这个对比又反过来了。这种心态，用作者序言的话来说，就是“二十世纪末生活压力随时代的进步，而倍数越增，不论哪一个阶层的人，都疲于奔命，不住要强迫自己忍痛隐藏甚至埋葬柔情热泪，强颜欢笑去迎接生活上五花八门的考验和挑战。”小说以车行和股票行为背景，写她们的心态，她们那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写出每个角色都有其委屈与凄惶之处。这也是现代都市女强人的某一侧面的写照。

奥秘——传统与现代的嫁接

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属于通俗小说之列，但不同于一般的通俗小说，而属于较高品位的通俗小说。首先，在内容上，它写了当今香港社会生

活。这是一个在商言商的社会，一切家庭关系、婚姻恋爱、朋友交往甚至夫妻感情，都离不开商场的利害关系。这种崭新的内容，就不是过去一般的言情小说所具有的。内容的另一方面，是它传递了香港临近九七过渡时期的许多最新的信息。这些信息为祖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和认识香港提供了一批直观而又丰富的感性材料。例如，国商银行倒闭事件，新机场风波及英资投标工程，汇丰迁册及与米特兰合并，一人一票的直选，九七移民……这些震动香港人心的事件，在梁凤仪的小说中都有所反映。虽然只是点染，却打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这就冲破了一般言情小说狭小的个人感情圈子，而牵动着读者的心灵，提高了小说的认识价值。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香港的神史来阅读。在内容上还有一个特点。由于梁凤仪在财经界多年，不仅对财经界的种种阴谋诡计很熟悉，而且对某些财经巨子与港英政府勾结，港英政府在九七前过渡期如何搜刮民脂民膏，为英国增加国库储备，以及建立机构，布下棋子，以便在九七之后仍然能够维护英国的利益和扩大其影响的种种行径，也能了然。因而其小说颇能捕捉要害，虽点到即止，却也能起明目清心的作用。最后一点，是由作者的经历与学识决定的，作者以她特有的敏锐感觉，写出了女强人的内心世界。有些小说，如《惆怅还依旧》，作者在自序中极力否认女主角是她本人，但是她承认“用了个人的感情、感慨、感受、感触去创作、描绘和刻划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这倒是千真万确的。”至于《异邦红叶多》，也是写出了作者的“千万重感慨”。她是加拿大移民，在异邦居住了一段日子，耳闻目睹许许多多的移民故事，无不深惑于心，所以写下了这年代的一页移民血泪史。其他几部小说，写到女强人的艰苦奋斗，写到她们的成功与挫折，写到她们的内心矛盾与苦闷，又何尝没有带上作者个人经历与心态的印迹？

其次，从写作技巧来说，梁凤仪的小说以传统小说的写实性和现代小说的明快节奏相结合，既重视了故事情节的跌宕，更重视了人物感情的波涛，因而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这大概是得益于晚清小说的启发，或者说是吸取了晚清小说所以流传不广的教训。梁凤仪在大学学的是历史，她的博士论文却是以《晚清小说的功能》为题。晚清小说有二百多部，她想尽办法把这些书找来

看，除了《老残游记》、《孽海花》等十多本写得比较生动之外，大多数的作品都文笔粗糙，结构松散，内容杂乱，因此在文学史上评价不高，也很难流传下来。“然而在历史的角度下，仍有保存及研读的价值。那是因为它们能忠实地报道时代的种种人情物理和社会现象，从而唤起全民觉醒，面对家国困难，知所进退，并使后世了解清末的时势政情，民间疾苦。”（《尽在不言中》自序）因此，她从中得到了启发：一是以环境资料反映时代实况，要写出人民群众对国家前途与民生福利的深切关注，而不能囿于个人感情的小圈子，只写杯水风波。二是必须写得生动，好看，使人能够爱不释手。所以，她运用前半生累积的生活素材融汇于创作小说之内，描绘出读者熟谙和亲切的角色，编排他们似曾相识、或感同身受的情节与故事，以提高趣味性与可读性，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开拓了一条新的写作路线与风格。小说的句式很短，段落很多，不分章，不列节，一气呵成，又跌宕多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单靠故事情节吸引读者，而且更注意用感情线索来拨动读者的心弦。故事情节可以猜测，可以审视，感情线索却只能顺应，只能感动。你明知她是痴情，却仍然同她一起沉浸在悲喜之中。你明知她只能这样结局，却仍然同她一起踏上征途。这就是写情比写事的优越之处。从总体上来说，梁凤仪的小说是写得很好看的，而且会使你一本一本的追着看。我想，除了她的文笔优雅，在语言上很下功夫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以崭新的面貌吸引读者，以强烈的当代精神牵动读者的心。这九七前过渡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这瞬息万变的香港市场经济，这各种人物的精神世界，都使你不得不关心，不得不注目，而且会引起你的思索和共鸣。

遗憾——未能切入财经的内核

但是，我不认为梁凤仪的小说已经写得很完美。其中，我最感到不满足的，就是对经济内容的描写还显得淡薄，未能让人通过小说进一步看到经济领域的某一行业在现代化管理下的运作情况，使人对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更具体和深刻的印象。如《芳草无情》，对华资百货公司的运作情况就介绍得不多；《昨夜长风》，对现代化的大商场也只是作为背景交代；《信是有缘》，写了创业的起始阶段，对后来经营旅行社，也只是虚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孙 立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

—

“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

虚的带过。其他的十多本小说，大都存在着“财经不足”的问题。我想起加拿大籍作家阿瑟·黑利也写了大量的以经济为题材的小说，他的作品，除了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外，他所写的事件还蕴含着大量被现代企业家们视为金科玉律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道。例如，黑利的第六部长篇小说《钱商》，出版于1975年。作品通过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活动，形象地展示了现代资本主义银行企业如何经历新旧两种经营观念的斗争交替而走上适应市场变化，处理好企业利润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的道路，完成向新型银行蜕变的过程。他的其他几部小说，都是切入了经济生活的内核，反映了经营管理的状况，为我们了解西方社会提供了“窗口”。如《大饭店》，反映了旅游饭店经营管理状况；《汽车城》，反映了汽车工业经营管理状况；《航空港》，反映了机场成为独立经济实体，与民航分开的新的经营之道；《烈药》，反映了医药行业的经营管理；《超载》，反映了能源电力行业的经营管理，等等。梁凤仪小说的不足之处，恰恰在于她只是把财经作为背景，重点还是在于写大都市缠绵复杂的爱情和人际关系，还没有真正切入财经的内核，还未能做到写财经这一行的现代经营管理之道。是不是写了财经方面的内容，读者就不爱看，就会影响作品的销路呢？我看不见得。黑利成为美国

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

“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

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历久不衰。甚至读者见到他，都情不自禁地说：“你肯定行过医……经营过旅馆……当过机场高级职员……从事过汽车制造……担任过银行经理”。其实，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位作家，但是却以调查研究深入和背景材料精确而闻名。梁凤仪倒是女强人出身，现在也还担任永固币业集团董事，依然在商界大展才华。她要写出切入财经内核的小说，应该说不困难的。关键在于怎么写，怎样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茅盾的《子夜》，何尝不是切入了证券交易所的内核，赵伯韬与吴荪甫在买空卖空上的斗法，不也写得很具体么？然而，这两个人物形象给我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梁凤仪不久前在广州举行的作品讨论会上曾经谈到，她写的这一批小说只是作为一种准备。她所以拼命写，是因为只有写得多才能写得好，工多艺熟。她希望以后能够写出一本大书，内容是对临近九七前过渡期的局势、政情、经济以至民心，提出有建设性和具体意义的剖释与意见。这是一个好信息。我热切期望，这本大书能够早日写出来，而且能够真正切入财经的内核，为我们了解当前香港社会提供“窗口”。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陶原珂

者必须考诸史乘，撮其要义，以自家心理体悟阐发，才能变抵牾为无碍。读《诗》也是如此。刘向诸多著述中，引《诗》多据《韩诗》（参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江苏古籍影印本），以撮取《诗》中大义为主，并不拘于字词原有的意义。说明刘向论诗，也主“《诗》无达诂”。

“诗无达诂”的理论产生于西汉，与当时《诗》学的传统有密切关系。西汉《诗》学，自武帝起，“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轵固生，于燕则韩太傅。”（《史记·儒林传》）三家诗均属西汉经今文学派，说诗以微言大义为主，不专注于章句训诂，与后起的古文家《毛诗》面目不同。三家诗今已亡佚，现仅存《韩诗外传》。《韩诗外传》虽不专在解《诗》，但由其引诗，可见出它与今文学派的诗学倾向。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华书局排印本）云：“《史记》称‘韩生推诗人之意，为《内》、《外》传数万言，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所谓‘其归一也’者，谓三家《诗》言大指不相悖耳。”说明《韩诗》内、外传与齐诗、鲁诗虽有小异，但其治经的途径与寻绎微言大义的方法大致相同。《外传》采孔子之言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触类引申，断章取义，不专于解经，不拘于章句，专取《诗》义之大较者。如《外传》（中华书局本）卷一第七章，以不仁、不忠、不信者当杀无赦，来发明“人而无礼、不死何为”的诗义。从阐释学的角度而言，它不符合由字到词、由词到句、由句到义的正常解诗程序，是抛离章句、直揭本原的解诗方法，与《毛诗》马注郑笺立足于章句训诂的方法大相径庭。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本，下同）认为《韩诗》是“推演诗人之旨”，所谓推演，就不是丁卯分明的精解，而是借题发挥、举一反三。他还认为三家诗“所以有用者在精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微言大义。”清楚地说明了《韩诗》等三家今文诗派有别于古文诗派的一个明显标志，是着重于用诗，而不是倾心于字斟句酌的读诗，是取诗“要言妙道”之精，而不是取“烦言碎辞”之博。这是《诗》今文学派的精髓和基本的诗学倾向。

基于这种目的，今文学家虽不废章句训诂，其取向却不在章句训诂，而在诗的微言大义；正象古文家虽不废义理，但却倾斜于章句训诂一样。为了通经致用，方便解诗者寻绎微言大义，今文家就不能固守《诗》的精解，而只能承认文本

的开放性与读者见仁见智的合法性。因为如果拘于章句，不许读者自由兴发，就在客观上堵住了说经者寻绎微言大义的路子。所以，今文家论《诗》虽各有门派，三家用语虽殊，但推演诗人之志，通经致用，却是一致的。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就是指在通经致用的前提下，训释章句、分文析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在以《诗》为用，以《易》为用，以《春秋》为用。这是今文学派的共同特征，也是西汉解经、用经的一般风气。昌邑王师王式面对昌邑王“行淫乱废”，不上谏书而以三百五篇为谏书，就是汉人取《诗》之微言大义以劝谏的一例（见《汉书·儒林传》）。在这种通经致用的风气下，以章句训释为要务，以精解定说为目的的古文家法也就没有市场，而主张“诗无达诂”、大义微言的今文学家却大行其道，①说明“诗无达诂”的产生与今文学派有着同源共脉的关系。

汉人“诗无达诂”的理论与《韩诗》等三家诗派“以己意说诗”的实践，一方面是吻合了当时客观情势之“缘”，一方面也自有内在之“因”，这就是春秋以来赋诗断章的风习与孔门说诗的传统。春秋鲁定公以前，君臣外交谈判，燕享酬酢，常赋《诗》言志。所引之诗，虽为当时人所熟习，但引诗者却别有所指。《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卢蒲癸言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就是当时引诗言志的通例。引诗者的引用虽不合诗之本义，但听者会心，皆能明其所指。《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七子赋诗言志，人赋一首，赵孟听了，居然能通晓其义，一一作覆。这种情况在《左传》多有记录，说明春秋时“以己意说诗”非常普遍。春秋断章赋诗，与汉人引诗、说诗，都不是出于文学鉴赏的目的，而是政治和社交的需要。即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于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汉人说诗的“咸非诗人本义”（《汉书·艺文志》），在春秋断章赋诗的基础上又发扬光大，董氏的“诗无达诂”则使这一现象理论化、合法化。

孔门说诗，最重读者自悟，商、赐深得孔子赞许，就是因为能对诗义有新发明，善于用诗。子贡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引证“富而好礼”，被孔子称为“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学而》）子夏以“礼后乎”体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也认为“起予者商也！”（《论语·八佾》）《孟子》一书引《诗》三十，论《诗》者四（据

陈澧《东塾读书记》，皇清经解续编本），也多有断章取义，以诗证史者。他所批评的“固哉高叟”，与其主张的“以意逆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读书原则，无一不是倡导读者积极参与阅读的精神。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六更举出《孟子》、《坊记》、《中庸》、《表記》、《缙衣》、《大学》等儒家典籍引《诗》者，多似《韩诗外传》，并说：“其于诗义，治熟于心，凡读古书，论古人古事，皆与《诗》义相触发。”说明自春秋至汉千余年中，儒家读《诗》用《诗》的风习一脉相传，绵延不衰。这对“独尊儒术”的汉代经生来说，无疑有巨大影响力。“诗无达诂”的理论正是儒家说诗用诗传统的承传，是孔子以来儒家学术思想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也是汉代经今文学派学术趋尚滋润的结果。

二

自东汉以至北宋，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诗无达诂”的理论几成绝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有多种，但学术思想与学术趋向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以来，随着今文学派的没落，古文学派的崛起，“诗无达诂”遂失去了它赖以继续成长的土壤。其间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在西汉末年有刘歆，东汉有郑玄。刘歆是古文经学派的创始人，自称发现《周礼》、《左传》、《毛诗》等古文经，并提议立为学官，但当时遭到今文博士的抵制。王莽篡政后，始立古文经博士，《毛诗》取代三家《诗》，《左氏春秋》取代公羊、谷梁，并立为学官，预示着经今文派的式微。东汉，郑玄又加强了古文家的优势。郑玄早年入太学学今文，后转从马融学古文。郑曾为《毛诗》作笺，内容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被李兆洛指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李兆洛为清常州今文经派的后学，他指责郑玄败坏家法，实则攻击他倒向古文一派。自郑笺风行以后，三家今文诗派更一落千丈，皮锡瑞所谓：“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经学历史》第149页）古文学派的兴起，今文学派的衰落，显示出一代学风的转变。在这一更迭中，今文学家倡导的一字褒贬、微言大义的治经方法被古文家们目为“专己虚妄”、“党同妬真”（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四十，中华书局缩印本），从学术思想到治经方法均受到古文家的抨击。在这种风气之下，“诗无达诂”失去了经今文学的支撑，也就无回天之力了。

延及魏晋，经学又为之一变。但这一变化，并非由古返今，而是古文家的地位进一步确立。其间关键人物为魏之王肃，王善古文家贾、马之学，本与郑玄师出同门，但王不满于郑学之属入今文，故大加攻讦。攻讦的结果，是由魏到晋，古文家学更为盛行，今文学派进一步衰落。晋永嘉以后，“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隋书·经籍志》）可见今文经学在魏晋已成昨日黄花。到南北朝，经学分为南学与北学，而南北二家于《诗》亦“并主于毛公”，于“《公羊》、《谷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北史·儒林传》）北朝习《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刘兰甚至排毁《公羊》，直斥董仲舒之虚妄。而其时江左习王弼、何晏玄虚之学，晚岁更以文学自矜，多学释氏，今文学更置而勿论。总之，自魏晋以来，定于一尊的儒学崩圯，今古文的纷争，外来佛学，以及本土老庄的冲击，使学术思想处于诸侯力政时期，驳杂而未有一统。今文学家在交锋中败下阵来，使“诗无达诂”的理论失去了立锥之地。

当时的文学理论界正处在繁荣时期，但诸家对“诗无达诂”均未置一辞，足见今文学派的衰落对“诗无达诂”理论所造成的冲击之大。此期数位大家之中，曹丕、陆机、钟嵘三人未见染于经学，于今文学家更无干系。刘勰《序志》一篇，言及注经，对古文一脉，颇有赞辞，所谓“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征圣》、《宗经》二文，《诗》用毛诗郑笺，《春秋》用左氏传，说明刘勰所习经学，为古文家法无疑。古文经学虽以章句训诂为主，但自郑玄以来，兼采今文家说，故于解经之中，也有即经明理，即事说义者，如《公羊传序》、《谷梁传序》、《左传》序中均有“一字褒贬”之语，《毛诗》与三家诗也都以诗证史，寻绎微言大义，此乃儒家学术的共性。故刘勰在《宗经》、《征圣》诸文中，也言及“明理以立体，隐义以藏用”。“《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征圣》）“诗主言志。……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宗经》）说明刘勰所取资的是兼采了今文家说的古文学派。但古代经学，最重师法门派，今古文自东汉以来，虽驳杂，但在治经的方法与义理的讨论上仍有很大区别，古文家对今文学的“诗无达诂”也

颇不以为然。因此,在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今文派日益衰落的时期,刘勰追寻的无疑还是郑马一派的古文显学,他对董氏的“诗无达诂”未置一辞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魏晋南北朝虽属文学自觉时代,但文学的独立尚处于“草创未就”阶段;诗人在为文学挣脱经学、史学的束缚而制作美文;文评家忙于为文学正名,为文学立体,目光多集中于辨析文体、研讨诗文体性,品评作家作品等方面,对读者的接受与反应未能倾注更多精力。所以,这一时期的文论家更多地关心文学的创作与形式问题,诸如文笔的区分;作家的构思、兴感;文学表达的言与意;文学形式的联偶、声律、夸张、用典、字形等。即使有论者偶然涉及文学鉴赏,也多从追寻文本的定解与客观性入手,反对读者各取所需、偏尚己好。象曹丕《典论·论文》讥讽贵远贱今,矜于自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对慷慨者、蕴藉者、浮慧者、爱奇者“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的风习十分不满,说明他们均以作品的客观存在为鉴赏和批评的出发点,对“诗无达诂”的现象有所发现,但颇有微辞。曹植《与杨德祖书》引丁敬礼语云:“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知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言辞之间,流露出对后世读者误读已作的隐忧,但仍认为“文之佳恶,吾自得知之”,与后世读者无关。再象葛洪说:“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抱朴子外篇·尚博》)虽然暗含了文学作品有多义性的思想,但在理论上并未与“诗无达诂”联系在一起。说明当时文评家并没有意识到文学作品“言不尽意”“文蕴复义”的特性,与读者理解不一致之间的关系。此外,当时学界盛行的王弼《易》学、何晏《老》、《庄》之学与外来佛学,对文学理论虽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但范围也多集中于对诗体的认识方面,没有兼顾到读者反应不一致的问题。如陆机的“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谢灵运的“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耳。”刘勰的“文外重旨”、“义生文外”,钟嵘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均指作者与作品,或作品的言与意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些说法虽与“诗无达诂”有联系(如“义生文外”、“文已尽而意有余”),但诗论家本身并未意识到这种联系,更未见有人对“诗无达诂”的肯定或提倡。这一现象,说明在汉儒影响日渐衰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家为

争取文学的独立,眼光多集中于文学创作和对文学体性认识方面,而不是通经致用方面。

入唐以后,诗文等创作空前繁荣,学术发展相形失色。唐一代诗论,在魏晋六朝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及众多散见的诗论,对诗的艺术特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但对读者的接受反应,依然鲜见明显的说辞。诗论家对诗体的体味是精微的,发掘出诗体所具有的“二重意”、“味外之味”、“象外之象”的特性。对诗体的这一认识,与理解读者感受的多重性、合理性只有一步之遥,但他们均未能跨出这关键的一步,未能将诗体与诗对读者的多重感发性结合起来,“诗无达诂”的理论并未随着人们对诗体认识的加深而复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诗论家关注的仍然是魏晋以来所关注的对诗的创作和品评的问题,未能将读者的反应拉入视野之内;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与“诗无达诂”相关的经学研究陷入疏注的泥潭,学术研究缺乏蹈厉风发的主观探索精神。唐代科举有明经一科,但所谓明经取士,仅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本,士人只能在疏注方面讨点残羹剩饭。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186页)“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207页)这种固守经书的风气,窒息了一代学人的理性思维,使唐代学术在历代之中最乏善陈,而疏不破注、注不破疏的治经方法,又使倡导读者自悟的“诗无达诂”理论失去了市场,以致唐一代有关读者见仁见智的诗论也非常鲜见。

三

“诗无达诂”的说法自宋人开始又多了起来,其契机是程朱理学的盛行。北宋初几十年,学术一仍东汉、唐以来的章句传注之风,“谈经者训诂而不啻”。自庆历年间,经学“始一大变”,不拘古义而明义理(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四部丛刊三编本),为学术研究开创了新风气。在哲学思想上,周敦颐、程颐、程颢发轫于前,远绍孔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学说,又摭取王弼《易》学及佛学经义,倡导以“理”为中心的主“诚”、育“静”、明“理”的思想,张扬人的主观精神。在学术思想上,也继承孔门重内省自悟的传统,重新拾起今文学派的治经方法。皮锡瑞说:“宋人不信注疏”(《经学历史》第264页)“宋以后,非独科

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同上第274页）这一时期的众多学人，诸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刘敞、王安石等，均有讥经疑古之作，昭示着经学变古时代的到来。这一学术风尚，又经过南宋朱熹的进一步推波助澜，明代王阳明“心学”的确立，清代常州经今文学派的张扬，一直延续了几个朝代，为“诗无达诂”理论的复苏提供了温床。

宋明理学家不仅以其思想开创了一代学风，其读书解诗的见解也对“诗无达诂”理论有直接影响。二程说：“见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其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小邨环山馆《二程全书》本）这与汉唐以来拘于章句传注的学风有明显区别，而与孟子“以意逆志”的读诗之法非常接近。再如“思，方有感悟处。”（《二程集》第186页，中华书局本，下同）也与《大学》“虑而后能得”的思想一致，均倡导读者的主观精神。重视读者主动参与阅读的结果，是把文本视为开放性结构，而不是终极不变的绝对真理。二程以为，“圣人之言，其远入天，其近如地。”（《二程集》第205页）也就是说，圣人传下来的“经典”，是以读书人的学养、性情的深浅远近为转移的，即所谓“理只是人理”（同上），是靠人体会的。这一读书解经的指导思想，与孔门说诗的重在读者自悟非常吻合，与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解经方法也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二程更认为：“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二程集》第377页）这一分别，大有深意。《诗》、《易》、《春秋》是被经今文派认作圣人一字寓褒贬的微言大义之作，所以往往发抉幽隐，以寻绎微言大义为务。二程以为《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与《尚书》、《论语》不同体类。联系董子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说法，其前后相承的关系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是，程门四弟子之一的杨时对读诗有着时人所不及的看法：“仲素问诗如何看？曰：诗极难卒说。大抵须要人体会，不在推寻文义。……惟体会得，故看书有味，至于有诗，则诗之用在我心矣。”（《龟山先生语录》四部丛刊续编本）这一说法，自东汉以来未曾见过，不能不说是二程影响的结果。

再看朱熹，他除了大胆驳弃古文家章句之说外，也有大量有关读诗解诗的具体论述。如《朱子语类》（中华书局本，下同）卷八十一说：“解

诗，多是推类得之。”又云：“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均以读者之兴与推类为依归。所以，对《诗·郑风·溱洧》一诗，他在《诗集传》中记为：“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辞”，是对文本的“客观”解释。而在另一处又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吕氏诗记桑中》四部丛刊本）说明读诗应靠自家的心理去体味辨析，是非优劣，予取予舍靠读者自身的判断。朱熹早年学《诗》，亦主毛郑古文家学，及见郑樵《诗传辨妄》专攻毛郑，极诋《小序》，始改从郑樵之论，自变前说。其《诗集传》即后期自家心得，在不少地方拨开汉儒乌烟瘴气之说，还《诗经》的本来面目，在《诗经》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在《诗》学研究的成就，与他不师古人，倡导内省自悟的学风是分不开的。

古人云：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诗无达诂”的复兴正有赖于宋儒对古文家章句之学的廓清。在程学与朱学取得学术统治地位之后，与“诗无达诂”相类的说法逐渐多了起来，与北宋初年以前的沉寂形成鲜明对比。南宋刘辰翁说：“凡大人语不拘一义，亦其通脱透活自然。观诗各随所得，或与此语本无交涉。”（《须溪集》卷六《题刘玉田题杜诗》四库全书本）言辞、语气与朱熹非常相似，反映了当时普遍的学术风气。其子刘将孙更上溯春秋赋《诗》传统，为之张目：“古人赋《诗》，犹断章见志，固有本语本意若不及此，而触景动怀，别有激发。”（《永乐大典》卷九百七十引刘序王荆公《唐诗选》中华书局缩印本）不仅倡言读者自得，而且涉及诗体能令人“触景动怀，别有激发”的特性。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本）卷八更申论好诗能提供给读者多侧面的视点：“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只把做景物看，亦可不把做景物看。”将读者的主观阅读与诗体的客观多样性兼而论之，尤见深入。说明“诗无达诂”的理论在南宋时期更多地与读者的感受与诗体的特性结合起来，已不限于汉人所承认的读者多重阐释的合法性。这是值得注意的倾向。

明代由于心学的推动，“诗无达诂”理论更风行于世。王阳明在阐扬人的主观精神方面，比程朱走得更远，这方面的论述已多为人知，故仅录一段王阳明论对待圣贤之书的文字，以见一斑：

“门人有私录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王阳明《传习录》徐爱《序》，四部备要本）其意在劝戒门人应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精神去对待圣贤之书，②实际上也就是提倡读者以一己之心去自悟自得，不要拘守经义。这种理论虽有偏颇，但它对启发读书人的心智，解放被禁锢的思想，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在整个明代，先是程朱理学的影响，接着又受陆王心学的熏陶，读书人对解诗有了更通脱的看法，对“诗无达诂”以及“诗无达诂”与诗体的关系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如何良俊说：“余尝谓《诗经》与诸经不同。故读《诗》者亦当与读诸经不同。盖诗人托物引喻，其辞微，其旨远，故有言在于此而意属于彼者，不可以文拘泥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四友斋丛说》卷一四库全书本）又说：“《左传》用诗，苟于义有合，不必尽依本旨。盖即所谓引申触类者也。”（同上卷二）所说比前人更进了一步。胡元瑞在《诗薮杂编》（上海古籍本）卷五中，对诗注与作者意不尽符也予以肯定，理论上与南宋刘辰翁父子相呼应：“千家注杜，犹五臣注选。辰翁评杜，犹郭象注庄，即与作者意不尽符，而玄理拔骚黄化杜之外。”言辞之间，颇有激赏。此外，明人中如谢榛、张岱、钟伯敬、王船山（亦深受宋明理学浸淫）等人对“诗无达诂”也多持肯定态度，在理论上更有更深入的探讨，限于篇幅，不再作引。

总之，由于宋明两代哲学思想与学术风尚的转移，在理论上与之相通的“诗无达诂”一说遂姻缘结合，逐渐发展成一个能够体现诗体特点，并符合文学阅读规律的诗学范畴，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到了清代，这一影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由于清代今文学派复兴，使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更加发扬光大。其间提及或肯定这一命题的，如：贺贻孙、叶燮、沈德潜、李渔、吴省钦、曾异撰、王先谦、张惠言、谭献……这些理论家，有的从事诗学研究，有的倾力于戏剧研究，有的则是经学家。尽管身份不同，研究对象有异，但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对“诗无达诂”的现象

进行总结和阐发。其中有的结合诗体的艺术特性，分析读者见仁见智的多样化现象（如叶燮《原诗》、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有的则通过选本批评，倡导读者要能生发作者之意（如张惠言《词选》）；还有的复兴汉儒的《诗》学传统，以读者的无定解为标尺（如曾异撰《纺授堂文集》卷五、卢文昭《抱经堂文集》卷三所论），从诗学渊源上认定“诗无达诂”现象的合理合法。总之，清代诗学比起前代更重视读者的再创造活动。他们的理论，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新的开拓和创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诗体的不断成熟，使人们的认识更为深切；一是宋明以来学术风尚影响的必然结果。此外，清代经学的发达，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代经学，在清初能兼采汉、宋，显示出独立不羁的学风，对学术研究颇有好处。嘉庆以后，今文经学复兴，在常州一带，形成重镇，影响深远。张惠言为常州词派创始人，也是经今文学家，擅虞氏《易》。他本人及后学论词，均主比兴寄托，倡言读者的主观再创造，显示出今文经学与“诗无达诂”的内在联系。常州派后期理论家谭献，晚年应张之洞之邀，主持经心书院，倾重于今文经学，在《复堂词录序》中主张“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也说明了经今文学的复兴对“诗无达诂”理论的拓展产生了较为直接的作用。其间的变化，显示出学术史的发展与一定的文学范畴有着内在的联系，值得我们注意。

①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云：“盖自东京中叶以前，博士弟子所诵习，朝野群儒所称引，咸于是乎在。与施、孟、梁丘之《易》、欧阳、夏侯之《书》、公羊、谷梁之《春秋》，并旁薄世宙者几四百年。”

② 王阳明心学中有不少释氏思想，已有学者指出。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啸艺说略

咎 亮

一、“啸”的历史发展概貌

中国信史时代以前产生的某些艺术，后人在研究时往往赋予它们以神秘色彩，啸艺也是如此。

“啸”，或谓之吹口哨。其兼有实际应用中的诸种法门，出俗入雅，复出雅反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

唐代孙广《啸旨》说：“老君授王母，王母授南极真人，真人授广成子，广成子授风后，风后授啸父，啸父授务光，务光授尧，尧授舜，舜演之为琴与禹，自后乃废。续有晋太行山仙君孙公获之，乃得道而去，无所授焉。阮嗣宗得少分。其后埋灭不复闻矣。”

《山海经》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

《淮南子·览冥训》“黄神啸吟”句注云：“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

神仙鬼怪之所以被裹挟到啸艺中，其原因主要是：一，古人不清楚啸艺起源，假托神怪，强作解词；二，著录啸事的多是小说笔记，虚构渲染是常用手法。

从现有材料中推断“啸”产生于春秋或更早的时代是合理的。《诗经》、《楚辞》中就保存了一些“啸”的记载，如“啸歌伤怀，念彼硕人”^①，“有女仳离，条其啸矣”^②，“其啸也歌”^③，“招具该备，永啸呼些”^④。见于其他著述的尚有鲁漆室之女、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人的“啸”，分别参见《列女传·仁智篇》和《吴越春秋》。虽然“啸”的独立意义不太突出，但有这么多的例证，足以说明“啸”已经比较发达。

两汉时期，“啸”大为发展，如《拾遗记》载：“因霄之国人皆善啸，大丈夫啸闻百里，妇人啸闻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则声清高，春夏则声沉下，人舌尖处倒向喉内，亦有两舌重沓以爪徐徐刮之，则啸声逾远。”这个材料说明，两汉之时，啸艺有以下发展：一是声音增高，音乐性更突出；二是啸济之于四时；三是啸法不止一种。比之先秦，两汉时期的啸艺新添了一丝淡薄的名士风度，《后汉书·党锢传序》中的成瑨坐啸早已成为与宓子贱琴治齐名的典故；《汉晋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有一老父独耕不辍。议郎张温使问焉，父啸而不答”。向栩的例子展现得更充分明朗，“英雄记”称“向栩为性卓诡不凡，好读《老子》，状如学道，又复似狂居，尝北坐被发，喜长啸，人客从就，辄伏不视。”在现存的有关材料中，这可能是最早、最明确地将啸艺与老庄思想联系起来的事例，魏晋时代啸者的傲然狂放之态在后汉时就开始孕育、发生了。

著录魏晋时代啸事的书很多，啸者不胜枚举，有姓名可查者不下二十人之多。他们以分明的个性情感，卓越的音乐造诣赋予啸艺丰富的艺术精神，曲折如微地折射出时代的面貌，共同建构了啸艺鼎盛辉煌的时代风度。“啸者，其气激于喉而浊谓之言，激于舌而清谓之啸。言之浊可以通人事，达性情。啸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出其啸清，万灵授职。故古之学道者重矣”^⑤。这个时期，汉儒思想全面崩溃，玄风日炽，“人的觉醒”是该时期的突出特点。为寻一隅之天地而品味人生，完美运用他们的才情，便创造和师承各种艺术，在这些活动中推尊个体情感的自由，求得解放，寻觅适宜主体的世界。魏晋时期的“妙象尽意”说，贬斥语言文字，促使人们进入艺术领域去找“尽意”的手段。由于啸“声不假器，用不藉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⑥，所以啸就是“妙象”，既可以“尽意”，又可以“穷理”。这是啸艺与名士相结合的社会及心理原因。

名士们所选择的多是些幽雅静谧的环境，如“游崇岗，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兰之猗靡，荫修竹之蝉娟”，这样的环境定然能使名士们心神欣愉。另外，名士们顺应四时的阴阳变化，“发徵则隆冬熙蒸，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霜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⑦。只要适时择地成啸，即可发舒郁思，遣散愁结，涤荡荡气，裨益身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啸艺才为名士所推重。

魏晋时代啸艺蔚然成风气，但不知何故，紧随其后的南北朝却默默无闻，直到唐代才重新出现其踪迹。《唐语林》记天宝末年峨嵋山陈道士能作“雷鼓霹雳之引”，啸声如霹雳；《唐书·崔咸传》记崔咸乘月吟啸；《甘泽谣》曰：“韦谔者，明五音，善长啸”。《云溪友议》记载一重囚因啸而性命得保的故事，从中也可想见唐代习啸者已经比较少了。

唐代以后仍有善啸者，如《宋史·柴通元传》中柴氏年百岁善长啸；《癸辛杂志》载潘牧呼啸；《元史·刘因传》称其父刘述好长啸；《列朝诗集小传》说徐文长中夜呼啸。但由于去古已远，除了长啸、呼啸，似乎别无所能，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了，大概古啸法已不为人所知所能了。

二、“啸”的方法

“啸”产生后，师承者颇多，也为研究者所注意，尤其是啸法衰落后，啸法的研究成为课题的重心。孙广的《啸旨》称引详备，论述最为周到。《啸旨》称“啸有十二法”：

外激：以舌约其上齿之里，大开两唇而激其气，令其出，谓之外激也；

内激：用舌以前法，闭两唇，于一角小启如麦芒，通其气，令声在内，谓之内激也；

含：用舌如上法，两唇俱起，如言殊字而激其气，令声含而不散也；

藏：用舌如上法，正其颊辅，端其唇吻，无所动用而有潜发于内也；

散：以舌约其上齿之内，宽如两椒，大开两唇而激，其气必散，故为散也；

越：用舌如上法，每一声以舌约其上腭，令断气，绝用口，如言失字，谓之越也；

大沈：用舌如外激法，用气令自高而低，大张其喉，令口中含之，大物含气，煌煌而雄者谓之大沈也；

小沈：用舌如上法，小遏其气，令扬大，小沈属阴，命鬼吟龙多用之；

正：用舌如上法，如言正字，高低随其宜；

叱：用舌如上法，如言叱字，高低随其宜；

五太：五太者，五色也。宫商角徵羽谓之五太，五少为应，故谓之五太，以配仁义礼智信，此有音之本，谓声音皆不逃五太，但以宫商发应，均使次序，理则声理，乱则声乱；

五少：五少者，五太之应。五太自有阴阳，然大权而言五太为阳，五少为阴，用声之至详，而后发凡。

孙广还用四时十二律观照了啸法，“十二法象一岁十二月，内激为黄钟，外激为应钟，大沈为太簇，小沈为夹钟，五太为姑洗，五少为仲吕，散为蕤宾，越为林钟，正为夷则，叱为南吕，含为无射，藏为大吕，律吕相生而成文，此则十二法之首也。”

啸法如此缜密，则啸之音声必然繁富。啸之十二法如孙广所言，“皆在十五章之内”，这十五章即啸的音乐章节，依次为权舆、流云、深溪虎、高柳蝉、空林夜鬼、巫峡猿、下鸿鹄、古木鸢、龙吟、动地、苏门啸，刘公命鬼、阮氏逸韵、正章、毕章。十五章是啸法的具体使用，在成啸的过程中，抑扬顿挫，阴阳交接，喜悲更替，清浊有别，长短错落，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构成了美的和谐。

三、“啸”的特质

据笔者统计，现存啸事材料，不计重复，共约六十则左右；除客观介绍啸者善啸、能啸、长啸的数十则之外，比较明确地表现出其感情性质的约三十则，而“悲”情调的啸事所占比重最大，有二十则之多。

从以下诸方面看，悲情调是啸艺的主情调。

第一，啸艺所模仿的动物之声，多是龙吟虎啸、鸢唳蝉鸣、鹤吭猿啼等悲愁苦痛之声，将其移置化入人啸之中，仍然保留了这一情调。如《南史·沈攸之传》所记，沈僧昭闻南山虎啸，而知国家有边事。国家有边事，则人民悲苦，志士心焚。古人对动物悲鸣的独到体会尤其值得惊叹。《杭州府志》记载南朝宋僧智一本来就善啸，又从猿啼中领悟到“哀松之韵”，《宋高僧传》说其啸声“杳入云际，如吹筋叶，若揭游丝，徐举徐扬，载哀载咽，飏飏凄切，听者悲凉”。

第二，从啸艺选择的音阶来看，《啸旨》明确点明啸艺承袭了师旷的清角、清徵之音。《史记·乐书》引张守节正义云“角声”“忧愁”，“徵声”“哀苦”，《记纂渊海》引《公羊传》云：“闻角声则使人恻隐”，所以在音阶选择上，啸艺也是以悲为标准的，故而五音繁奏，妙寓七情，悲是主情调。

可见，啸艺的主旨就在于表现那种“飞射哀咽”、“深沉郁没”，“郁结掩遏”^⑧的悲情

调。然而，在魏晋时代，“啸是形式，倨傲狂放才是它（指名士风度）的灵魂”^⑧，正因为这样，以悲为美的汉魏六朝人将悲情一点点地稀释到倨傲狂放之中，一定程度上掩饰了悲情调，有时候淡到品味不出悲来。

为什么啸要刻意表现悲情呢？钱钟书先生曾就“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者怪而伟之，故为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拭涕擎泪”^⑨而分析说：“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⑩。嵇康也注意到了这一规律性的特点，他在《琴赋》并序中指出：“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

汉魏六朝以悲为美，啸艺可谓典型。其实，似乎一开始啸就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一原则，和悲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鲁漆室之女因忧国倚柱而啸；商陵牧马之妻因丈夫欲别娶而中夜倚户清啸。基调一成，后世习之。关于啸的一些限定词如“萧然”、“怅然”、“肃然”、“愀然”等，不正包含了浓郁的悲伤情调吗？

四、小结

《啸旨》中有关啸法的阐述强有力地证明了啸的音乐性，众多的啸事材料无可辩驳地揭示了啸的抒情性；前者是理证，后者是实证，共同证明啸乃是艺术。

在提出啸艺具有强烈抒情性的同时，也不应否认它在一些环境中实用性很强，主观抒情性较差。正如朱光潜先生在《乐记与中国美学》一文所言：“‘艺’这个词在古汉语里和希腊文Tekne一样，有‘艺术’和‘技艺’两个涵义”。他还明确指出，在中国古代，人们“不但重视实用技艺，而且对艺术也着重实践方面，把它当作技艺来学，不但求知，而且求能，也就是说，不但为提高认识，而且为促进实践”。啸艺也是如此，一些啸者将其应用到非抒情领域，如招魂、求雨、命鬼、表演等，这并不影响啸艺具有抒情性特点。

正是在以上意义上，我认为啸是一种兼具音乐性、抒情性的艺术、技艺的结合形式，可以简称为啸艺。

①《诗经·小雅·白华》。

②《诗经·王风·中谷有蓷》。

③《诗经·召南·江有汜》。

④《楚辞·招魂》。

⑤、⑥《啸旨》。

⑦、⑧晋代庾公绥《啸赋》。

⑨孙机《魏晋时代的‘啸’》。

⑩东汉王褒《洞箫赋》。

⑪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九四六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 书评 ·

《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与应用》的理论特色

易杰雄 马 伟

张江明同志所著的《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与应用》(1990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理论与应用》)一书是作者近10年来在社会主义辩证法园地辛勤耕耘的成果。

该书视角新颖、思路开阔,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首先,这本书在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建构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如何建构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体系,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强求一致。虽然如此,《理论与应用》的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与探索,提出建构这一学科体系的理论出发点:“社会主义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应用和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新情况、新特点、新矛盾、新观点的哲学概括,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辩证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应用》第412—413页)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以非对抗性矛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有机体的矛盾发展及其辩证运动的规律,其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非对抗性矛盾,而它的最大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成为它们之间的桥梁和连接点。

《理论与应用》一书所展示的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虽属草创,但对该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书中的篇章结构设置,不仅勾画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雏形,为这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铺石垫路,而且其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理论与应用》一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辩证法领域的若干主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矛盾,作者认为,无论就矛盾的产生、性质、特点和解决的方法来看,社会主义

矛盾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社会矛盾。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产生、以非对抗性矛盾为主体、更多地表现为新的差别性矛盾的;同时,它有自己的演变过程和历史运动,有新的矛盾系统、矛盾类别和矛盾层次,需要采取新的方法——通过改革来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新型的社会矛盾还表现为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又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量变、质变(主要是质变),作者突破以前一些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质变,只是这种质变是有新特点、新内容和新涵义的。首先,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公有制较高基础上的质变,它能够达到较高的要求。其次,要按照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不同性质来进行质变。再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质变是向上前进的质变。最后,社会主义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体,它的质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应从实际出发,进行从公有制到公有制的质变。同时,作者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变有自己的类型、属性和特点,通过非爆发式的质变渐进性和逐渐过渡来完成。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个质变渐进性过程。

再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作者认为,从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公有制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公有制和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共产主义公有制都存在着自我否定。但是,这种自我否定是新型的自我否定。它的特点有:一、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居于统治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主动地自觉地进行自我否定,不是由另一个相对立的被统治阶级,经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来否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从低级阶段公有制到高级阶段公有制的自我否定;三、社会主义从公有制到公有制的自我否定,是向上的、前进的、永无止境的自我否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是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型的、采取非爆发式的形式,它有自己的模式、机制和层次。从总的来看,社会主义自我否定是个新陈代谢、除旧换新、波浪起伏、曲折前进的有节奏的运动。社会主义自我否定的总方向是经过一定过程、周期、阶段和具备一定条件,逐步地进到共产主义。(下转第21页)

宏观把握，专题掘进

——读丘进新著《中国与罗马》

李庆新

近年来，丘进博士潜心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继《七海扬帆》之后，又推出新著《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199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6万字，分8章，笔者有幸拜读，深感该书在理论阐述、研究方法、整体结构以及史实考察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以系统整体的观点建构起汉代中西关系的历史全貌。

近年来，随着学术的繁荣，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从云集于这一研究领域，创获尤多。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课题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主要是不少研究者在宏观上缺乏创新，局限于微观上的考释而显得单薄简略，或者依附于其它主题，成为通史、外贸史、交通史、航海史、文化交流史的陪衬或补充。本书则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作者以系统的、整体的观念谋篇布局，从更高的更全面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从第二章至第八章，依次论述了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中西交通形态、中西交往中的丝绸贸易、西域文明与汉代社会、中国文明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从而使汉代中西关系的历史背景、交通形态、文化交流等内容脉络清晰，厚重充实，不是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外贸史、交通史，文化交流史的拼凑，而是诸种关系有机的总和。

作者刻意以系统理论研究汉代中西关系诸问题，把各种关系置于中国和世界的大背景中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和动态的透视剖析，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作者在讨论汉代社会的对外开放的基础时，综合阐述了农业生产水平、铸造、纺织等手工业发展、中外交通状况、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状况，顺理成章得出如下结论：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既是中国对外交往得以建立和扩大的基础，也是这一时期中西交往关系的根本起点和组成部分。为系统探讨中西交往特点与交通形态，作者不惜以一章（第二章）的篇幅由近及远、分区段考察西方各国——第一区段的匈

奴、月氏、乌孙、大宛、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诸城廓部族，第二区段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贵霜帝国（Kusana），第三区段的帕西亚帝国（Parthia）——的社会经济状况，揭示各国在中西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充分体现作者研究时注重系统理论与整体观念。

作者还采用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注意量化手段，以提高定性和发展趋势分析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尤其注重采用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事物或地域的横向比较，避免单线式研究的狭隘性和片面性。汉代中西关系涉及的地域十分广阔，联系的国家与民族众多，如何评价汉朝对西域、中亚各国的影响及其在中西关系史上的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往外国有些学者认为“汉文化对西域社会不起任何作用”，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也不如西方各国。通过比较，作者指出，希腊虽然对中亚地区产生很深的影响，以致出现了一个“希腊化时代”，但希腊文化并未在当地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体系，更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文化模式；印度文明对中亚的影响主要在佛教思想的传播，在政体、经济方面则并不明显。反观汉朝，通过对匈奴战争、张骞出使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在新疆地区屯田等，造成了中原先进农耕工具、耕作技术、植物品种、冶铸、造纸技术等西传，不仅对西域社会产生巨大深刻的作用，对中亚及其以外地区也形成强烈的冲击，例如中国丝绸、铁器、药物、香料的输出就造成了罗马帝国“失去外贸平衡”，引发出“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的现象。因而断言，中国文明对汉代世界的影响是远远超越远东地区，远及中亚、西亚和欧洲，较之当代另一个最强的大国——罗马帝国，也占有明显的优势，中西交往的重心侧重于中国。这些结论建立在客观的比较研究基础之上，是有说服力的。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注重专题研究，匠心独运，不乏新意。

专题研究是进行整体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没有微观上深入细致的研究，就不可能在宏观上取得突破，整体上的建构必然流于不切实际的泛泛而谈，了无新意。作者深谙此中道理，深入钻研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事件，避免疏空，使本书在不少问题上具有独到的见解与充实的内容，而不（下转第51页）

办 单 位：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辑 者：学术研究编辑部
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电话：3345916 邮码：510050
版 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 行 者：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399信箱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
广告经营许可证：粤工商广
邮发代号：46—64 定价：
本刊每逢双月25日出版